

上 篇

孤独的逃亡者

父亲的家乡在四川北部的南充，它位于成都和重庆之间，是一片红色的丘陵。这里的人善于植桑养蚕、缫丝织绸，又有很好的水运之便。民国初年，这里就有了很小的一点缫丝业，后来发展很快。据说在 20 年代的巴拿马赛会上，南充地方生产的生丝还得过大奖。

1978 年的冬天，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那天，我们在成都的一个军用机场一直等到正午时分，因为聚集在南充上空的浓雾一直不肯散去。经过不到半小时的飞行，那架双翅膀的训练飞机终于把我们载到了南充的上空。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就是那条碧绿的嘉陵江。我看见，天上的云彩和我们的飞机都倒映在它的丰沛的江流里。我的心“嘭嘭”地狂跳起来。我自己也奇怪起来，这里虽然是父亲出走前生活了 18 年的地方，但对于我来说却完全是陌生的。我事先真没有想到，这种古老的眷恋家乡的感情竟然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我。

公路几乎一直通到父亲的家门口，东风公社清泉坝村。那里原来的地名更加好听，叫做舞凤乡。

那是一座还算结实的老房子，它的高大的骨架说明这里的

主人曾有过一段殷实的日子。但是现在，木质的板壁经过多年的烟熏火烤已经是黑漆漆的了。稻草苫的屋顶也相当陈旧了。这里住着一两户别的社员。父亲和原先爷爷奶奶住过的房子，现在由父亲的一个侄儿和他的六口之家占据着。爷爷奶奶早在解放前就已过世。父亲这一辈的三个兄弟和三个妹妹，现在也只剩下一个早年就嫁到外乡去的姑姑了。

剩下来的只有三间房子。屋里的陈设当然早已面目全非。像我一样年轻的堂兄唯一能够指得出来的，只是一张旧式的木床。据说这是父亲曾经睡过的。我想起，父亲对我说过，在他的房间里，只要一推开后窗就能看见嘉陵江从窗外流过。我找了一下，没有后窗，或许在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人堵死了吧。

只有嘉陵江还在。它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为故人保存着记忆。我在这从容不迫东流而去的大江之畔站了许久许久，心里非常地感动。江水把灿烂的阳光反射在夹岸的竹林里，苍翠欲滴的竹叶上一个个颤巍巍的光斑在跳动。是的，这就是父亲梦萦魂牵的那条美丽的江。这就是那年年月月像母亲一样哺育了两岸人民的嘉陵江。站在这里我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回到了故乡。

关于自己的家，父亲曾经这样写到过：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南充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就我所知，我家是一个中等的日益走向破落的地主。当我二十岁左右时，我们家已走上完全的或接近完全的破产。我没有当过家，没有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我上中学时，只知家里出卖过两次土地。出卖多少 剩下多少 我都不知道。

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地主。用旧社会眼光来看 什么本

事也没有什么事情也不会干 只会坐吃现成。还有烟、酒、嫖、赌等恶习 所以日益走向破落。我上中学时 我母亲觉得跟着他不行了，曾带着儿女们与他分居。

我母亲是一个地主家庭的旧式妇女 除生儿育女 操持一点家务外 也只能坐吃现成。由于生育过多 加上旧的封建思想的折磨，一身重病 死时还不到 40 岁。

我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 小时死去一个丢掉一个 我离家时还有弟妹各两个 当时都还小。一个弟弟在抗日战争时被国民党抓兵到了华北中条山 曾有一信给我 说要开小差到延安找我。以后即不知下落。可能打死了 或者被国民党抓住杀了。一个弟弟过继给我二伯父，以后当了排字工人 很年轻时就病死了。

在父亲的家庭成员中，他对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无疑有着最深厚的感情。

祖母的性格和遭遇似乎具有某种典型意义。虽然她已经在早年去世，我根本没有见过她。可我觉得在我内心中是深深地爱着她的。

祖母姓鲜，她的娘家比较富有，是南充四周数得着的大户。祖母幼年时聪慧灵巧 绣得一手好花。没上过学 却能读书写字。由于深得父母喜爱，生活的天地是很光明的。祖母自幼便禀性刚正，成人之后仍带点天真纯厚。她与祖父结婚之初，是很想以自己的温柔体贴、精明能干打动祖父，把日子过得像个样子的。但是她后来终于发现这只是她自己的一个梦想。无论她怎样勤劳，怎样苦心经营 祖父却始终冥顽不化 意气消沉。不过 祖母仍然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尽量地履行一个贤妻良母的职责。不仅如此 罗家有些田地里的 事务 如春种秋收、柴米卖茧、投书递筒之类，也常要她来操心。据说罗家的账本也全是祖母亲手写的。现在老家里与祖母同辈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提起祖母的为人和操持家务的能力来仍然记忆深刻。祖母对邻里也是十分宽和友善的。每遇有人告贷，只要数目不大，祖母可以做主的时候，她总不会让人失望。

祖母的贤惠使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祖父的暴虐。他由于染上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而堕落，不仅对家庭不负任何责任，还在不长的时间里卖掉了大部分的田地，使一家人的生活逐日艰难。

在父子、夫妻的感情上，祖父也差不多完全是个暴君。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讲过，有一次，祖父认为父亲做错了事，要打他。父亲逃出家门，祖父在后面紧追。父子二人在水田埂上跑了很远，父亲终于跑不动了，祖父抓住父亲，不由分说，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一烟袋而后扬长而去。父亲说，那次祖父打他不仅痛，而且流了很多很多的血，一辈子也忘不了。从那以后，父子感情就淡漠极了。

祖母终于不能忍受祖父的无能和乖戾，大约在父亲上中学的时候与祖父分居。这在当时闭塞落后的乡间，无疑是一种大胆甚至带有叛逆色彩的举动。她带走了所有的孩子，独自住在南充城里。这是可怜的祖母对自己不幸遭遇的一次全力的反抗。但是此后的日子仍然艰难，祖母也更加郁闷多病，经常咳嗽、吐血。不到 40 岁上就辞世而去。现在想来她大约得的是肺结核病。

父亲是祖母的长子，母子一向亲爱。父亲和他的一个弟弟曾

同患天花，病势极其沉重。祖母和祖父各自照管一人。祖母衣不解带日夜守护父亲，并细心地将父亲的双手捆住，不让他搔挠身上奇痒难忍的天花疮。后来，父亲不仅痊愈，而且奇迹般地未在身上、脸上留下任何疤痕。父亲病好之后，祖母自己却大病一场。父亲的弟弟由祖父照管，后来虽然也好了，却留下了一脸麻子。这事爸爸多次向我们讲过。每每言及柔肠百转思远情长深厚的母子之爱溢于言表。

祖母死后，父亲非常悲痛。他觉得在旧式的家庭中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更加上革命思想的影响便毅然离开了家乡。

1938年后父亲重回故乡妈妈和弟弟与他同行。他们三人均去看望了祖母的坟墓。父亲不仅自己在祖母坟前久久伫立，还让弟弟鞠躬行礼。

这一次，我们也找到了房后竹林里祖母的坟墓，那是一个挺幽静的角落并无碑记掩埋故人的只有一抔黄土。

这一天，南充冬日的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落日刚刚把自己的光芒从这片红色的丘陵上敛走，一团团、一缕缕的雾就从暗黑的背景上显露出来，就仿佛它们原来是潜藏在阳光里似的。

一群拖着鼻涕的娃娃在我们汽车后面追赶了很久。随着他们一双双小脚丫的搅动，公路面上像棉絮一样白的雾气打成了团。老屋在乡村傍晚惯有的那些声响中沉默着，并慢慢地退到暮色里面去了。我心底忽然涌上一阵惆怅。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什么呢？父亲虽然以后成了一个有名的将军，但是六十多年前，当他光着脚奔跑在这些稻田桑树之间时，他和这些拖着鼻涕的娃娃们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曾经读过一些作者撰写的革命家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当他们的主人公在乡间参加体力劳动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雷同的描写（少年革命家去割草或者拾粪、打柴）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大帮小、强帮弱，于是皆大欢喜，无论是给东家割的，还是给自己割的，人人都能交差，不会挨打。我曾觉得这些描写大都是作者杜撰出来的。现在，我已经不这样想了，是因为在父亲的家乡，我见到了这样一位老者。

他曾经是我祖母家的长工，比父亲还大十几岁。父亲叫他长生哥，而他并不知道罗瑞卿是谁，现在还直呼父亲在家时的大名。“罗其荣吗，我晓得的，吉娃子嘛（父亲的乳名）是个贪耍的孩子哟。鲜大爷，父亲的外公要他读书，他偏爱和我们这些人耍，两条长脚杆，跑起来猴儿一样快。还总要打麻缠，管别个的事。割草拾柴，谁多谁少，他总要人家分均。他身高力大，嘴巴又会说：娃儿们哪个敢不听他的？”老人龇开没牙的嘴，一股烟味扑面而来。笑容在他混浊的眼睛里闪闪的，整个面孔带上了几分狡黠的神色。后来，他的孙女叫他去吃饭。汤汤水水从他的胡须上往下流，他完全是一个老得有点糊涂，老得管不了自己的人。可唯其如此，我才觉得这样的语言不由人不信。这样一个返朴归真的形象，正好可以排除杜撰和编造的嫌疑。老人模糊的记忆里，经过时光的淘洗剩下的这一部分是可以信赖的。

后来，在地区招待所，我又碰到一些仪陇县的收集朱总司令生平事迹的同志。在他们油印出的采访材料里我又读到了相同的情节。这时候，我不得不深思了，这也许确实是一种必然性。那些立志变革社会，后来也果然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们的身上，确实存在着某种素质，凭着这种素质，他们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到周围

事物中存在着的平和不合理。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父亲好像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1919年春天，父亲在外祖父的资助下考入了离家40里路的大林寺高小。与他同时在校的，现已80岁高龄的庞子愚老先生曾这样说起过他：“一开始，我们都认为罗瑞卿人很懒，学业不勤奋。除了上正课，教室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就是上正课也总是见他在下面偷看小说，演板^①从来不看。大家不说他，可是先生要说的啊。可是也怪得很，不晓哪么一回事，什么时候提他的问，站起来回答得有板有眼，考试成绩也总不差，时间长了先生懒得说他。我们几个人倒留起心来了，罗瑞卿好像还真有点儿过目成诵的本领。课前他念一遍书，此后再不问津。当然这得是他感兴趣的课。罗瑞卿最喜欢数学、外文、国文。这些课目他是拔尖的，其次还有理工、音乐和体育。最不喜欢，成绩也最差的是图画。”

关于这一点，父亲自己也说过：“图画课上捡一张人家画废的稿子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老师，得的分数也总比自己的强。”

大林寺高小是当地开明乡绅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校长是庞明钦，它的课程设置和校规均与一般旧式学校不同。课程有数学、国文、论语、外文、理工（物理、化学、几何）、修身、习字、史地、图画、音乐、体育。每天正课时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两小时，早晨起床后自习一小时，午后和晚间各自自习两小时。每星期三作文，星期日放假一天，每学期均有期中、期末考试，每年春日还要放春假，学生们穿起式样一律的校服去郊游。这一切都和现在的

^①演板，指在黑板上写字。

学校相差无几了。

父亲的同班同学李正国老先生曾给我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他和父亲共同读过的书籍的清单，其中包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古典小说 包括《春秋》、《左传》、《史记》这样的正史 还有大量的《七侠五义》、《施公案》一类的小说书。这些且不去说他，最叫我吃惊的是他所列出的一套知识丛书：俾斯麦外交、哥伦布探险、大力学家牛顿、卢梭和他的启蒙运动、圣女贞德、印度瑜伽教、文艺复兴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0 年代初 就在这里，——今天也只有一条简易的土路通到门前的金台场大林寺存在着一块如此学风浩荡、文明开化的乐土。我虽然并不十分了解庞明钦先生的身世，但是对于他，和像他一样的长年累月奔走于穷乡僻壤的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教育家们却起了深深的敬意。

还是前面提到的庞子愚老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到：

罗瑞卿幼年就读于大林寺小学 读书喜读文天祥《正气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每于精彩之处大声诵读 声音洪亮……喜演讲，文辞激烈，民国十年江防军司令官余维唐同滇黔军争防地在南充塘口垭打仗，罗瑞卿在学校周会上演说论战曰 文以经国 武以戡乱 文与武固相表里也。然语有之曰：“天下安 重于相 天下乱 重于将。”国家当多事之秋，故武力重于文学也……。喜唱歌且五音全，唱苏武歌，唱扬子江歌，唱项羽楚汉争歌。喜做打油诗且有诙谐风，民国九年春三月三日，全校学生旅行金台回龙观，至一古庙罗汉堂。罗瑞卿看一睡罗汉憨态可掬 随口吟道：一睡睡得好 万

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众人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罗瑞卿急公好义，手巧心灵。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学校办孔夫子会，礼堂门口扎营门架子，罗瑞卿手制跑马灯做得活像，又受众人之托至龙门场挪来别家本已订下的戏班子 师生同乐 夫子会生辉。学校操场窄小 罗瑞卿提议全校学生课余劳动铺操场，半年时间周围加宽十多丈。罗瑞卿幼年便有胆识：民国十年冬，南充县永丰场匪首吕沛然至芦溪李家肥主抢财物银钱，匪徒冯夏安原系大林寺小学二班学生 知内情 出卖肥主十几个 又指名来信借钱 全校惊惶不安，无心读书，罗瑞卿出头向校长庞明钦建议设四个哨棚守夜，并亲笔写信给冯夏安以友情说之，后匪首吕沛然避捕毙命 冯夏安在抢劫中遭民团打死 匪帮自散。

庞子愚老先生这封端端正正具名盖章的信像他本人一样质朴。他现在是一名退休的乡村医生，当我在金台公社的食堂里见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一边爽朗地哈哈笑着，一边指点着我的额头说：“这里 这里 才像你的爸爸呢！”老人是赶了十几里路走来的，鼻尖上冒着汗珠。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一样使人愉快。

“我和罗瑞卿在大林寺小学是睡一个铺，他晚上还尿湿过我的被盖呢。”老人又径自开心地笑了，口气根本不像一个 80 岁的老人回忆他的亡友，倒像和一个同年龄的朋友讲述一件刚刚发生不久的事情。“他尿床，倒不是有什么毛病，这个人太贪耍了，晚上一点点力气都没得了，睡得像个死人。后来，我夜夜叫他起来……”

“罗瑞卿小时候英雄主义厉害得很呢，他老爱讲的一句话就是‘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话当然不对 不过一个娃娃说此话倒是要一点气魄的呐。

“……我们一分手就是 50 年啊 后来知道他成了要人 想想自己不免自叹形秽，那年他回南充来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这次听到你来 倒真是想见一见啊。”

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少不公正的待遇，言谈中他很含蓄地提起 似乎有意让我‘向上’反映反映。但我实在无能为力，至今想起还觉十分不安。父亲如果还在，不知他是否还能记得这个与他同睡一个床铺，并夜夜叫他起来的朋友。

父亲大约在 1924 年考入南充中学读书。关于他在南充中学的生活 他的老同学 原中顾委委员 四川文联主席任白戈^① 同志对我说：

“我们南充的丝绸业很发达，有一所嘉陵绸厂，出一种很有名的丝织品叫做湖绉。这所工厂和我们南充中学都是张澜先生开办的，是这位老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指导下实行地方自治和实业救国的措施。张先生以前并不富有，佃户出身，前清考中了举人。辛亥革命时他领导反清运动，反对川陕铁路收归国有，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出了名，还当上了四川的省长。他一向反对封建军阀，提倡实业救国。他的兄弟一直种田，他的妻子也一直操持家务 他送他的两个儿子出洋留学 学习工业、工程。那时南充筹备自治 反对军阀统治 政治气氛很活跃，《申报》、《太

^①任白戈同志已在 1986 年 8 月于成都去世。

平洋杂志》、《新青年》还有萧楚女同志主办的《新蜀报》都可以看到。

“那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组织很活跃，你的爸爸当时对学业并不特别感觉兴趣。他只爱运动 打脚球 爱读小说 尤其爱读武侠小说。对学生运动也相当热心。

“我们学校那时分为普通部、蚕桑部、工业部、医学部和师范部，普通部是为上大学作准备的，学制四年。你爸爸原来就是读普通部。后来大概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想他经商，就转到蚕桑部。因为你爸爸真正的志趣并不在这里，所以他也就无所谓。

“我和他就是办学生会时相识的。我和他同级不同班，我们两人都是班里推举出来的学生代表。那时我们的学生会很热闹，还办了平民夜校，叫穷苦人晚上来读书。我们一起参加了许多活动：‘五卅’，反典当捐、反军阀、演文明戏、上大街演讲、宣传。当然张澜是我们的后台。你爸爸豪爽义气，为友忠诚。所以他的朋友很多 张慕良、王义林、任启愤、张默生、王燕荪、冯开琮……大家先后都是好朋友。王义林 又叫王麻子 这个人后来不好了 跑到香港去，可那个时候还是进步的，和你爸爸很要好。解放后你爸爸还对我说过：‘王义林这个龟儿子 我要他回来 他不肯 还是跑到香港去了。’

“你爸爸对俱乐部工作最拿手 积极。我们一起演过戏 孙中山死后我们演了《孙中山之死》 我演弟弟 你爸爸演哥哥。他的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演的角色总是一些有英雄气概不受人欺负的人。我的身体文弱，脸色又白，不是演受人欺负的人就是演女的。那时候学校里没有女生，只好由男的来串演。

“我讲的这些事情不光是发生在舞台上，有一次就发生在现

实生活里了。我是 1925 年加入共青团的。那时候我们公开的活动是组织国民党左派，秘密活动是组织共产党。搞‘国左’没关系 可是搞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四川的军阀很反动 所以很多人，如朱总、刘帅 还有熊克武都是反袁出来的。

“我们搞‘国左’就遇上了国家主义派 学校里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是，有些教师，甚至教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是国民党右派组织 在我们四川势力很大 他们办的报纸叫《醒狮报》是文言文的 代表有钱人。他们的口号是‘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因为我是搞‘国左’的 他们就要来整我 从经济入手。学生会的会员每人交一元的会费，他们趁会计不在，就说我贪污了会费，要跟我算账，要把我赶出学校。你爸爸来了，给我打抱不平。现在我讲起这件事，还觉得面前站着个活生生的人。那些国家主义派的人来闹 哇哇地叫 样子凶极了。你爸爸跑来，‘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记 又跳上桌子大声说：‘哪个要算账 找老子来算 有理讲理 不许欺侮人！’你爸爸个子大 嗓子大 又有平常打球的一帮好朋友。反动学生吓跑了。这件事以后，我和你爸爸的感情更好了。

“你爸爸这个人很好交际 思想又进步。吴老 玉章 1926 年到南充来，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带着王义林、你爸爸等人去看吴老。吴老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一番事业 譬如说演戏 书生出场 咿呀呀呀戏文唱了一本又一本 慢慢腾腾踱步子，让人看得没了精神。武生一出场威武雄壮，拳打脚踢 局面可就大不一样……’这些话你爸爸一听就听进去了。因为这些话对他的心思。”

当然，父亲的生活中不会是处处阳光明媚的，最初的较量就来自他的家庭。前面提到的父亲的外公，也就是我祖母的父亲，虽然他一直出钱供父亲读书，但是，他始终是父亲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仇敌，是父亲在亲人中永远不能原谅的一个人。我将要用一些笔墨谈到他。因为他虽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存在，父亲是不会成长为日后的罗瑞卿的。

他的名字叫做鲜锦堂，不知为什么，我的想象中总认为他是一个黄胡子的精明老头儿。他曾经很爱我的祖母。祖母是他的长女，前面说过了，祖母从小聪慧，会绣花，会写字。亲生母亲又死得早。所以，鲜锦堂曾经很尽心竭力地履行过一个父亲的职责。不过，大概也就因为这种爱，祖母在婚姻上不知不觉地就耽误了。等到鲜锦堂着急为自己的爱女择婿的时候，祖母的年龄已经有点成问题了。祖母嫁到罗家来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罗家的家境和爷爷的人品都是较差的。所以就这门婚事来说确是有点仓促和勉强。

据说行聘的时候，鲜家送的帖子曾引起过罗家一场小小的轰动。帖子上的生庚八字是祖母亲手写的，端庄秀丽、颇有功底。祖父见了自认不如，先就叹服得很。但是，一手好字是不能当饭吃的，祖母过门以后，罗家的家境一年不如一年，祖父抽烟、赌钱，游手好闲的毛病又一样也改不了。祖母一向争强好胜，自然是苦不堪言，鲜锦堂也就懊悔得很。

鲜锦堂是鲜家沟一带的首富，他有几百亩土地，读过书，但是没有得到过什么功名。早年他出头揽过一桩公事，管起了县上的一座谷仓，不知被什么人做了手脚，不但没捞到油水，反而赔了不少谷子。后来，他又和别人合伙做过一次棉花生意，也因经

营无方赔了本。鲜锦堂屡遭暗算，便悟出了一条道理：没有得力的人，多大的家业也会败。

鲜锦堂前后娶过两房妻子，共生有二女三男。女儿出嫁，三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争气的，不是抽大烟抽空了身子，就是学了点本事离家一去不复返。女儿的苦处，鲜锦堂是看在眼里的，自觉很对女儿不起。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千年立下的老规矩，女儿再苦，鲜锦堂也绝不会承认自己在这门婚事上的昏聩。

鲜锦堂看中了外孙身板结实，有胆有识，罗家的家境又一年不如一年，便想靠自己的财力将这个聪明的孩子抚育成人，既可以替自己支撑家业，又能使女儿将来有个依靠。

平心而论，鲜锦堂对外孙可谓是操心尽力，煞费苦思。先是进家塾，后入大林寺高小，再后又入南充县高中，都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钱。这些学校在当时当地也都算是“最高学府”了呢！方圆百里，鲜锦堂以吝啬出了名，人缘是不大好的，他的外号叫做“鲜大狗儿”。是说他吝啬得像狗一样，一根骨头也要啃得净光。平日自己的饮食起居简单极了，但是对外孙他还是肯花钱的，不仅给学费、零用钱，而且他还要外孙穿得像样子，长袍马褂，四时替换的衣服都不能太马虎。还破天荒将自己一件皮袍子改给外孙穿。无论小学、中学，父亲的衣着齐整是人所公认的。而且父亲的许多豪爽之举，例如‘同学们上街吃茶，瑞卿总是争开茶钱’（庞子愚老先生语），不能不说是由鲜锦堂做了坚强后盾的。

外公那些光宗耀祖、成家立业的话，父亲一开始还是听得进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间，这个道理是朴素和真诚的。加上强烈的求知欲，不管用功不用功，父亲的学业一直是不错

的。后来，当父亲自己有能力去考虑人生中的一些问题时，这一切才起了变化。

鲜锦堂的续弦林锦卿有个妹妹叫做林俊卿，她的经历对父亲的转变也起了某些作用。从辈分上来说，她长父亲两辈，但是她只大父亲六岁。她曾经是父亲少年时代的好友，也曾是一个名噪一方的新派人物。她是南充县第一个剪了头发上学校的女学生。

我是在南充市的一所小学校里看到这位我应该称为“姨祖母”的八十多岁的老人的。她和她的老姐姐住在学校职员宿舍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身边再没有别的亲人。当我说明我的身份和我的来意的时候，我看见老人激动得双手微微发颤了，由于房间太黑、太小，她只好把我们让到了教员的办公室里去。

看得出来，这白发皤然的老妇人年轻时候是很漂亮的。皮肤白皙，五官周正，眼睛大而明亮，八十高龄，言语和思路都很清晰。

“我一岁上就死了父亲，母亲靠替人缝补洗衣服拉扯大了我们姊妹四人。我大姐很年轻就嫁给了鲜锦堂，家里的经济宽裕了就送我去读书了。我六岁就读了‘劝学’。‘劝学’就是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南充地方兴办洋学堂的人提倡民主自由、解放妇女、动员女孩子到学堂读新学，可以不交学费，还免费发给女学生书本和笔墨。

“我和瑞卿是在大姐家认识的。他在那里读书，我是一放假就去姐夫家玩。我们俩最耍得来，我们两人的性格都很爽朗。

“不过瑞卿比我勇敢，这些事我想起来是后悔的。我妈妈是

个穷怕了的人，她把大姐嫁给了鲜锦堂尝到了甜头，很快又做主把我许给了一家姓胡的大户人家。我还小，又很想念书，哭了多少遍。妈不许 妈的泪水比我的还多。我的心软 心想 就算报答我妈的养育之恩吧。就是这一念之差啊！

“拜堂的时候，红盖头揭去，我才晓得男方大我十多岁，儿子、媳妇都有了 跪了一大群人来拜见‘新妈’。我气得死过去 可是一切都晚了。

“我出嫁了以后在街上碰到过瑞卿，他好埋怨我。他们学校里演文明戏，他给我送票子，我去一看，他在台上演老财、地主，骂有钱人。动作、声气都像他外公一模一样。戏散了我跟他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骂了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 不怕背时么？’他对我说：‘么姨婆 就你胆小 你一辈子就要吃亏在这懦弱二字之上。’后来 我和姓胡的人家说通道理 又出来读书 罗瑞卿听见多高兴的 他托人捎话来给我 说是：‘事在人为 这是一次证明。’但是，我后来还是软弱了。我虽然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则我正在怀孕 二则胡弼儒正生病 要我照顾。我左思右想决定不去了。为此，张表方先生批评过我，同学们为我抱屈而痛哭，但我还是没有去，在旧社会的一个女子是艰难的。

“再后来，我就一直在南充教小学。我的独生女儿也是个刚强的人，她参加了共产党，我给党做过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成为在党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捆住了我的手脚。也许 是罗瑞卿说中了的：一辈子吃亏在懦弱二字上。

“解放不久我的女儿就得肺病死掉了。现在瑞卿也不在人世了 烈性子的人都死得早。我还活着 八十多岁了 还是个软弱的人。……”话说到这里 老人的声调里并没有忧伤 只在她的眼睛

里闪过了一丝酸楚的笑意。至少是我感觉到了这个笑意。

当然，我并不认为老人是个软弱的人，她的那一番平静而恬淡的话，任何一个不太高明的作者，都可以发挥成一个烈女子的奋斗的故事。在这个平凡的经历后面，隐藏着那么多无音的牺牲和咬碎牙齿吞进肚里的苦处，它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一直到我回到了招待所的房间里，无论我的眼睛注视着什么地方：天花板、墙壁、映着婆娑月影的窗户，我的眼前总浮现出林俊卿眼神中那一丝酸楚的笑意。房间的某个角落里总是响着她平静的声音：“……烈性子的人都死得早。我还活着 八十多岁了 还是个软弱的人……”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老人有一句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我猜测那该是：“如果再有一辈子好活 我也一定做个烈性子的人，虽然也许会死得早……”

自然 这不是后悔 而是一种真诚的羡慕和向往。

么姨婆的经历使父亲对于人生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大约也使他下定决心不在生活中做一个弱者。

父亲原本是想好好维护他和外祖父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他答应了外祖父在上学期期间不参加任何党派。鲜锦堂也是脾气大得出奇的人。如果从个性上来说，父亲其实和他的外公很相像。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稍微温和一些，他们关系就绝对不可能破裂得那么快，破裂得那么不可挽回。因为维系这个关系的毕竟是一些很紧要的东西，老的是小的衣食父母，小的是老的希望所在。

一开始是为了演戏，父亲一开始演文明戏倒不完全是自觉地宣传革命。他始终是个狂热的戏曲爱好者。

四川的戏叫做川剧。它的曲调很丰富 很有特色 唱词很文雅。尤其是那种把底气顶到脑门上，一开口便震惊四座的高腔，叫你听一回永远不会忘的。

先是爱看、爱听，后就模仿起来。那些在民间流传了上千年来上百年的浓缩了美和丑冲突的故事常使父亲心驰神往，不能自己。加上他身材高大 声音洪亮 又有几分表演天才 便更跃跃欲试。再后来 古人的事不能满足了 就演新戏 田汉的 洪深的 还不过瘾，就自编自演。他在南充中学先后参加演出、编排的戏就有《孙中山之死》、《士兵泪和农民泪》、《算账》、《老爷的鼻烟壶》等等。演来演去，传到鲜锦堂耳朵里，于是就不得了啦。

且不说这些戏明摆着的革命倾向，旧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叫做戏子、王八、吹鼓手。鲜锦堂身为一方首富 从来是死要面子的人。父亲放着好好的书不读 却去演戏 这是他不能容忍 也不能理解的。一开始他是生气 后来就和父亲吵 父亲不服软 就吵得凶，还砸了东西。父亲终于不肯屈服，后来又出了打典当捐的事。

生活在今天的人，恐怕不容易想象当年军阀割据的时候，在乡间，一个普通人所要承担的各种捐税。我曾经查过南充的县志，仅这部民国初年修的县志上就记载了各种杂捐 32 项：屠牛、猪小肠、丝箱、茶棹、柴炭、猪、鸭毛、机房、猪号、叶烟、木料、水果、钱摊、棉烟、河斗、春帖、过道牛、茧、硝磺、棉纱、兑票、经纪、丝、经纪、棉烟、牙行、渔船、塘、棉花称、药材称、油称、丝称、盐称、印花、烟酒、油、屠羊、屠猪。看得人头皮发麻。开门七件事 举手投足都要缴捐上税。其中有些项目如“过道牛”到底指的什么 问

了好多人都不能解释，可见当初巧立名目的人颇费了不少心机的。

1924年驻防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决定征收“典当捐”。就是说佃客、佃主、纳租和收租的人均出捐一成。典当东西当入当出的双方也要出捐一成。一成，就是十抽一。这真是花花点子想到天上去了，一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反对，闹得最欢的当然是学生。

5月11日一早，南充中学的学生分成几路下乡去捉收捐委员。这些收捐委员是先花了钱向何光烈买下这个名分，然后下乡去征收，收多、收少完全归各人。他们的穷凶极恶则可想见。爸爸去了西路，又有人说是东路，年代久远了，想弄清这些细节常常很不容易。反正是捉住了一个叫做秦同淮的收捐委员，把他痛打了一顿，得胜而归。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情，真正的太岁头上动了土。多亏有德高望重的张澜老先生给学生们做后台，事情才算平息下去。

青年人，当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身边发生的事情时，大概总不免要产生一种反社会的倾向。现在的年轻人，当他们觉得苦闷的时候他们就留长头发不洗澡甚至吸毒他们做出种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使父母、家庭和社会感到吃惊。而那时候，像父亲这些人就热血沸腾地直接向不合理现象做斗争。虽然方式不免幼稚，但奋不顾身的劲儿仍令人动心。

父亲在自己选定的路上越走越远，大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做的。但是，个人的温饱，做一个殷实家业的继承者，甚至出国留洋已经越来越不能吸引他。一种更强烈的欲望在他的心里骚动。据他的同学们回忆，当时谁也不认为罗瑞卿是一个特别聪慧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的性格很鲜明，但

是他并不是一个最出色的角色。在学生会里，拖板凳、守大门的事情他也经常做。但是他有一种特殊的执著和热情，凭着这一点，他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发展充分而达到成熟。而许多当年引导和影响过他的人，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终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当然 家庭、外公 甚至母亲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挽留他。

1922 年的春天，由他的外公和母亲做主，给他娶了一个妻子。这个林氏是当地一位乡间医生的孙女，是个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我的如今还健在的姑姑，也就是父亲的亲妹妹曾对我说，父亲临离开家的时候，曾对林氏讲明，他是不会再回来的了，要林氏不要再想着他。父亲走后 林氏吃了不少苦 后来又嫁了人。这位林氏当然是一位不幸的妇女。最近一次回川，我曾顺路去乐山市沙湾镇拜谒了郭沫若先生的故居，得知这位文学巨匠 1921 年结婚，不久由于新婚失意，东渡日本。而他的结发夫人张琼华却一直寂寞苦等，一生未再嫁。现在收藏在旧居里的许多文物，如郭沫若先生青少年时期的诗稿，他在乐山高等小学堂的毕业成绩单等等都是张琼华亲手保存下来的。这位老太太是在郭沫若先生去世之后仙逝的。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悲剧。

所以，当那个强烈的，不停地在父亲心中骚动着的希望逐渐成熟起来的时候，父亲终于决定到外面的大世界上去闯一闯。父亲曾经这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由于决定要走 钱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学费怎么办 我想 考上了学校再向我的外公要 估计他可能给我，

因他是主张我学实业的。没有路费怎么办？我就让姑母去说服我的祖母，并利用她们的旧思想，向她们说上省里读书将来可做大事。祖母被我说动了，第二天就赶到姑母家来看我，并问我到省里念书会不会做官。我说会。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给了我三锭银子，十几块大洋，还有几吊铜元，我因此就得到了路费和到成都后的短期生活费。

我刚要出走时，我的父亲和我的外公发觉了，我的外公要我父亲赶到姑母家，把我叫回去。我只好同父亲回到外公处。他大发雷霆，训了我一顿，说我“反”了。我当时表面认了错，说听外公的话，不走了。他们信了我，可我暗里约好了同路人郑培济。一天，我借口说到银铺取回祖母给我的路费，他们真的以为我不走了，同意我去取钱，我到银铺里将钱取出后同郑一起跑了。我们怕后面有人追来，每天跑一百里、一百二十里，实在走不动时，就雇乘滑杆赶路。

关于出走的原因，父亲这样写道：

当时，我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婚姻不满，因此就想逃出这个家。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事，能够做一点事业。加上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列士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学校。

父亲没有想到，他一走就是 40 年，他更没有想到，在这 40 年

间，天地之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一个人，走上了一条道路不会完全是偶然的。在追寻父亲青少年的这一段经历时，我总是有点固执地想寻找某种必然性。

四川这地方既是富庶之地，又是多事之邦。历史上许多大政治家、大军事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也留下了他们永劫不复的遗憾与艰难。这里文明开发甚早，风土人情醇厚，许多大学者、大文豪在这里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奇迹，孕育了千古不朽的诗篇。至于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旧民主革命家更是人材众多 邹容、张澜、吴玉章、朱德、刘伯承……

父亲幼年的家境虽不算太好，但基本上是不愁衣食的。他从小受到许多人的疼爱，又有一位温良而知书识理的母亲，所以，他的性格是明朗的，外向的。所以他有能力有机会去汲取那些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营养。他养成了对生活热爱，对友人诚挚的性格。这些纯净的东西一旦和现实社会中那些不合理的、丑恶的现象接触，就会产生矛盾，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矛盾就要按着内在的规律发展。当然，这种类似演算数学题一样的推导多少有点滑稽。不过 人生往往就是由人们有意无意地 在一个个“偶然”面前，调动自己身上积攒起来的必然的因素去做出抉择。也许，这就叫做命运吧。

命运的故事啊，讲也讲不完。

一个瘦高的，穿着长衫的年轻人在一片红色的丘陵上趑行。初升的太阳把他的映影细细描绘在他脚下的土地上。他的瞳仁里闪烁着朝霞的颜色。他正在逃离自己的家乡，逃离那些爱着他的亲人。他气喘吁吁，努力把那些他所厌恶了的或还在依恋，甚至想爱的东西——只要是他体验过的 都匆匆地留在了身后。他

翻过一道山岗，又翻过一道山岗，心是怀着对陌生的未知世界的渴望。他是如此性急，仿佛奔跑着去迎接自己的命运。似乎稍有迟疑，这些新鲜的东西就会消逝，他的机会就不会再来，他探索的欢乐就会被剥夺。他的心里充满了急于献身的焦躁，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恐惧，他也不在乎自己的踽踽独行。

其实，在以后大半个世纪的日子里，父亲始终没有失去这个急切的、热烈的、多少有点孤独的逃亡者的形象。

鲜血流淌的时刻

历史的风云已经飘移了半个世纪。但是关于一个热血青年在寻找信仰的道路上走过的一段艰难困苦的道路，关于这个近乎悲壮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还是新鲜的。为证明其真实，我将较多地引用父亲自传中的一些材料。

在成都我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钱花光了，我写信向家里要学费。外公认为我是“忤逆不孝”，怎么也不肯给。所以，我考上了学校并未入学。恰在此时，得知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我当时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闹闹学潮，写写传单，发发宣言是不顶用的，就决心去重庆投考黄埔，彻底与我的那个家庭决裂。但是没有钱，还不了寄宿舍的饭费，亦没有路费，还是走不动。于是，我就在一位同学的劝说下，佯装愿意回乡去，要外公寄路费来。外公相信了我的话，兑了二十元钱来。我还了饭费就同一位姓郑的，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跑到了重庆。

到重庆后，首先碰到南充中学时的好朋友任煜、王玉林。住在他们就读的中法大学。在那里认识了任伯芳，同时

知道了任煜、任伯芳、任启愤 又名任济民 都是共产党员。王义林还告诉我说，南充有共产党组织时，他们就都是党员。在重庆还见到了在南充当过我的教师的任子勋，听到刘伯承、杨闇公（当时是四川党的负责人）的演说。

投考学校时，我同任伯芳都被录取。原先同行的郑、张二人却没有考上。我们乘学校招生机构包的轮船东下武汉。那个姓郑的也与我们同行，以后，他考上了唐生智的军官学校——亦称长沙分校。1933年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时，他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连长。该敌被我们全歼后，他被我军俘虏。找到我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款待了他。后来他被送往瑞金，经教育释放，临走时还曾写信给我，表示感谢。可他一回到南充，即到处活动 逢人便说：“罗瑞卿在共产党里当头子……”并以此到我家去进行敲诈。这是我妹妹和我那个女孩子到延安后告诉我的。

1926年底，我们到了武昌，见到了过去的教师李鸣珂，此人也是共产党员。因学校还要复试，他曾约叶镛、叶德生在旅馆为我们几个南充人和他的同乡南乡人补习了功课。复试时，又有不少人落选，我同任伯芳仍被录取。

入学后，我编在第一大队第二队，任伯芳编在第一大队第四队。我那个队的队长姓王。区队长叫廖岭奇。学校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驻在武昌的两湖书院。

在学校过的是很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很紧张，很严格。冬天手和脚都冻坏了。出操时前面有泥水，教官不喊停步，大家就都走到泥水中去。

我在军校除了任伯芳等几个同乡，我那个队上没有我原先认识的人，也没有交上什么比较好的新朋友。陈伯钧、张赤男、周高潮都是以后到红军见面谈起才知道的。虽然我同他们同队，但是当时并不熟识。张是红军第四军的师政治委员，1932年在江西作战牺牲。周当过彭德怀的秘书，后来在江西打 AB 团时下落不明了。

在学校的教职员中，我唯一的熟人就是李鸣珂。但很少见到，他可能在学校的政治部工作。记得打夏斗寅前，曾见着他，他给我们几个学生讲：“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说得我们都笑了。

在军校我曾想加入党的组织，但苦于不得其门。我向任伯芳提过。四川“三·三一”惨案后，王义林到了武汉，我在汉口见到他，也向他提过。他们对我说的大意都是：只要我好好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对我关门的。

蒋介石猝然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后，当时学校的教育长张治中不辞而别。校长是邓演达，党代表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复亮。

马日事变后，当时的武汉政府的军队正在北伐，敌人夏斗寅、杨森率领反革命军队乘虚向武汉进攻。我们学校同毛主席当时在武汉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是侯连瀛，出发打夏斗寅，归叶挺指挥。

在武昌以南纸坊、土帝堂地区打第一仗，敌人被击溃。第一仗后，我即被调到团部当传令兵。团长蓝腾蛟。

部队回师武汉后，反动形势已经表面化。部队拖出去

“打野外”天气酷热，学生患病生疮者甚多。听说要开到鄂城去会合叶挺，可又没有去，又开回到武昌，驻在南湖。其所以未去会合叶挺，当然是机会主义的缘故。此时武汉反动空气更浓了，谣传也更多了。此时学生中很多人纷纷离队，任伯芳没有告诉我就走了。

我们队上很多人，如我们班的班长、副班长、队长、区队长廖岭奇、见习官柳献尤等等都走了。

此后，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即张发奎的教导师。我被编在第二连，当副班长。叶镛是连长，听说也是支部书记。部队改编后，每人发一支三八式破枪，五发子弹。很快即由武昌坐小火轮拖的木船出发，名为东征讨蒋。

出发后不久，有一个叫陈刚秉的到我的船上，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此次东征，是蒋、唐（生智）两大军阀间的军阀混战，我们为此牺牲不值得。有机会时可以离队。”此人大约也是共产党员。

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部队停下来。听说党委曾讨论行动方针。可是由于机会主义和反动分子的影响，我们没有能够像武昌警卫团一样，去找“八一起义”的部队，而是打电报给军阀张发奎，问部队可否继续开去九江。张当然同意开去，于是部队向九江开去。八月初某晚，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指定的地方。

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个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黑暗里张发奎跑来训话，他说：南昌方面如何对不起他，

消灭了他的部队，并称学生中的“CP”、“CY”分子可以站出来，他可以负责送他们到南昌去，决不加害于他们等等。

此时 学生中笼罩着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办。于是，又有许多人纷纷离队。

当时 我的脚上生了疮 又开始发烧、拉肚 接连两次缴枪，当然也有些悲观失望，身边的人都不熟悉，又加上陈刚乘在船离武汉时给我说的那些话。我便也决心离队。我打算回四川去找任煜、王义林等人。因为我是知道任煜等人的共产党员的身分的。

在等船的趸船上 我遇上了四川同乡 也是黄埔学生的冯开琮，我们两人便同船回到了武昌。

到武昌后 我们住在四川会馆背后的一个小旅馆里 很快 我的病大发作 躺倒了。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钱了。因我的病越来越严重 冯开琮陪我到武昌昙花林一个叫做仁济医院的教会医院去看病。医生检查了说是肠热病 中医又叫伤寒 要住院 要隔离 还要吃流质。但住院要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了钱来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 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当时我的眼也害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 神志还不清醒 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

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来的一条棉被。

在会馆里呆了多久我不大清楚。那时候对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太明确了。稍微清醒的时候就想想自己的事情：举目无亲，又无友，大病缠身，还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间黑屋子里。看看四肢，只剩下皮包骨。陷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我自以为绝没有活的可能，曾想自杀以结束痛苦，但是当时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一次 父亲能够活下来 实在是一个奇迹。多少年后 父亲提起当年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惊叹不已。

黄包车夫因为怕四川会馆的人不收像父亲这样一个快死的人，实际上是悄悄地把父亲丢在那间黑屋子里的。本来，父亲不病死也得饿死。幸好 四川会馆里一位姓熊的龁师 父亲说 龁师就是管理房子的人 偶然发现了他。总是“ 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吧，不忍看着一条生命白白送掉，这位熊师傅就在每天自己吃饭的时候端来一碗稀薄的米粥给父亲。

正是这起码的生存条件，有意无意地对父亲那可怕的伤寒病起了作用。又冷又潮的地面，使高热不致损坏父亲的神志。稀薄的米粥使得被细菌侵袭的胃肠道得到了休息和恢复。出乎自己也出乎别人的意料，父亲竟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逃脱了死神的魔爪，恍若隔世为人。大病初愈的父亲怀着抑制不住的温情给他的外公和父亲写了一封信，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并请他们寄点钱来，渡过眼前的难关。回信

很快就到了，信的内容却使父亲大吃一惊。回信除大骂了一通父亲的“忤逆不孝”之外。还讽刺父亲说：你都是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了，还要这个家接济？父亲没有想到家庭会对他这样冷酷，竟还不如一位萍水相逢的熊师傅。我前面说过，若没有鲜锦堂的专横和乖戾，也许不会有日后的罗瑞卿。如果当时的家庭能够给父亲一点起码的温暖，也许父亲追求革命的道路还会曲折一些、漫长一些。正是他们绝情绝义的态度使父亲生发了“宁做千秋鬼雄亦死不还家”的信念。

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武汉的白色恐怖，特别是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便更加严重。四川会馆里经常有人被捉。当时反革命的口号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凡是四川人都是共产党。”

反动派杀共产党杀红了眼。父亲呢，找共产党急红了眼。可是，到哪里去找啊？街上那些一串串一队队捆了去杀头的人是共产党，可是活着的共产党在哪里？为了不让敌人捉去杀，为了在白色恐怖过后继续和反动派斗争，他们都躲起来，藏起来。这可急坏了父亲，难坏了父亲。在四川会馆里，他苦等着、死守着，尽管那里天天都在搜查，尽管自己随时可能被当做共产党杀掉。他虽然知道并非所有的四川人都是共产党，但是他知道四川籍的闹革命的人确实是多。无论如何，他非要找到共产党不可，就算是早上找到了共产党，晚上被捉去杀头，也心甘情愿。

“朝闻夕死”这句极而言之话，却是父亲当时急迫心情的真实写照。

1927年，大约是十月份的样子，一个叫做任启愤的人从上海还是广州来到了武昌。他到四川会馆来住，我们两人碰上了，他也是我南充中学的同学，在四川会馆我们同住一间房，他有个汽炉子，我们一同做饭吃。

任启愤带有当时武汉党的关系。他是知道我的倾向和为人的。我同他一起到汉口去接过两次或三次头。他把我介绍给党的关系的接头人。记得这位接头人曾经说过：湖北边界处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交通时就送我去那里。还说，如果自己能够找到社会关系立脚也是可以的。以后，因为白色恐怖严重，关系又断了。

武汉实在难以立脚，像我们这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这时候，任启愤就建议我们一起离开武汉到湘西常德去，因为当时我们得知秦汉山（原驻南充小军阀何光烈的一个旅长参加顺庆）泸州兵暴后已将该部拖出四川，被军阀鲁涤平收编后驻在常德。任启愤与秦汉山有旧，可以到那里谋点事情暂时存身。大约在1927年12月底到1928年1月初，我们将走未走之际，一天晚饭后我们两人外出散步天黑了，我们回会馆走到街口见一国民党兵持枪坐在凳子上。他将我们拦住，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说回四川会馆。兵问：四川会馆出了事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回说不知道。兵说：还不快走开。我们就又在附近转悠。直到国民党军队撤走后我们才回去。

熊龛师见着我们 惊恐地说 刚才大搜查 你们不在 你们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 才没有搜 我们的房子在龛师住房对面 很近)你们应该马上走。欠我的伙食费 你 指我有良心以后兑给我 没有良心也就算了……

听了龛师的话，我们立即坐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第二天早上船开以前，又听说国民党兵把四川会馆围起来搜查，还捉了人。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武昌。

四川会馆的熊龛师连他自己家有五口人，大女儿好像在外面帮人做工，二儿子刚上学，还有一个老婆及一个幼儿。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

到常德后，秦汉山给任启愤派了事情做。对于我，则表示没有名额，爱莫能助。于是我又被困常德，进退不得，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我得知军校的老同学任伯芳在常德附近澧州的一个被军阀鲁涤平收编的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去问他能否帮我落脚。他回信告我，该部队成立不久，要成立政治部，正在找人。我便在任伯芳的介绍下去到澧州，在那个部队的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个所谓的“中尉科员”。这大约是 1928 年 2 月的事情。

我在那个部队里呆了五个月左右。部队要改编，来了一个反动分子，先在师里当参谋，后来到我们团当团副。任伯芳告诉我，那个反动分子放出空气要查我们这些人是广东

黄埔 还是武汉黄埔。所以 这个部队又是呆不下去了的了。于是 任伯芳和我商量离开部队 决定先去长沙 然后到上海。为了不引人注目 决定任先走 我后走 去长沙会合。

在那个部队里，我又几次向任伯芳提出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他告诉我：他也失掉了联系。我们之所以决定到上海去，就是听说在那里容易找上党的关系。这便是我们决定去上海的决定因素。

当时的长沙白色恐怖也很严重，正是郭亮牺牲，任卓宣叛变以后。我们伪称自己是被国民党部队遣散了的人员。这种身分不仅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还使我们利用旧关系搞到了一张沿途舟车准予免费的护照。我和任伯芳就是用这张护照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昌，改乘招商局的轮船经南京，又改乘火车到上海的。搞那张护照，我同任伯芳花了很大的力气，所以在长沙耽搁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上海时约是1928年7月底或8月初。

到上海后经同乡潘先知的帮助，先住在一个寄宿舍。潘先知、任伯芳、我和一个小青年四人同住一房。不久 潘和任都搬走了。因寄宿舍的收费较贵，我又去找了一个叫吴季璞的同学，他在江湾劳动大学。我就在他那里的穷苦学生的破旧宿舍住了一阵子。饭费与房费都比较低。

1928年 大约是9月份，任白戈、王义林等人到了上海 同来的还有任光俊、葛泗桥。他们到后 在生活上我可以取得一点帮助。我同任伯芳都与他们搬住在一起。地点是当时法租界甘司东路田汉同志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大家自己做饭吃。

关于这一段的生活 任白戈同志曾对我说过：“那时 我们这些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还是真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呢。经济来源：一开始是王义林、葛泗桥家里寄来的钱，他们的家里都比较有钱。后来我出去教书，经济上就又好一些。那个南国艺术学院因为没有经费，就把房子租给别人住。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个亭子间，不算小，但是没有床，大家滚地铺。钱是一起用的。我平时教书，星期六和大家一起住，星期日来打牙祭的。你爸爸会烧菜。小菜买来了，别个洗菜、摘菜，他做上手活，只管炒。吃了饭，他们就闹着要我洗碗。我脾气好，又大他们几岁，每次都洗碗，做下手活。那时候你爸爸吸烟，大家都劝他戒掉。钱不多，省下吸烟的钱还好多加几个菜吃。但那时候，你爸爸心里烦得很，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无着落。我还站出来替他讲了几句话，上街买小菜也忘不了带包烟给他。虽然，我们那时已经是党员，但是党的纪律是不允许我们随便接关系的。那时的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中，在特务和叛徒的包围下。一切都得谨慎又谨慎。你爸爸的烟后来是戒掉了，听说是在红军里得了一次很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任伯芳已经和上海党接上了联系。因此，我又向他提出帮助我解决组织问题。10月里的一天，我们两人走在南京路上，他要我充作在军校入党的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写个报告给中央，要求恢复关系，报告由他转。信头写“中兄”并写明他是证明人，否则组织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当时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有些不合适，但由于

入党心切，就照他说的办了。报告由他转上去。不久，中央军委就派欧阳钦在上海黄浦滩（外滩）公园同我接了头，简单地询问后即告我关系已经恢复，并说：即由一位姓陈的交通与我联系。很快这位老陈同志就同我联系了，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给我。

这就是父亲入党的经过。这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寻找信仰的一个真实、又有点悲壮的故事。它的产生不仅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也反映了父亲性格中的一种冲突。它是一种个性，甚至也许是父亲其人独有的理想主义方式的产物。它急切、热烈，也就自然带点偏颇。因为他不斤斤计较，不细致地去权衡利害，所以他就常常造成一种遗憾，一种久远的深刻的遗憾。

是的，父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灵上都罩着这个影子。也许是由于我们党在长期被敌人包围的复杂环境中形成的、对于组织手续过于严厉的态度，也许是由于在繁忙的战斗生活中没有合适的机会，想想看，这种事情应该在什么场合，向什么人，怎样提起呢？总之，父亲确实是一直沉默着。不过，即使是由于轻率也罢，幼稚也罢，父亲总觉得自己是做了一点对不起党的事情，他使用加倍的忠诚和努力来弥补这一点。有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用自己卓越的工作和贡献已经修复了这个缝隙。他没有想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中，这个遗憾，这个缝隙却演变成了罪恶，天大的罪恶。

当林彪、康生、“四人帮”借助政治运动的可怕力量，把假党员的帽子戴到父亲头上的时候，他们认为，父亲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罗瑞卿是永无出头之日了。但是，我的父亲，我的坚强

正直的父亲在痛心疾首地回顾了自己全部历史和严厉地审查过自己的良知之后，却不能够再保持沉默了。在非人的待遇和巨大的精神折磨下，在专案组法西斯式的逼供信下，父亲带着悔恨，带着愤怒，一次又一次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陈述这段真实的经历：

1926年夏，从我那个破产的地主家庭分裂、偷跑出来后，就带着一点进步的倾向（当然是很微弱的）向革命寻找出路。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黄埔武汉分校。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有比较强烈的愿望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大革命失败被敌人打散后，无论是想回四川找朋友，或病困武昌，或因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同任启愤去湘西致流浪各地，或以后同任伯芳到上海，都没有改变这种愿望，有些还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都未能如愿。从中学起，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接近的人都是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带有某些进步倾向的人。我没有同坏人亲密接近过或求助于他们。我没有做过任何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坏事。这些，如果党还没有审察清楚，请求党严加审查。

我的加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但是我到党内来是革命的，不是来混日子，更不是来投机、来破坏的。这是被历史决定也被历史证明了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严重地压迫我，我除革命而外没有别的出路。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不找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因此，我同党发生关

系后，党要我去湘鄂西红军，我就去。到宜昌后，因交通断绝，党要我去一个县委当秘书暂时隐蔽。去后，那个县委不肯接收，说隐蔽不下来，党又要我回上海等交通恢复，我就回。回到上海不久，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就打下了汀州，党又决定我们同行的两人，一去闽西上杭游击队，一去闽西永定游击队，我都是坚决服从的。

我在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工作三十几年，党给了我职务，并有不少重要职务。每想起此事心里总觉不安。职务每提拔一次自己就震动一次，但是总以“好好为党工作吧，我又没有对党破坏”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工作的。除上述这个问题外，我在党内确实没有再做过任何坏事。我的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些还带有它的严重性，但那是我对于马列主义和主席的思想，对于主席和党的路线、政策、指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没执行好所致，决非我有意损害党。

我必须说明的是，这段往事多少年来，甚至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父亲的心上，压在我们心上，压在许多关心父亲、爱父亲的人们的心上。

1975年的早春，我从插队的陕北途经北京来到福州。那时候，出狱不久的爸爸妈妈都在福州休养，而主要是因为福州有一位姓林的中医骨科大夫，父亲在他那里治腿。

经过长久的分离之后，能够比较长时间地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幸福。还记得我刚到的那天晚

上，爸爸妈妈和我坐在汤井巷省委招待所一幢二层楼的会客室里。会客室那么大，可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并不宽大的长沙发上。我们说啊、说啊，说的什么，今天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不停地说着。汤井巷里的春夜是这么静谧，不时从哪里飘来幽幽的花香。我觉得世界上仿佛就剩下了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坐在那里感受着爸爸妈妈身上的体温，他们的气息亲切地拂过我的脸颊，他们的声音那么温柔地震荡着我的耳鼓。

我们沉浸在天伦之乐中。每天晚上，我和妈妈先向父亲道别，然后我还要在妈妈的房里磨蹭到不能不去睡的时候。每天早饭之后，规定是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妈妈看书，我学英语，父亲读报和治疗。午饭时又会成为一个欢乐的聚会。一些最普通的关于饮食起居的相互关心和询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享受。

一天，吃过早饭，我正和父亲在楼下说话，妈妈喊我到楼上去。我觉得父亲的脸色有些异样。他注视着我走上楼梯，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妈递给了我几页纸，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上面是父亲的笔迹。那几页纸对我的吸引力，使我都没有能够注意妈妈的表情。我读着，尽量让自己的心跳得不要太快，尽量让自己准确地去理解字里行间的意义。我又一次感到了由高大的白玉兰树遮掩的汤井巷招待所里的静谧。

父亲写的，正是他入党的这一段经历。是写给我们的。当然首先是写给妈妈的。就像他写给党，写给主席的一样一丝不苟，甚至充满了更多的自我责备。我读完了。我看着妈妈的脸。妈妈对我说：“爸爸妈妈觉得这件事应该让你们都知道。”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我把那几页纸放回到妈妈的书桌上，我觉得它们仿佛有千斤重。我呆呆地站着。

妈妈又说：“你下楼去吧，爸爸可能还有话要对你说。”

我下楼去了，妈妈留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走在楼梯上，楼上的妈妈和楼下的父亲都没有声息，只有我的脚步声。我想尽量梳理清我的思想，但是我不能够。

父亲坐着，保持着我上楼去时的那同一的姿势。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我说不上是为什么，只觉得自己没有这种勇气。

父亲说：“你都知道了。这是爸爸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你们不能原谅我，甚至不再认我这个爸爸，我都能够忍受……”

我哭了，泪水一下子涌出来，我觉得我那颗脆弱的心再也容不下这许多激烈的情感。而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壅塞在我心中的那种情感是什么了。那是一种感激，是一种强烈复杂得到今天我也解释不清楚的感激。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们生了我，养了我，给了我血肉之躯，给了我做人的尊严。今天，在你们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你们仍然这么艰难地，给了你们的女儿以这样诚挚的信任和博大的爱。我能做什么呢？我只能任自己的眼泪流淌。我愿意用它们去冲刷掉覆盖在爸爸妈妈心灵上的哀伤。

我没有去拥抱父亲。我觉得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难和折磨的父亲，此时此刻在我眼里是那么高大，那么圣洁。我说：“爸爸，相信我，我绝不……”

父亲相信我了，是的，他一定是相信我了。他抬起一只手。我把这只手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我觉得它是那么温暖。

我们共七个兄妹。就是说，父亲也许经历了七次这样痛苦而严峻的时刻。亲爱的父亲，你真是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啊。

一直到不久之前，几乎是在我拿起笔来将这一段往事记录下来时，我忽然发现，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父亲自己，在这件事的认识上面都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

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不正常的组织审查手续，给我们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这些东西使我们背上了多么沉重的精神枷锁啊。我们被这些虚妄的概念禁锢着、压迫着，以致于使对自己，对他人应有的正确分析模糊起来。看不清事物表象后面的真正本质。

为了党，父亲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贡献出来呢？负伤、流血这些暂不去说，他蒙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受了那么多磨难。可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战斗、工作，竭尽全力去创造第一流的成绩，和党从无二心。难道他不该享有共产党员的称号吗？可是当时，我们被什么东西蒙住了双眼，我们为什么被这样一个僵死的所谓组织手续的问题苦苦地折磨呢？

当然，后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父亲理所当然地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他重又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了重要的职务。父亲去世以后，由邓小平同志宣读的悼词中对父亲的入党这样写着：“罗瑞卿同志是四川南充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事革命活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

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承认和慰藉了自己的忠诚的战士那颗不平静的心。在短短几千字的追悼词里，是不可能详细地去陈述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的，何况还带有那么特殊的历史

的、道德的、感情的因素。

说起来 也许有的人不会相信。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工作一直到他匆匆辞世，并没有什么人对“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和被诬陷的种种罪名做过一个正确的结论。父亲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个，只要党给他工作的权利，只要给他为人民做事情的机会，他就把自己的冤屈、个人的恩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给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是在父亲去世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做出的。

悼词、平反决定 这一切父亲都不会知道了。但我知道 父亲的心是坦然的。他相信党和人民会给他正确的评价。但是，我还是多少次深夜醒来，总觉有一件事堵在心头。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把这件入党的组织手续的事情留在心里，仍然觉得它是一个拂不掉、抹不去的遗憾。我忘不了父亲对我说过的那句沉重得像千斤磐石一样的话：“这是爸爸的错误 为了这个错误 你们不能原谅我 甚至……”

父亲啊 我亲爱的父亲。如果你在天有灵 如果你地下有知，你一定听得见女儿的声音：这不是，这绝不是你的错误！你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你在共产党人的鲜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那么急切地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这是你的光荣，无上的光荣。女儿为您骄傲，为有这样一个正直、勇敢的父亲感到永远的骄傲。

绿色大山中有红色火种

父亲找到了党，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总算落回了原处。那时正是 1928 年的 9 月。

大革命失败之后，从血泊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认识到了革命的成功必须有一支独立的、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在这期间，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

除了大家熟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如洪湖地区、海南岛、海陆丰、河南确山、湖北黄安、麻城、赣西、赣南、鄂北、闽西等地的农民起义。

这些农民起义的武装，真的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是星星之火，是很小很小的光和热。蒋介石那种“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样子，当然看不起这个。对这些在荒山野岭之间“流窜的土匪”不只是他们，就是全中国、全世界的大多数人，乃至参加了这些起义的不少人，都没有能够预想到这点很小很小的火，能够燃成燎原之势，能够取得整个中国的政权。只有那些共产党人，而主要的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他们相信这一点。相信山沟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重温那一时期的历史，你会感觉到把这些零

散、弱小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成长、壮大，步调一致地去和反动势力做斗争，这实在是一桩丰功伟绩，是一桩近似神话的事。

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地下党派往红军去的。父亲呢，是个黄埔生。不知道那时人们是不是把具有黄埔学历的人看成知识分子，但是这所在大革命中创办的军事学校确有很好的名声，无论是在共产党里，还是在国民党里，上过黄埔的人都是很神气的。

1929年1月，党原来决定派父亲去湘鄂西红军的。走到宜昌，因交通断绝，在当地又不好长期隐蔽，只好又折回上海。在上海，父亲仍然住在那个亭子间里，和那一群四川籍的同学同乡滚地铺。

我猜想，那一段的时间，父亲心理上是轻松愉快的。他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说上海有一个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此时他多少有点恶作剧地邀了三个同乡去逛这个公园。当然，这个公园已经不挂那个臭名昭著的牌子了，但还是门禁森严。而且票价很高，在里面活动的大多还是洋人和一些买办。父亲他们一行四人，只拿了一张门票，不知怎样混了进去。游逛了一番，大约还是因为衣服太寒酸，使一个外国佬起了疑心，要查他们的票。一查，四个人只有一张票，外国人自然大光其火。他们本来还嘴硬，后来又想溜掉，但却没有成功，于是被押到外国巡捕房里去。多亏那个老大哥一样的任白戈赶来，出了钱把几个人保出来。

任务一时下不来，父亲还得等着。等待总是让人心焦的，何况父亲这么个爱动、闲不住的人。父亲就去看戏。前面说过了，

父亲爱看戏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差不多是个“戏迷”了。这也许要归功于四川民间浓郁的文化色彩和传统。唱戏，是那时乡间一种较为普遍的喜庆活动，婚丧嫁娶，逢墟赶集都少不了的。那时南充一带的戏班子是很多的，许多都是靠卖唱为生的穷苦艺人 但恰恰是这些唱戏人 重戏德 轻钱财 肯用真本事。忠臣烈女，清官豪杰，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罩上了强烈的浪漫色彩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父亲。这些经过岁月的洗炼、浓缩且净化了的关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故事，不仅使父亲得到艺术上的享受，甚至还影响了他早期道德观念的形成。

走出四川 便知道了 世上还有许多好戏 不仅仅是川剧。那时的上海戏剧舞台上 不乏大师 梅兰芳 周信芳 都正是叫得最红的时候。父亲马上被他们的艺术吸引住了，只要有机会，就去看他们的戏。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买票的钱哪里来？

有一次，父亲知道梅兰芳又在上演一部父亲没有看过的新戏了，但却正是父亲手头很拮据的时候。父亲徘徊在戏园子的外面，听到里面紧锣密鼓的，自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狠了狠心，回到住处把铺盖一卷，送进了当铺。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早晚要到红军里去，另一方面实在是戏瘾难耐。他买到了票 进去时 戏已经开演了 戏园子里人山人海 做小买卖的吆喝声盖过了台上的唱戏声。父亲站得老远，迷迷糊糊把戏看完，不仅没听清，连哪位是梅兰芳先生都没看清。全国解放以后，父亲又见到梅先生，把这段早年的故事讲给梅先生听。梅先生笑着对父亲抱抱拳说：“罪过 罪过 要不要我退你的票钱 把你的铺盖卷再赎回来呀？”这段小事不仅说明了父亲迷戏迷到什么程度，还证实了侯宝林先生在《听戏》那段相声小段里描写的旧戏

园里那种人声鼎沸、混乱嘈杂的情景是千真万确的。

大约是 1929 年的 3 月份，毛主席率领井冈山红军第四军到闽西打下了汀州，并打死了军阀郭凤鸣。军委决定把父亲派到闽西红四军去工作。

交通老陈送给我路费和到厦门的船票。我们同行共七人，坐的是日本的海船。刘安恭由罗明带路，坐房舱。我同一位湖南人叫曾省吾的，由厦门市姓周的市委书记夫妇及另一交通带路 共五人 还带有党的文件 坐统舱。统舱里连电灯都没有，一片黑。刚要开船时，几个日本侦探打着强光电筒，就在我们坐的附近抓走一人，以后听说是海盗，因此把统舱乘客全部赶上岸。船开了 那一晚 只有刘安恭、罗明二人走了，我们没有走成。又过了大概三五天，我们改乘一艘法国邮船，才到了厦门。

到厦门后，我们得知红四军已折返江西。省军委又决定我同曾省吾二人先到闽西的两个游击队工作。曾去傅柏粹的游击队，我到张鼎丞的游击队。傅在上杭蛟洋区，张在永定某地。后来我和曾省吾两人都在傅柏粹的游击队里当了教官 教队员们出操、上课、瞄准等。我就没有再去张鼎丞处。

到傅柏粹处不久，红四军又重入闽西。我们同游击队到庙前、新泉地区迎接红军，随即跟红军一起南下，攻克龙岩并消灭了土匪军阀陈国辉部。

闽西，那里是一座连一座的绿色大山。1928 年春 在福建省

委的领导下 郭滴人、朱积垒、邓子恢、张鼎丞等共产党员 领导了席卷闽西的长乐、后田、永定和蛟洋暴动，使闽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由于敌强我弱，缺乏军事人材和作战经验，缺乏武器弹药，尤其在全国革命形势尚处于低潮时期，暴动至七八月便失败了。只剩永定、溪南、上杭、蛟洋等处 还保存着少数农民武装在山上打游击。蛟洋 当时为上杭县北四区 地处龙岩、上杭、连城三县交界 距三个县城都在百里以上 崇山峻岭 地形险阻，人口逾万，粮食有余，是闽西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的最理想地区。当时游击运动的领导人，现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傅柏粹先生这样对我们说：

“我的家离蛟阳二十多里地。我们那支游击队是 1928 年 6 月暴动后的队伍。我们在山上打游击，是一块小小的农村割据。我们常常在上杭、蛟阳一带活动。当时，省委书记是罗明。罗瑞卿同志是 1929 年 3 月下旬，由省委派到我的家乡来的。我们组织了教导团 人数不多 大约四五十人 他来当教官 还有一个湖南同志 叫曾省吾的 两人一同来的。

“那个时候 部队里都是农民 服装不整齐 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制式训练 又要打仗 又要搞饭吃。罗瑞卿同志来 就是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从黄埔来，在部队里算是很有学识了，又懂军事。

“记得他来的时候 头戴一顶礼帽 穿着灰色长衫 脚上是一双土布鞋（不分左、右脚的）样子很斯文 像个教书先生 大家都称呼他‘罗老师’。教导团成立后 大家又喊‘罗教官’。他个子高，很爱整洁，衣服总是穿得很整齐。那时我们没有马，可他老爱手里拿个马鞭子。说话声音很洪亮，很清楚。他说他最喜欢听邓演

达讲话，邓是黄埔的教育长，很有演说的才能。他很看不起蒋介石，说蒋介石不会讲话，口齿不伶俐。

“那时候，大家彼此之间有意见的事也是有的。罗瑞卿同志批评别人是很厉害的，我也被他批评过。党员开会没什么可客气的。我当时对部队里的一些风气看不惯，不想带兵，不干了。朱老总还来调解，说我，你不能讲不干嘛。我说那我干好了。朱老总说：干就好，干就好。罗瑞卿也来批评我，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我就顶，年轻气盛嘛。我说：我是地主阶级出身嘛，有农民意识就好了，就算进步了。在我这里找工人阶级意识，那还不是缘木求鱼吗？不过，罗瑞卿不在乎这些，他很认真的，该说的就说。队里有几个干部对我很不好，可我还请他们吃饭。罗瑞卿就又跑来批评我说：‘嗨，你的态度变得倒快啊。’他还说我说话不爽朗，又说我的大节方面是好的，只是小节上有点小问题。

“前面说过了。罗、曾两位同志3月来，我们成立了教导队。6月，省委让我们编成红五十九团，迎接红四军入闽。我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说起来，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人数很少。敌人把我们吹成几千，其实我们最少的时候只有八个人。当时，我们对外号称福建红军，我的名义是福建红军总指挥。一些地方武装也打我们的招牌，搞些绑票、勒索的事情。

“这时候，毛主席带红四军到了蛟阳，后面有敌人的追兵，前面因敌情不明，还没有决定是到永定，还是到龙岩。起初听说我们的力量很大，后来才知道我们哪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在庙前，部队正在犹豫，听说我们一个教导队在离那里十几里的山上，就派人送信同我们接头。傍晚，我同曾省吾赶到那里见到毛主席，

向他作了汇报，这样就决定部队向龙岩走。

“第二天清早，我们赶到游鱼坝发动群众，迎接红军。放鞭炮 呼口号 插了很多红旗。红军来了一看 很高兴 这里也有红军！一个个勇气倍增，当天赶到古田，并解放了古田。

“我们第二天赶到蛟阳，罗瑞卿同志带着教导队也来到蛟阳，通知附近游击队都来，成立五十九团。记得是阴历四月十八改编成立五十九团的。”

傅柏粹老先生的记忆力是相当好的，他竟然还能记得阴历四月十八这个日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闽西这支革命的地方武装，经过多次的整编和配合主力红军进行了多次战争，如“三打龙岩”之后，约在1929年6月中下旬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自此，四纵队作为红四军——赫赫有名的朱毛红军的一部，出现在红军序列上，由傅柏粹任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四军派来的军事干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参谋主任。成立大会在新泉召开，由朱德军长宣布了前委的命令。

父亲也就是这样开始了他直接追随毛主席的革命战争生涯。

在龙岩期间，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经表决 毛主席不再担任前委书记 改由陈毅担任。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四纵队参加大会的还有傅柏粹和士兵代表官颢侃。父亲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到：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

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中。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红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约在当年（即1929年）8月，红军打下了上杭，我被调到二纵队第五支队当党代表。同我一同到红区的曾省吾同志在打上杭爬城时英勇牺牲了。

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内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战斗中，梅县敌人主动退却，我军曾一度占领梅县。因敌人反攻来得很快，我亦很快撤出，到了东江——当时的一个小块游击区。不久，我们又第二次去打梅县，这次就打了

一个败仗，于是连夜撤走。经江西安远等地，部队到了福建汀州。

到汀州后，主席身体好了，回来了。一次干部会上，主席作了时势报告。在会场上，主席看见了我，问我从哪里来的，现在干什么。我都一一作了报告。这是主席和我的第一次谈话。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集了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开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村，主席亲自主持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军队的建设起了划时代的作用。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决议除了发表在主席著作上的以外，记得还有《严禁枪毙逃兵》、《严禁打骂士兵》、《严禁烧屋行为》等单项决议。

正是这个时候，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议到了，在这个会上作了传达。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分歧的。记得二纵队一个叫张恨秋的人发言说：陈独秀的道路同党的道路是殊途同归。主席当即痛加驳斥。全场热烈鼓掌。

会议期间，部队分散在闽赣边界筹款、做群众工作。会后敌人进攻，将一、三纵队与二、四纵队隔断了。主席率二纵队经宁化、清流、归化，进入江西广昌，在广昌以北与一、三纵队会合。

到江西后，罗荣桓同志到二纵队当党代表。1930年1月部队分散在行田、石马一带做群众工作、筹款。前委指定张际春、赖传珠和我组成石马行委，我为书记。我们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每天晚上研究总结工作，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并向主席写送简要报告。

石马工作结束后，部队到行田集中，宣布要我做二纵政治部主任。部队随后打水口、直下，消灭了国民党军唐云山一个旅。以后，部队进到兴国县，并相机袭击了赣州的敌人，未奏效。部队转到南康、大余，占领了赣粤边界的要地梅岭关。随即一天走一百二十里，打三仗消灭了一部分广东的敌人并占领了南雄。随即又回师江西，打开了信丰，做了一段群众工作，以后转到寻乌、安远，在那里分配了土地。再后，部队又转到了福建汀州。

这时“立三路线”来了，时为1930年6月。命令红军去打南昌、九江，对左威胁武汉，对右威胁南京，并配合城市暴动及其他地区的红军夺取全国胜利等等。

此时赣南、闽西红区，在主席的领导下都有很大发展。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都有所扩大。“立三路线”命令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里面去，毛主席抵制了这个命令。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红军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即以原四军一、二纵队及闽西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四军。原四军的三、四纵队及另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十二军，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指挥上述两个军及黄公略的第四军。记得江西地方红军还成立了一个二十军，亦归方面军指挥。此时，二纵队的司令员改成曾士峨。第四军军长是林彪。从此时起，

纵队改成师，二纵队称为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

部队改编后 毛主席指挥全军北上 出江西 下樟树 沿途打了一些小胜仗，全军由樟树西渡赣江，进入赣北上高安地区。部队略事休整 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我军并未去打南昌 因为敌情、我情均不容许。只在八一纪念日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南昌车站去打枪示威。

部队随即转入湖南，在浏阳文家市消灭了敌人戴斗原一个旅 后即与红军三军团会合 第二次打长沙。此时 罗荣桓同志被调为第四军政委（此时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命令我为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

长沙打开不久，敌增援部队又将到，主席说服了一些“立三路线”执行者 而事实也教训了他们。于是将部队分散配置于醴陵、茶陵、攸县广大地区 进行打土豪、筹款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我们师先驻渌口 后到醴陵。此时部队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

随后部队转回江西 占领吉安、峡江地区 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此时主席看出敌人的“围剿”快来了 决定东渡赣江，转回赣南根据地，进行休整兵力和其他反对敌人“围剿”的准备。

英 雄 们

1975 年的夏天，还是在福州汤井巷里，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父亲在楼下的小会客室里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天气热极了，我们把四面的窗户都打开，除了枝头上蝉儿不歇气的叫声更刺耳地传进来，却没有一丝风。那正是“四人帮”最猖狂的时候，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都充斥着他们和他们御用文人们涂写的奇谈怪论。

但是父亲总用他惊人的耐心来阅读这些文章，也许是他改变不了多年认真读报的习惯，也许是他的洞察力确实能够使他从中获得一般人无法获得的重要信息。不过我是心痛父亲的，他的腿正在治疗，坐长了腿要痛，腰背都要痛。天气这么热，汗水把他的衬衫都浸湿了。我不愿意他这么累地读报，这么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压痛了腿，看花了眼睛。

记得那时候，张春桥提出一个故作惊人语的说法，叫做攻破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我就用这个来和父亲打岔。

“爸爸，什么叫土围子？”

父亲略略沉吟了一会儿，给我讲了一段关于“土围子”的往事。

“1932年的5月，红军撤出漳州。红军第四军、第五军和当时宁都起义部队的一部编成的十五军，共三个军已经组成了红军一军团。林彪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我是第四军的政治委员。我们的军长叫王良，一个高高大大，作战十分勇敢的同志。

“在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叫大禾镇的地方。那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听说红军来了，就缩在土围子里对我们进行顽抗。土围子四面都是高高的墙，墙上有枪眼、有碉堡，易守难攻。修得好的土围子就像一座小小的城池，有城门，有吊桥，甚至还有小小的护城河。大禾镇的这个土围子倒没有这么大，但是地主武装却顽强得很，阻挡了我们的道路。总部指示我们要尽快打掉这个土围子，给部队开通过路，并要我们用在漳州缴获的步兵炮试试，看能否将其打开。王良军长、粟裕同志还有我一起去侦察情况。总部特务连的一位连长给我们带路。我们几个人为了更好地观察敌情，走到离土围子很近的一间破房子里边。那时候我们用炮还没有经验，总想看得清楚一点，为炮兵多提供点情况。王良军长脖子上挂着个望远镜，站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那破房子的墙都已经倒塌了，也怪我们太小看了这些地主武装，没有很好的隐蔽。敌人却狡猾得很，大概已经觉察到来人不是一般的干部，突然向我们打了两发冷枪，王良军长当时就牺牲了，站在我侧后方几步远的总部特务连长也当场牺牲。这个土围子后来当然是被我们打开了，但是王良军长牺牲得太可惜，太突然了。一个那么勇敢、那么会打仗的同志却牺牲在地主武装的冷枪之下。这些可恶的地主土豪的土围子，曾使我们牺牲了好几个高级干部。原二纵队的司令员耿凯，在反敌人三次‘围剿’后到四军来当参谋长，

也是在江西某地打土围子，不注意，被敌人的冷枪打中而牺牲的。”

父亲对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和表情都沉重极了。我确实没有想到，一段已经这么久远的往事，对于身经百战，又屡遭磨难的父亲仍有这么强烈的感染力量。父亲仿佛全身心都沉浸在对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思念之中，早就忘记了我们谈话的缘起，也忘记了我的存在。这包含在沉默中的情感显得沉甸甸的。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某种震动。我忽然意识到，父亲和那些千千万万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的战友们距离是那么近，他们正用心灵在交谈。那也许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他们，一起流过血，共同经历过生死搏斗的人才能找到共同的语言。阴阳两界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父亲是一个并不幸运的幸福者。

多少次，父亲也是必死无疑的，但他又总是奇迹般地迎来了某种转机，下面是父亲第一次负伤的经过。

那是在 1931 年的二三月间。蒋介石不顾第一次“围剿”的惨重失败，又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从各省调集了二十余万兵力。红军则是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信心百倍地去迎击凶恶的敌人。5 月中旬，各方面发展均很顺利，红军开始反击。当时担任十一师政委的爸爸和师长曾士峨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东固附近的观音岩。那一仗，对手是国民党韩德勤部的五十二、八十一军。关于这一场战斗的情况，我最早是在一篇叫做《横扫七百里》的回忆录里读到的，作者是刘亚楼。父亲去世以后，杨得志等同志又在追悼的文章里多次提起过。现在武汉市的谢滋群同志，当时在司令部当通讯员，杨得志是他的班长，父亲

负伤后是他护送父亲去医院的。所以他的话读起来会更生动一些。

“观音岩地区易守难攻，敌人两个军的兵力武器、装备都比我们好得多。战斗是很激烈的。那时候规定，军事指挥员走前面，政委走在部队后面。不过，每次一打响，罗政委就上来了，跑到最前面。这次也是一样，枪一响，罗政委就跑上来。他和师长曾士峨同志站在最前沿，观察部队的运动情况。战士们都很勇敢，但是山势很陡峭，攀登起来很困难。守敌猖狂得很，他们的枪好，火力十分密集，子弹在我们耳朵边吱吱地叫。大家都不晓得害怕，就是想赶快爬上山顶，消灭敌人。一颗子弹突然打中了罗瑞卿同志，我看着他倒下来的。一时不知伤到了哪里，只见很多很多的血从头部涌出，一下子就染红了衣服，头发也都湿透了。担架抬来的时候，罗政委已经不能讲话了。伤势非常严重，经过包扎，血好像还是止不住，走到医院的时候，血把担架都染红了。”

红军那时的医院条件差极了，除了纱布棉花，最基本的几把镊子、剪刀之外，仅有的药品就是一点碘酒和珍贵得像金子一样的磺胺。父亲被人抬到医院的时候，似乎神态还清醒，但就是血把眼睛糊住了，看不见，也说不得话。他被抬上手术台的时候，心里也明白得很，那时候没有麻药，所谓手术也就是最简单的清创缝合吧。伤势很重，受伤的部位就在左侧的头部靠近太阳穴的地方。子弹穿出去了，但是颅骨破了，手术未能取出碎骨头。医生不敢动，说那里太危险了。

医生在父亲身边嘀嘀咕咕地说：“这人恐怕活不了了，通知后勤部门做棺材吧。”他们以为父亲听不见，但是父亲全听见了。

一会儿，隔壁的屋子里果然传来了拉锯子做木匠活的声音。那两个做棺材的人还说：“棺材得做得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这些话，父亲也都听见了。他觉得人家说得挺对，他大概真是活不成的。

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两天……，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不过却没有死。棺材不知做成了没有，反正部队转移的时候，又做了一副担架把父亲抬上走了。

一日三餐都没法儿保证，仍然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治疗。就是睡在担架上走啊，走啊。几天过去了，父亲觉得好多了，睁开眼睛看看，天空又高又远。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出星星，风吹着，日晒着，有时候雨淋着。不过能又活过来，父亲就觉得挺好。有一次，医院的大队人马停下来休息，一个小鬼卫生员挎着个装满了棉花纱布的药包包来换药。那时候的卫生员也没经过多少训练，纱布被血糊住了，拉不下来，就硬拉。结果伤口上刚刚结的一层痂皮一下子掉下来，血又涌出来，像小喷泉似的，又染红了衣服，又糊住了眼睛，浸湿了头发。父亲心里想，这下子完蛋了，逃过了初一，逃不过十五。卫生员闯了祸，慌慌忙忙跑去找医生。医生到底要比卫生员强，使劲儿捏，使劲儿按，总算止住了血。临走，又往伤口上大方地倒了一些磺胺粉，告诉父亲说，这种东西又止血，又消炎，灵得很。从此，父亲特别相信和感谢这位医生，也特别相信这种又消炎、又止血的磺胺粉。一直到进了北京，有了我们这一大群娃娃，有谁磕着碰着了，父亲还说要我们上磺胺粉，还说这种药最灵的。

那位医生，叫做叶青山。几年前，我曾在北京军区干休所他的家里拜望过他。老人鹤发童颜，戎装齐整，既有军人的威严，又

透着一股儒雅之气。我向他讲起当年的事情，并告诉他，父亲一直对他感念不已。老人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我救了他 那时候我有什么？碘酒、纱布而已。是你爸爸年轻，年轻救了你爸爸的命。”我想 叶老说得很对。实际上 父亲负伤以后 因身体虚弱 天天日晒雨淋 很快又并发了大叶肺炎 高烧、昏迷。不过 那一年父亲是 20 岁 所以 靠年轻 他又活下来了。从此 在他右边的太阳穴稍稍靠下的地方留下了一块伤疤。这个伤疤影响他的咀嚼功能，嘴巴也只能张开有限的宽度。所以，他说话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好像咬着牙的感觉。于是，很多人都知道，父亲在宣传鼓动部队的时候有了一句名言，叫做：“干革命是要咬紧牙关的，我罗瑞卿是早已咬紧牙关了，你们是不是也都咬紧了牙关啊……”

死亡对于丧失了生命的人来说是沉重、庄严的，但是对于死里逃生的人却带上了一点儿喜剧色彩。父亲把这一次负伤的经历叫做“又摸了一回阎王爷的鼻子”。他把这归结为自己“命大”。从此以后，他更把生死置之度外，仿佛生命已是他额外获得的财富。而实际上 做为一个终生的革命者 他的使命感 责任感却正是随着这些不平常的经历在增长、成熟和完备。当他的热血洒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时，他和革命事业建立了真正的血肉关系。充满苦难、艰险的漫长道路，复杂和残酷的斗争，被他视为津津乐道的革命生涯。他知道自己革命的儿子，注定要去为这个事业拚命、流血，为她奋斗终生。

现在 流行这样一句话 叫做：“革命者是人 不是神。”这话，是为纠正一种偏向而存在。然而，这话本身也带有一种偏向。当然，我并不认为革命者是神而具有呼风唤雨、不食人间烟火的超

自然的力量，但是，革命者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不是芸芸众生。

在古老的希腊神话和传说中，有这样一种形象。他们与奥林匹亚山上那些终日宴会歌舞，喜怒无常，喜欢主宰别人命运的众神们不同，他们与尘间俗界那些只会忍受痛苦，在疾病、贫穷、愚昧中苦苦挣扎的凡人也不同。因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风流神仙和大胆美丽的人亲爱结合的产物，所以他们既具有人的情感、人的思维，人的对客观世界——痛苦和欢乐正常的朴素的感知，同时也具有超人的意志和创造力。他们能够坚韧不拔地去奋斗，去始终不渝地追求一个目标。他们能够克服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杀死妖魔，和巨龙搏斗，他们能找到象征幸福和智慧的金羊毛和金苹果。他们比人更自觉、更勇敢、更聪明。所以他们也就比人更高大，更美丽，更有力量。他们的名字就叫做——英雄！

革命者、共产党人就是英雄，是那个非凡的年代里和巨龙搏斗，为人类寻找正义的英雄。是人民群众中的先知先觉者，是出类拔萃之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在不到三十年的时光里就彻底改变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呢？

当然，关于英雄的故事是充满艰险和磨难的啊！

漳州，是福建南部一个美丽的小城市，1974年，我伴随父亲在福州治腿的时候曾去过那里。父亲当时因为腿不方便，未能与我们同行，但是当我们回到福州的时候，父亲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们漳州的情况。“那座红砖砌的小楼房还在不在呀？”大教堂是不是原来的样子？“大广场还在吗？没有再盖上房子吧？”

原来，那里也是父亲打过仗的地方，虽然四十多年了，可打过仗的地方是总也忘不了的。

1932年初春，红军按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强攻赣州不克，遂于2月召开江口会议，经激烈争论，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张从赣州撤出乘敌不备远征漳州。

1932年3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由红一军团之第四军第三军和红五军团之十五军组成东路军，同时，红一军团领导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原红四军军长林彪任军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四军军长由王良担任，父亲是红四军的政治委员。

东路军组成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担任领导和指挥。林、聂担任东路军司令、政委。1932年4月1日东路军总部移驻长汀，2日，在长汀召开福建省委会议，讨论进攻漳州的政治军事部署。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东路军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4月13日东路军主力从龙岩出发经马坑、水潮、马山、南坪直逼漳州。18日毛主席亲临东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漳。19日拂晓东路军主力向天宝山、凤霜岭、十二岭一线之守敌发起猛攻。这一带，为漳州西部的最后一道屏障由此往东直至大海无险可守是为攻守漳州必争之地。该线守敌也极为顽强，激战至上午9时担任主攻的红四军第十一师首先突破十二岭一带阵地，敌人遂全线溃败，在红军迅猛攻击下残敌无路可逃全部被歼是役俘敌1674人缴获枪炮弹药无数。红四军攻下天宝山后，从西门直入漳州。漳州早是一座空城敌之残部向泉州、厦门一带狼狈而逃。红四军紧追不舍在江东桥一带消灭了大量敌人。

进漳州之前，红四军的王军长、罗政委发布指示，确定由第十一师部队入城，宣布了严格的入城纪律和注意事项，并特别强调：凡驻城内的部队，上街时必须以班排为单位整队行走，不许个人随意行动；凡驻城外的部队，无论集体或个人一律不许进城。如有事进城，必须有师部的证明。

20日上午8时，红军开始入城。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入城担任警卫部队，该团集中全团司号员为前导，一声口令，红旗高扬，军号齐鸣，红军队伍步伐齐整，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列队行进，威武雄壮。群众纷纷拥上街头，夹道相迎。红军声威顿时传遍漳州四乡、闽南村镇。

漳州城内人口虽只有五万，但此地靠近沿海，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所以地方富庶，物产较丰。夺取这个富裕的小城市，对于红军来说是一个新的经验。没有入城之前，部队就进行了严肃的纪律教育，安民告示是在汀州就印好了的。所以，红军进入漳州后不仅没有引起骚动，反而给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闽南地区土匪很多，国民党也宣传红军就是土匪，但是这一次，人民相信了红军不仅不是土匪，还是一支纪律严明、爱人民的军队。入城的第二天，街面正常开市，人民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父亲曾经这样写道：

红军一军团打下漳州后，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和指示，部队分散在以漳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前锋逼近厦门。此次胜利消灭了敌人，征集到大批款子和资财，并第一次缴获了敌人的飞机。五一纪念，飞机涂上了鲜红的颜色，由一位上海来的朝鲜同志驾驶，飞临漳州地区所

有三个军的部队驻地上空 散发传单 全军得到了很大的振奋。

这架飞机 很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我们只在纪念馆里看到了那架飞机的照片，飞机的四周，拥挤着许多笑哈哈的红军战士。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照相技术的问题，那张照片的反差很大，红军战士一张张黧色的脸上，露出一口口雪白的牙齿。无意之中却加强了这张照片喜洋洋的气氛，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由于红军是第一次进入较大的城市，这些从大山沟沟里来的红军战士，在许多新鲜的事物面前，不免闹了许多笑话儿，首先是不认识抽水马桶，后来知道这个白白净净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了 就觉得可惜得很 简直是造孽。大家决定都不用 来一个共同抵制。很多富商听了反动派的宣传逃跑了，房子里空空的，战士们走进去 看到沙发、席梦思床，一坐 陷下去一个坑 吓了一跳。部队缴获了一些罐头、啤酒，很多人是颇费了周折才吃到肚子里。还有人剥开了皮蛋的皮，一看黑了，以为坏了就都丢掉了 还说 这个老板 好没心计 这多鸭蛋都放坏了。许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有些人还记得是《唐伯虎点秋香》。这些东西，都让人觉得新奇得很。

4月21日，全军休整一天。毛主席在漳州芝山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座楼内，召集东路军的师以上干部开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 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上好几百里，一下子打到这里 简直是天兵天将。”

23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红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

宝、南靖一带 红四军在漳州、石码、海澄、长泰等地 并担负厦门、泉州方向的警戒。

当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九龙江上游泛滥，石码镇河口洪水暴涨、水流湍急。石码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已经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些警察，由保安队长李玉泉领着，在石码观望风向。李玉泉排行老二，老大李玉树是土匪，被国民党收编后，担任了保安团长。老三李玉竹是伪侦探队长。李玉树和李玉竹跑了，留下李玉泉，幻想保住石码这方势力。

说来可笑，李玉泉一伙也闹不清红军究竟是什么队伍，还以为是同孙连仲的第十九路军一样的军队。他不但派人到漳州去摸底，还在石码镇恭迎红军。商会也在石码南公庙前一间郑氏祠堂摆下茶点，迎接红军。当日下午五时左右，前卫红军开到石码。百余名红军战士身材不高，精壮结实，年纪轻轻，个个背着红绸大刀 手提花机关枪 严肃威武地开入石码。到石码 是由当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的爱人谢小梅找了她的堂兄谢仰高为红军带路。进了石码，地下党早已派人在街上贴出标语，“没收当店，反对高利贷剥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实行统一累进税”；“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但由于伪警察和商会人员摆着架子在迎候红军，地下党一时倒不敢突然同红军接触。

直到红军在石码商会驻下，地下党员才去同红军接了头，并告诉红军，李玉泉等是一伙人人痛恨，罪恶累累的土匪恶霸。

第二天，在石码公园召开了欢迎红军的大会。据记载，红军在石码一共开过三次大会，每次会上，父亲都讲了话。那时候当政委，大概要很会讲话。即兴的，符合实际的，富有煽动性的讲；

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惯用的那种死板的，准备好稿子的（而且还要秘书准备），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讲。讲什么呢？一开篇就作了检讨。他说红军初到漳州，有些情况不了解，进石码时敌我不分明，致使反动分子来欢迎了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不敢和我们接近，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接着他又当着群众的面，对红军战士说：这次红军进驻漳州、石码，和过去在山区的环境不同，大家同志们要注意军容风纪，着装要整齐，衣服要穿好，帽子要戴正，纽扣要扣好。光做到这些还不够，大家同志们还要懂城市政策。这里是沿海地区，和山区不同。不要看见红砖小楼房就认为是土豪地主而谈打，给敌人留下反面的宣传材料。以后我们打土豪，一定要先搞好调查研究，还要防止一些人假公济私，进行报复，冤屈了好人。只要我们做好调查研究，打土豪就不会打错，真正爱护红军，拥护革命的父老乡亲们也要帮助我们，不要相信敌人的谣言。敌人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仁义之师，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彻底揭穿敌人的谣

在会上，他还用刚刚了解到的事实向大家揭露了国民党军阀统治的罪恶：此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张毅（北洋军阀时期漳州地方军阀）换张贞，捐税加二升。昨天我还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了卖出去，一共缴过六次捐税。共产党和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这样的老阿婆直直腰，喘出一口气来。接着，他还讲了实行累进税的合理和好处。

那个会开得很活跃，台上台下笑成一片。许多当年在场的老

同志印象还很深刻。

当时，石码的资本家和商人，很多听信了反动派的谣言都逃跑了，资金带走了，店门也都关上了，所以石码镇上的店员和工人很多失了业。会前，红军就组织了一些人四处去做工作，说明这是资本家的抵抗和反动派的谣言造成的恶果。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打倒国民党，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打倒，失业问题就不会彻底解决。会上，当父亲代表红军宣布具体的救济办法，说明会后马上发放大米和救济金来救济失业的工人的时候，会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随后，趁热打铁，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很快成立了石码革命委员会，由当地地下党员林和尚担任了主席。

一位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说：“罗瑞卿同志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要开好一个群众大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家不认识你，不懂得什么叫红军，你一下子跑来又打枪，又打炮，怎么叫人家对你有好印象呐？罗瑞卿同志是有这个本领的。会讲话，声音大得很，四川官话又好懂。他讲话，群众爱听，我们自己的干部战士也都爱听。在那次大会以后，群众情绪高涨，我们随后进行的筹款和扩红工作都很顺利。石码的扩红工作做得尤其好，连厦门都受了影响，有些人从厦门跑到石码来要求参加红军。”

红四军在石码及附近的乡村打土豪，并没收了官僚资本的资财。为了防止土豪劣绅再逃跑，红军在石码戒严了三天。驻石码期间，红军没收了绘记、天涯、惠通、合记、谦亨、聚丰等钱庄，没收了国民党官办的盐馆，共没收二三十家。这些都是属于国民党官僚资本和反动分子的财产。所得的财物，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大部分运回中央苏区。

在石码，红四军还派出部分部队到海澄一带发动群众打上豪开谷仓开展宣传工作。石码城乡一带许多当年红军的标语至今字迹犹存。

在石码期间，聂荣臻和罗明两同志都来指导过工作。红四军军部驻在石码镇大港墘礼拜堂，政治部驻蕃芝连三学校，财经管理处驻在衙门前，负责人李富春。还有一个警卫处，由邓发同志负责。

当时，因为红军打进漳州后影响很大，厦门市委曾派人来与红四军联系，要求红军去打厦门。但红四军没有打厦门的任务，只是担负对厦门、泉州一带的警戒任务。而厦门的军阀、官僚、反动派已慌作一团，帝国主义也惊恐万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在厦门周围的海面游弋，但未对红四军进行挑衅。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伪装投降的李玉泉的情况。因为一开始他毕竟让我们吃了一点小亏。李玉泉投降后当然不死心加上红军实际上是不信任他的，他暗中与土匪勾结，把他的武装部属都藏在石码附近的高坑乡一带。李匪诈称要带红军去收缴枪械，阴谋袭击红军后逃窜。红军派了二三十人随李前往，至高坑乡林坑村时，李玉泉的部下从村内向红军突然袭击。好在红军早有防备。战斗中，李玉泉想趁乱逃走，被一个传令兵红小鬼一枪打伤了脚，复被红军抓回。在红四军撤离石码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把一贯作恶、伪装投降的李玉泉当众枪决。

红四军驻漳州 49 天 驻石码 40 天。5 月 19 日红四军撤出石码之前，全军集中在龙海中学前的广场上，照了一张合影。数不清是有多少人了。我想，大约难为坏了摄影师，也不知是否用了什么特殊的技术。一张照片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分不清谁是

首长，谁是战士。但是，照片上的全是红军。这是一个珍贵的历史纪念，是一帧实实在在的英雄们的群像！

去年五月里的一天，正当全民植树日的时候。门诊部的领导让我准备一个小药箱，跟一些首长们去中山公园，在今雨轩前面的空地上植树。天气很好，老头儿们干得热热闹闹，边干边聊起大天儿来了。不知怎么扯来扯去，说到甲鱼是怎么样的好吃，现在的价钱又是怎么样贵得吓人……

一个资格最老的首长大声说：“喂，喂，我有了一个故事了，是关于咱们的罗秘书长吃甲鱼的故事呐。”

他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等着听他的故事，才又款款地开了口。

“红一军团打下漳州哇，我们驻在石码一个大教堂里。罗秘书长那时是红四军的政委，我呢（非常遗憾，我没有听清那时候他当的是个什么干部。）……。群众大会开了款子也筹得差不多了。大家憋在司令部里闷得慌。一天上午没事儿，罗政委和他的警卫员两个跑到附近一个小水塘去。将近中午的时候两个人回来了。躲躲闪闪的神秘得不得了。原来他两个从小水塘里钓了甲鱼，不过一共只有一个。两个人商了半天怎么办，司令部那么多人，一个甲鱼怎么个吃法？后来，终于想出了办法。罗政委蹑手蹑脚跑到教堂的大风琴跟前，十个手指头一齐往下按，“哆……”大风琴叫起来。警卫员就在院子里喊：“赶快 赶快 空袭、空袭。”在教堂里的人听到了赶快往外跑 因为那大风琴的声音真像是飞机来了。大家跑到外面一看没事儿，天上没有飞机，那声音也没有了，接着闻到了甲鱼味儿，那东西煮起来香飘十里

呀 大家明白了怎么回事儿 罗政委这顿甲鱼汤硬是没有喝成。”

我听着这意外听到的故事，心里不禁被感动了。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一段逸事罢了。而讲故事的人也并不知道我这个背着药箱跟他们转了一天的女医生，就是当年那个想独吞甲鱼汤的罗政委的女儿。正因为如此吧，这段讲述才愈显得可贵。那时候，爸爸已经去世三年多了。在这样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能够听到他的一些老部下用这样亲切的语气提到他当年一段小小的往事，我觉得我的心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我总也忘不了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故事。尽管它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英雄们的品质和特征似无多大关系。但是，我今天还是在这里详细地记述下了这个故事。因为，正是它，使父亲年轻时那个乐观、诙谐的样子活在我的脑海里了。

迷失在雪山草地之中

夹金山的主峰忧郁地裹在云雾之中。

我们多少有点焦急地等待着它从阴沉沉的外衣中露出真面目来。

早上五点钟，我们从小金县城出发（小金就是当年的懋功）赶往达维。达维是红军当年翻过夹金山后到达的第一个小镇。我们这次选择的路线和当年红一方面军翻雪山的路线相反，当年红军是经宝兴、芦山、天全一带过碛碛翻夹金而到达维再到小金。我们选择了从南到北的路线，是因为当地的同志说，南坡山势较平缓，攀登较易。我们当然接受了人家的好意。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是走了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因为当年张国焘要红四军二次翻夹金山，就是走的这条路。

七点钟，我们走过了红军二、四方面军曾在那里会师的会师桥而进入夹金沟。长征路啊该是怎样一条艰苦、荒芜的路呢？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一块传奇式的，曾经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土地此时在我们的眼前却显得安详、宁静。夹金沟内那悠悠延伸着的，像幻景一样柔弱的美丽，使我们不敢喧哗，不敢眨眼，唯恐在一次深重的呼吸之间失去了眼前的一切。奔泻的高

山融雪，也无法打破这里仿佛亘古以来就凝固着的寂静，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千姿百态的老树，老树上发出的嫩枝，都保持着他们原始的娇憨的姿态。

在一个小小的峡谷里，融雪汇聚成一泓安静的碧水，当地人叫海子。海子映着天，映着天上的云，也映着覆盖着白雪的夹金山。可是多奇怪，海子里的云比天上的云更白，海子里的天也比真的天更蓝。蓝天白云的浮影中，水波在流动，树影在婆娑。浮影下面，众多的水生植物从清澈的海子里探出头来，像女人的云鬓一样飘动着。秋天艳丽的阳光，在这一切之上跳跃、闪动。这瞬息间有万般变化的形象，使我想起儿时透过一个小孔在万花筒里看到的東西，但是现在，这些有生命的妙不可言的图案和色彩却从四面八方拥着我，抱着我，充填着我目力所及的每一寸空间。

我完全全地迷乱了，我忘了我是谁，我来这里做什么。我觉得我和我所要寻找的那一段历史的距离是那么遥远。但是我又不能把眼前的一切称为童话世界。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人间美景是可以触摸到的，甚至可以随着我的呼吸而进入体内，让每一个细胞都得到快感。

达维公社的武装部长告诉我们，当年红军走过这里的时候，这里确实是没有烟火的，在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这里的气候在逐渐变暖。他指着海子边上一座小小的水电站和一座圆木搭成的磨坊告诉我们说，现在这夹金沟里已有了一些零散的人家。

五十年，将近半个世纪，真的已经有这么久了吗？连气候和环境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大自然差遣了造化的神力，它想向我们启示些什么呢？

随着海拔渐高，四周变成了一块草场，这是达维公社的高山牧场。先是下起了蒙蒙的小雨，然后是小的雪花。牧场里穿着兽皮衣服的藏族牧工，请我们喝了滚烫的酥油茶。虽然语言有点不通，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是来“找红军”的。来“找红军”的人都在他们这里喝酥油茶。

告别高山牧场，又经一个半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海拔4000公尺的高度。当年红军走过的垭口，就在我们脚下了。翻过这个垭口，就是夹金山的北坡。我们终于到达了和红军一样的高度，心里自然很高兴。我们一行四人，一字儿排开，注视着夹金山的主峰，它仍然沉着脸裹在云雾里。这里的山势并不显得十分陡峭，只是由于空气稀薄，确实使人每走一步，都要花一番扎扎实实的力气。当年红军战士在这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他们是被饥饿和寒冷夺去生命的。再有，就是机会主义，四方面军的战士们三过雪山草地。后来的部队，已经不用向导，沿路倒下的同志们的遗体就是路标了。牺牲的烈士们有的头朝南方，有的头朝北方。他们好像在互相询问，我们为什么会倒在这里？我们在风雪中长眠是值得的吗？岁月流逝了，夹金山又堕入了厚重的沉默。当年那些翻过雪山的人们，也许不再会认出景色奇丽的夹金沟，也不会再来重温这高山之巅的风霜雨雪，但是他们，甚至包括那些面孔红红的藏族牧工们却不会忘记在这山上发生的一切。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名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美国作者描写他在长征路上的见闻。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有勇气攀上这大雪山。但是，他毕竟从世界的另一头来到了这里，他用也许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思索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这说明，红军是活在

全世界人民的心里的。当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并不是唯一的也并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我们继续追寻红军的脚步。在金川，我们找到一位当年苏维埃的主席。红军是6月间到达这里的，刚刚翻过雪山，冻饿交加。由于这里靠近雪山，气温较低，6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村子里筹不到粮，许多红军战士眼看着饿断了气儿。金川这地方的特产是一种个大皮薄的雪梨，6月间，梨挂在树上还是个青蛋蛋。是这位老人，挨家挨户动员乡亲们，把青梨蛋蛋摘下来救红军的命。红军走出金川的时候，干粮袋都是鼓鼓的，装满了金川的雪梨。

那一年，金川的雪梨颗粒无收。

我们到金川，恰在9月，满树金黄，满川金黄，梨太多，销不掉，家家户户忙着熬梨膏。整个一条川都是香的，甜的，都是金黄的。我猜，金川就是因此而得名吧。

这位苏维埃主席当然早已年逾古稀，耳朵也差不多全聋了，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儿媳妇、儿子、孙子哇啦哇啦地嚷了半天，才引出他的一句话来：“红军，红军走了，没走的，都在山上哪。”

老人说的，是一座巨大的红军墓，是刚解放的时候，当地人民在衣食都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发集资、出钱、出力，把四散在各山上的红军坟搬在一起，用青砖砌起了一个巨大的坟茔。坟前竖着一块大石碑。乡里一位才子手书三个大字“红军坟”。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记载。烈士们的姓名、事迹，至今已无一人能够详述。人们只知道，这里合葬着上百个人，而人们忘不了，他们是红军。

在两河口，在卓克基，在巴西、班佑，我们都怀着虔诚的心情

去拜谒当年红军留下的遗迹，去寻找那些重要会议的遗址。那些房屋，那些寺庙大都早已坍塌了，有些已成了野兔和山雉的家。但是人们都记得红军，都记得这样一支神奇的仁慈的军队。

在草地上 人们给我们介绍了大约四五种以上的“红军花”。每一种都有自己原来的名字，每一种都有改称“红军花”的故事和传说。在草地上 甚至还有这样一位老年妇女 当年她是红军，过草地的时候闹病，年龄又小，不得已留在了老百姓家。由于年龄太小，她早已说不清自己部队的番号，长期和藏族人民在一起生活，她连汉语也不会说了，现在她已有了自己的一大家子人。她不要民政部门给她的照顾和优抚，但是人们都记得她是红军，称她为“红军婆”。

我们的采访是完全失败的。红军 作为一个整体留在人民的心目中 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这里曾出现过剧烈的民族矛盾，甚至就在我们驱车通过草地的时候，还有汉族干部被杀害的个别现象。但是，红军的形象不可磨灭。它和当地人民自己的关于善良的仙女，关于救苦救难的菩萨的传说一样融化在他们世代生长的山水之中。想要在其中寻找某个姓名，那实在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关于父亲的故事，好在还有他自己的一段文字可以来描述。

水口战斗后，四军被派往江西最南部三南地区（即定南、龙南、虔南三县）筹款和争取群众的工作。当地土豪劣绅势力较大 地主武装也较多 很多大村庄都有土围子 土豪们多藏于土围子内 基本群众也不敢接近我们 造成我们工作上一定的困难 但经过我军的艰苦工作后 工作仍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云南回师 部队集中于头陂地区进行休整。此时 部队病人增多 不满员 又一时得不到补充 于是进行了部队的缩编。每个军缩编为两个师 撤销了军部及其直属部队。王良牺牲后任军长的周昆调瑞金红大，三军军长徐彦刚调任军团司令部参谋长 原参谋长陈奇涵调江西省军区 三军政委朱瑞调五军团政委。我当时病了 头部伤口总不封口 时好时坏 同时头部负伤后 造成了严重的失眠症 上级批准我到贺诚的卫生部休养一段时间。回前方后 即被任命为红军第一军团保卫局局长。此时 教条宗派已经推翻了主席的正确领导 取得了统治地位。成立了国家保卫局 之下是红军保卫局，各军团亦成立保卫分局。

一九三三年春 敌人第四次‘围剿’来了。粉碎敌人这一次‘围剿’的第一仗 干净、彻底地消灭了敌人两个整编师（每师五个团），这都是蒋介石的嫡系。活捉敌人两个师长。红军第一次大批缴获轻机关枪、自动步枪 在当时都被称为新式武器。

这一仗，我军具有根据地人民支援的条件和地形熟悉的条件 集中了优势兵力 加之当时天雨 整个战场地区大雾 对面不见人 帮助了我军的埋伏和发起战斗的突然。因为地形选择得很好 敌人通路两侧全是大山密林。一直等到敌人两个师全部进入我伏击圈之内，然后完全截断敌人后路 关门打狗 命令部队突然全线冲击 因而战斗发展很快。一个晚上就基本解决了战斗，第二天上午就剩下肃清残敌的零星战斗了。

当时徐彦刚和我奉军团首长命令，指挥七师、九师为军团右纵队。战斗发起后，九师冲击出去大约只半个小时就来报告说，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捉住了。当时我们还不大相信。不一会儿，李明就被送到了指挥所，足见战斗发展之快。另一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第二天亦为一军团某部活捉。

因为这次反“围剿”同以前一、二、三次反“围剿”一样，初战打得好，取得了这个伟大的胜利，所以再打一仗，再歼灭敌人的一个师这个“围剿”就打破了。

这次反“围剿”主席虽然已不指挥军事，但战斗是完全按照主席的军事思想打的。它是实行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的。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时候，军团的指挥员是林彪。1964年父亲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林彪曾特意向父亲提起上述的那次战斗是他改了当时瑞金统帅部的命令才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因为那一仗的战场指挥员（即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及所有参战部队。当时瑞金的战场指挥办法是由一、三军团的首长轮流指挥），瑞金刚好指定是林彪，而瑞金的命令是要部队到宜黄附近打遭遇战，林彪说是他连夜把命令改成了打伏击战，才打出了那个结果。如果部队去遭遇敌人，敌人很快缩回宜黄，我军当然就达不到这个歼灭战的胜利。

且不论林彪的这一番话的真伪，按当时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来说，他估计父亲一定会把这些话告诉主席的。果然当毛主席知道了林彪的说法之后，对林彪大大增加了好感。主席曾在许多场合提起此事。他说：“我到现在才知道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

因为战场指挥员改了当时统帅部的命令。”林彪这种通过第三者，既捧了主席，又抬高自己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很高明的。在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上，林彪已经促使毛主席下了搬掉父亲这块绊脚石的决心的时候，毛主席又一次旧话重提。这些无疑都是善良正直的父亲始料所不及的。

我从第四次反“围剿”到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的极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军团保卫局工作。加上到陕北后在方面军保卫局工作的一段时间前后大约三年稍多一点。

保卫局的业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训练警卫员，保卫首长。当时团以上的首长都设有警卫员（又称特务员），为了保卫首长，凡行军作战，我总是跟着军团的首长。那时的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二、巩固部队，防止个别反革命分子混入部队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防止逃兵。为了这些工作，在部队好的党团员中组织秘密工作网，行军作战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逃兵。三、清查俘虏。四、在边沿区、白区行动或驻扎时破获地方上的敌探，和对付小股土匪。

杨岳斌勾结福建反革命土匪逃跑时，瑞金军委曾命我带三个连去搜捕杨和打土匪，我们在深山老林中搜了很久，都未发现踪迹，无功而返。当时没有群众的配合，而杨和土匪可能在我们到时或到前，就已经逃出去了。

当时保卫局的这些业务完全是从苏联那里抄来的，并不适合我们的实际。它的主要缺点或者错误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以至脱离群众。所有的措施，大半都是消极

的。也即是后来我们反复强调反对的神秘主义和孤立主义。但当时我们是不认识的，没有这种觉悟。1942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主席提出了肃反斗争的九条方针，这才比较的明确了。

这是父亲做保卫工作的初始。1932年打漳州时，已有国家保卫局。负责红军方面工作的有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侦察部长钱壮飞，执行部长胡底。

红一军团的保卫局成立于1933年初。前面已经说过，保卫局的工作源于苏联‘照搬’‘格帕乌’的那一套。保卫局人员佩戴绿领章，上有‘格帕乌’的缩写字母。那时人家是怕进保卫局的，保卫局找你谈话，就糟糕了，就反革命了。不过那主要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杀AB团时候的事。进入长征以后，也就是父亲到了保卫局以后，由于外部环境的险恶和其他的原因，这种可怕的大杀自己同志的行动已经停止了。

由于当时党内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红军转入长征，对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来说是完全秘密的。部队开始在兴国做工事，后来转入宜都集中，只是由父亲给保卫局的同志们讲了个话。说明红军为什么要撤出苏区，讲整个局势和红军的前途。关于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是说要打运动战，转到敌人的背后，要向敌人进行反攻。并向保卫局的人员提出要求，要成为各个部队的模范，不要掉队、不要逃跑，什么情况下都不要离开部队。

据当时保卫局的秘书童小鹏同志回忆：“部队是10月16日出发的，动员是反攻。一反就反出了封锁线。一道、二道、三道、四道……。”

长征途中，主要的任务是走路，当然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走路。那时候，父亲头部的伤口还没有彻底好，吃饭都成问题，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那特有的旺盛的精力，并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每天大队人马一动，他便出现在军团首长身边，寸步不离左右，只有在吃饭和宿营的时候才回保卫局休息。他对保卫局里其他的同志要求也十分严格。虽然红军处在长途的战略转移中，但保卫局却有自己一丝不苟的日常工作。每次有大的行动，他都要把全局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动员思想，也交代任务，行军从哪里到哪里，打仗打什么仗，大家怎样配合部队工作。平时，他都把保卫局的人派到下边去，跟着部队行动，一个师派三五个人组成一个组，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平时局里的人不大在一起，但在休整时按时地集中汇报。除了执行部的人经常在行军的序列中保持着保卫局的位置，其他的人员都分散在各个部队里。

在这样艰苦、特殊的环境里，父亲认真严肃地，一丝一毫不松懈地工作着。他的责任心，他的组织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人选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这个决定是和他在红军时期对父亲这一段经历的了解分不开的。

那时是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但是军团保卫局却在长征途中很好地完成了保卫部队和首长的安全，防止敌人破坏，防止逃兵和审讯俘虏等诸项任务，没有乱杀、错杀一人。在长征末期，红一方面军出腊子口到达甘南哈达铺时，由于工作需要，毛主席决定父亲到三军团当了一段时间政治部主任。后来到延安，由于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有一些同志反映罗瑞卿在红军保卫局，尤其

在三军团工作时期，杀了三军团的干部。在 1943 年的延安整风中，组织上曾经认真而详实地调查了此事，自然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假案。

不仅如此，父亲实际上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了一些抵制错误路线，搭救好人的事情。保卫局的干部童小鹏同志出身贫苦，土改的时候定为贫农成分。后来他的一个曾祖母死了，留了六十担田给他家。错误路线的查田运动一来，就把他家划成了地主。童的父亲跑到红军找儿子，童就把情况反映给父亲。父亲一次再次地给地方政府写信，证明情况，地方政府先是把童家改划为富农，后终于承认完全搞错，改划为贫农。

这当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充其量关系到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但是它却说明了像父亲那样的一些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革命始终是一个美好的，为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只要可能，血腥和恐怖是他们本来就想回避的东西，尽管现实和斗争常常毫不留情地蹂躏他们的类似的善良愿望。

父亲曾有一段文字，非常诚恳而真实地描述了他当时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识水平。我很珍惜这段文字。

老实说：我们当时政治思想水平很低，有很大的盲目性。对于党内的路线斗争，自己根本不知道，甚至是不关心。只知道干革命、做工作、学打仗、服从党和上级，坚决执行党的决定和上级的命令等等。

反五次“围剿”时，当然自己脑子里也会生起一些问号，因为仗总是打不好。整个反第五次“围剿”的全过程，除了初期一军团在北线江西的乌江镇歼敌一个师三个团；后期一

军团在南线的福建温坊歼敌李延年旅两个团是歼灭战以外，整整一年都是打的被动仗、消耗战。对一些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员的作战方法也看不惯，总是：黄昏出发，拂晓到达。有时机关枪、迫击炮放在哪个山头他都要规定。明明一个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去走，明明打不胜的仗，硬要你去打。指挥作战凭的就是一支红蓝铅笔、一张地图和一根米达尺。

所有这一切自己当时也有些感性知觉，主席没有管军事了，当然也看得出一些。但是内幕情形究竟怎样，自己也搞不清楚。没有人来讲，也没有地方去打听，也不好打听，也不敢打听，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党的遵义会议是毛主席亲自到一军团传达的。当时大家听了主席的讲话才懂得了“围剿”为什么没有粉碎，长征初期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没有能够制敌，反而被敌所制的道理，才懂得了今后应如何办，即今后的路线、方针和方向，也才知道了遵义会议重新恢复正确路线和改变军事领导的决定。大家听了这些真有说不出的兴奋、喜悦和痛快啊！

遵义会后不久，就打了胜仗，那就是回师遵义，歼灭了敌人吴奇伟的一个师。一直把追击红军的一路敌人赶过乌江。接着，在那样急风暴雨的情况下，指挥全军战胜敌人的疯狂追击和堵截。红军从贵阳城下（当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亲自指挥）突过，以后转到云南，把所有的追击、堵截的敌人远远抛在自己的后面，使全军能够在三只小木船的情况下，从容地、安全地、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以后，全军突过了天险大渡河，在四川西部，同第四方

面军会合。由于张国焘的反党和分裂红军 并企图暗害党中央 造成了对党、对红军非常危险的严重局面 由于毛主席英明决策 指挥若定 并采取了许多英明、具体、正确的措施，才使中央和红军一方面军的主力能够迅速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转入陕甘根据地。

所有这一切，才能挽救和巩固这个当时仅有的根据地，粉碎敌人对这个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使三个方面军得以在这里会合成为可能。特别是使党中央放在大西北 指挥和领导全中国革命，执行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 发动并领导抗日战争到胜利 以至夺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领导的结果。这是人所共见 人所共知 也是历史完完全全的证明了的。

当时党的军队的领导者，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感情上来说 对于我们影响大的当然只是毛主席这些人。至于王明 我当时连名字都不知道。博古、洛甫、凯丰这些人接触也很少。他们的文章我们看不懂。而博古因为有很重的地方的口音 所以连说话都听不懂。不过就我个人来说 关于党内的有关红军的前途，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其他一些问题的实质上的争论和斗争 只是 1943 年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参加七大 学习了一些党的文件 并参加过一些会议和讨论之后，才有了比较清楚和深刻的理解。

长征过金沙江后 为了突过大渡河 军委要一军团组织先遣队 命令刘伯承为司令员 我为政委。后因军团政委聂荣臻自己请求随先遣队行动，改为聂为政委，我为参谋长。

这个机构时间不久，我军突过大渡河后，到达泸定桥，即结束了。

该吃的苦头已经吃尽，该受的罪也已经受够。关于长征，它的可歌可泣，尽可以由艺术家们去发掘；它的意义和影响，也可以由政治家们继续去发挥。但对于那些亲身经历过它的人来说，它却始终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经验。一群不想被敌人消灭的人在他们的决策者们复杂的斗争中，由一条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活路来。他们被一种顽强到甚至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愿望所驱使，创造了原本并未想创造的奇迹。他们甚至也不知道，在这举世无双的经历中他们自己锻炼成了最坚强、最有意志力、最难以战胜的举世无双的一代。

在就要结束雪山草地之行的最后一晚，我们住在若尔盖县委的招待所里。这个草地边缘上的小县城坐落在一个线条优美的浑圆的小山上。一望无际的草地从它的脚下伸向远方的地平线，草地像海，它像大海里的一个岛屿。

那是一个晴朗的深秋的夜晚。当紫红色的雾气在草地上升起来的时候，天空中一颗又一颗出现了晶亮的星星。我从岛屿上向下望去，天空低低地罩在草地上，那上面影影绰绰地飘浮着什么，游动着什么，一缕又一缕莫名的气息透过来，它们拂动着我的胸襟，搅扰着我的心。

一整夜，我无法入睡，我好像听到了歌声，又好像看到了火光。

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一个满面皱纹的老牧工推门而入，给我们这些北京的客人送上一大罐溢着清香的酸奶子。他指指

窗外的草地。此刻 草地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宁静得像一幅画。他说：“那里 红军常常会回来的。”

我想 是了。昨夜 是红军 是他们燃起了篝火 是他们在饥寒之中难以入睡 所以唱起了歌。那其中 一定也有我的父亲。他拥着一床薄毯，怀着一颗不安宁的心，斜靠在散发着皮革味道的马鞍上……

从延安到太行山

我的母亲非常喜爱收集照片。在她那几十本相册和零零散散的足以装满几皮箱的相片中，记录下了我们这个家庭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在这些相片中年代最久远的，位于所在这些记录之始的是父亲 1935 年长征结束后到达陕北延安时照的那一张。

现在摆在我的面前的这一张相片，已经不是原照，它是经过翻版又洗印出来的。这使得原照上一些小的细节消失了，但是人物形象却因此而更加明确和效果强烈了。照片上的父亲瘦得令人吃惊。我觉得人是不可能比这更瘦了。一张颧骨突出的脸上连皮肤都显得薄极了，太阳穴旁边那块伤疤又大又显眼，一双沉思的眼睛柔和地望着我们。尖峭的下巴颏，在拍照的霎时间，稍微有点儿紧张。这是一张饱经忧患的面孔，饥饿、寒冷、战争在上面留下了明显的印迹。但这又是一张坚定的面孔。那双平静的眼睛里，含着对一切艰难困苦的嘲弄，含着对人间一切忧患的理解。这个形销骨立，但精神无损的形象不能不激起人们的许多联想。它使人想到，革命，首先是一种信仰。革命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与苦行者十分相像，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更加合理，也更富有挑战性。

曾记得 六十年代初 当我刚刚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 我曾指着这张照片问过父亲：“爸爸 你怎么这样瘦？”父亲睁大了眼睛 那神气好像比我还要吃惊：“那是 1935 年啊，长征刚刚结束啊 我怎么会不瘦呢！”随即 好像终于想到了我的年幼无知 就乐哈哈地补上了一句：“长征刚结束，要是从红军队伍里找出个胖子 那他一定是个‘四不清分子’。”

那时候正在搞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父亲借用的这个“四不清分子”的概念 让我一下子懂得了他的意思。后来 我所见到的那一个时期参加过长征的人的照片，毛主席的也好，朱总司令的也好，果然没有一个胖子。

红军回师陕北后 我参加了主席主持的大相寺会议。这是一次反对某些军队负责干部的本位主义的会议。这次会后 军队内部的团结大大增强了。

参加大相寺会议以后 我即被调到‘红大’学习。当时军队中有一批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被调到‘红大’学习。‘红大’的校长是林彪。学校下面分为三个科：一批高级干部编为第一科 科长陈光 政委罗荣桓 中级干部编为第二科 基层干部编为第三科。下分几个大队。科长周昆 政委袁国平。我当时被任命为‘红大’教育长。

我离开保卫局时 好像军队保卫局就一律撤销 改为军队政治机关的保卫部。这当然是主席的正确决定。

我当‘红大’教育长时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时一、二、三科的负责人都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时间约在 1936 年 6 月。‘红大’当时驻在瓦窑堡，中央机关也在此。因为红

军大队西征甘肃，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我留陕北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以致敌人得以袭占瓦窑堡。我们撤出瓦市后第二天，陕北一个独立师赶到了，我随林彪到瓦市后山观察，见当时敌我对比，不可能打下瓦市，因而决定暂时放弃收复瓦市的意图。“红大”随即随中央领导机关移驻保安。

在这里，让我再次补充一个插曲，这是父亲在福州养病时给我讲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前面讲到了，由于陕北红军的地方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敌人突然袭占了瓦窑堡。第二天，父亲随林彪到瓦窑堡的后山去观察地形，看看我们有没有收复瓦窑堡的可能。袭占瓦窑堡的敌人部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们隐蔽得很好。父亲他们估计到这一点，在接近敌人的时候就很小心地弃马步行。但是狡猾的敌人还是远远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噼噼叭叭”一排冷枪打过来。父亲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敌人突然打枪，而是因为他看见林彪随着枪声扑倒在一大块大石头的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负了伤。他赶快向林彪靠拢。他还没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听见林彪在大声喊，那声音又尖厉、又凄凉，完全变了腔，走了调。细心分辨，才听出林彪喊的是：“校长要马呀，校长要马呀……”这时候父亲还是以为林彪负了伤，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马”。可是把马牵过来，目标更大，更危险。父亲拉林彪往回走，几个警卫员也闻声赶来架着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马背的时候，大家才明白他一点儿伤也没有，他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当然，这样一件小事，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影响父亲对林彪的整个看法。它也并不就说明林彪是一个怕死的胆小鬼。但

是，父亲告诉我，这件事给他的印象极深，总觉得一个军事指挥员不应该这样临危失态。父亲在“文化大革命”被监管的期间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林彪会成为“九·一三事件”意义上的投敌叛国的林彪。他还在认认真真地思索他和林彪之间的是非恩怨。他甚至还对林彪的良知和信仰抱一点希望。他说，那时候，这件小小的往事难以解释的常常袭上他的心头，而当他想起它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清醒，他对林彪存有的那些幻想就会变得非常淡薄。

移驻保安后，主席确定“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少而精”为“红大”的教学方针。主席并亲自为“红大”高级干部讲课，第一课就是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内容就是现在毛选中的那篇著作。这一课前后讲了许多次。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中央决定我随同总理去西安搞统战工作，同去的还有杜理卿（即许建国）、童小鹏、龙飞虎等人。我们同总理是在延安坐飞机去的，以后去的还有博古、叶剑英、张纯清等。

在西安，我同总理一起见过张学良、杨虎城。我先做总理的联络副官，随后东北军成立政治部，我被派到那个政治部当民运科长。在那里我的工作就是向东北军当时的政工干部介绍一些我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群众工作的经验。

关于那一段生活，当时在东北军里工作的吕正操同志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

我第一次见到罗瑞卿同志，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当时，我和东北军张学良身边的服务人员同住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诙谐。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西安时间不到两个月，“二二事件”中孙铭九打死了王以哲，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东北军内部又互相倾轧，时局发生了变化，我就同博古于二月上旬坐汽车回延安了。同行的还有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关于西安事变中的经历，父亲曾与王炳南、吕正操同志合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其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父亲回到延安的时候，“红大”已改名为抗大，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从那时起到 1939 年的夏天，父亲一直是这所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之后，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

抗大是一所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大高涨时应运而生的、而后又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学，它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国外都有一点小小的名气，就是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知道抗大的名字，更不要说那些在抗大学习和生活过的人了。他们每每提及自己亲爱的母校都会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把那一段经历视为自己生活中最难忘、最有意义的时期。

抗大培育出来的不是学者、教授和科学家，它的毕业生们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是更宝贵的人材。他们是一群勇敢、坚强，为国家为民族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好汉，是一群满腔热情、信仰坚定、有知识、有文化的抗日专门家，是一群承担着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的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日军政大学在办校期间共培养出十余万名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特别是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干部。1938 年到 1939 年，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日益发展壮大，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打日本、救中国的军

队。抗日军政大学在这时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在国恨家仇的激发下纷纷投奔延安，投奔抗大。他们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到延安。一时间，通往延安的大路小路上竟出现了络绎不绝的人流。抗大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的新学员。于 1939 年 1 月份开学的抗大第五期学员总数竟然达到了 13390 人。许多老同志都清楚地记得，父亲曾在这一届开学典礼上激动地说：“我们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我们不怕敌人的反对，我们抗大的事业是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的，抗大今天的发展壮大就是证明。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父亲这鲜明生动的语言，当时就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全场掌声雷动，在以后的时间里也使许多人久久不能忘怀。

抗大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父亲只是在那里做过较长时期的具体工作。记得那是“四人帮”刚刚倒台的时候，许多老同志情不自禁地打破了多年恪守的互不来往的规矩，兴高采烈地欢聚一堂。那一天真像过节一样。不知说到了哪一段，大家忽然发现在场的人有那么多是抗大的学生，大家充满爱戴地围在父亲的身旁，口口声声地喊他“副校长”。父亲的心情和大家一样轻松愉快。他对大家说：“我有幸在抗大工作了多年这是我的光荣。”当时我也在场，我也被父亲这句诚恳而又得体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感觉到父亲对抗大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也曾掀起过一场不小的“抗大热”。写文章、拍电影、出书、搞展览，好像林彪是抗大的元勋。实际上，林彪这个名义上的抗大校长，只在抗大呆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37年的夏末他就离开了。

父亲在抗大工作的几年里，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关系。在这种融洽的关系中，他的工作颇有得心应手的舒畅感觉。这种良好的群众关系，固然和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作风有关，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父亲自己曾有过一段难忘的学生生活，对知识和文化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他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是熟悉的。从熟悉到了解再到爱护、引导，这使他的工作一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细腻的分寸感。很多人都说，当年父亲在抗大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梁速征同志是当年抗大的文工团员。下面是她和我讲过的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去找罗副校长。他那窑洞的门谁都认得，敲一敲，就进去了。我是陕西人，跑到延安参加抗大，就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可是一来就要我参加文工团，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问题。要想唱歌跳舞演戏，我在家里也能行，何必千辛万苦地跑到延安来呢？这种想法现在想起来多么幼稚啊。但是当时足以使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和我情况相同的女娃一块去找罗副校长。一进门儿，我们就委委屈屈把一肚子话都倒出来了。罗副校长听完我们的话，就若无其事地和我们拉家常。他的话很有意思，内容今天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热热闹闹谈了半天。最后，他问我们，怎么样？这回想通了吧？我一愣，可又一想，可不是通了，真的通了。该讲的道理，他刚才在家常话里都已经讲了啊。

“我是陕西人，口音很重。有一回上台演戏，我说什么也不干。导演说，给你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我勉强答应了。这

句台词是‘我拉着毛驴回家去’。我在背地里把这句话不知念了多少遍。陕西人把‘我’总念成‘饿’，我下功夫也主要在这个‘我’字上。谁知道那天一上台，我看到台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毛主席也来了，那时候我们抗大文工团演戏，中央首长常常来的心里一害怕，开口就把台词念成‘饿拉着毛驴回家去。’台底下笑成一片。我回到后台就哭。罗副校长散戏后来看我们，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当着大家说：‘要我看嘛，第一次上台演成这样子就不错呀。’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不仅因为罗副校长没有架子，那时候的领导有架子的人很少，连毛主席都没有架子，还因为罗副校长懂得我们，他说的话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都人情入理，他的话又总那么生动，听了以后就难忘记。”

在抗大，还有一件事情是人人皆知的，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一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他很小就参加了红军，从井冈山到延安他一直是一个出色的干部。他打仗勇敢，在两渡赤水和娄山关的战斗中都立过大功。他人聪明，还有几分才气，当过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就因为他年轻有为，精明强悍，在抗大学习后就留在学校里当六大队的队长。那时候，黄克功也不过二十六七岁。黄克功的身材比较魁梧，不像一般南方同志个子矮小，他口才好，又有很光荣的历史，这对当时许多年轻热情的女学员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不久，他与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女学员刘茜确定了恋爱关系。刘茜原是山西大同市的学生，是在抗日热情的激励下到延安来求学的，到陕北公学学习的时间不长。她在与黄克功谈恋爱的过程中，不知又有了什么新的想

法突然变了卦。黄克功又着急又生气，思想上斗争也很激烈。大约是在 1937 年秋天，一天晚饭后，黄克功邀了刘茜去延河边上散步。两人谈话越来越激烈。刘茜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和黄克功断绝恋爱关系。黄克功一怒之下完全没有了理性，竟然拔枪打死了刘茜。案发后，黄克功跑回住处，要警卫员帮他把溅上血的衣服洗干净。警卫员是个细心的同志，发现衣服上的血迹心里就明白了一半。第二天，陕北公学的人在延河边上找到了刘茜的尸体。案情简单得很，人人都知道黄克功在和刘茜谈恋爱，人人都知道刘茜最近变了卦，昨夜只有黄克功和刘茜在一起，第二天刘茜死在延河边上，而黄克功的身上又溅了血。一问，黄克功就承认了：“是我打死的。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要结婚了，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事情至此真相大白了。

前面说过，黄克功聪明能干，所以父亲曾很器重他。父亲历来喜欢那些年轻又聪明能干的干部，黄克功留在抗大当队长，也有父亲的赞赏在起作用。现在可好，这个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干部突然打死了人。

黄克功被关押后，这件事传遍了延安城。人们议论纷纷。按说杀人偿命，这本来不应该有什么疑义。但是黄克功却是个立过大功的红军干部，出身贫苦，对革命一直忠心耿耿，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头走到尾，没有被冻死、饿死，没有被敌人打死，现在却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再退一步说，革命战争本来就很残酷，把黄克功留下来，要他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也算是给了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克功随意杀人，本身就很恶劣，就该偿命，何况还是自己队伍中的同志，是从外地投奔延安的爱国学生。这种行为给党和革命队伍带来的损失是无法弥补

的，无疑应该严惩。非常有意思的是，持前一种意见的多是一些外地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和刘茜有相同经历的女学生。持后一种意见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老红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听上去又都有一些道理。父亲在抗大党组织研究这个案件的会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黄克功是一个曾经对革命有过战功的人，但是他之所以敢于随意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人人都要服从法律，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法律制裁。况且延安已经成为全国的抗日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拥向延安，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会后，父亲把自己的看法，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中的反映都原原本本向毛主席和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和主席对父亲的见解表示赞赏。毛主席亲笔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写信，中央也很快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

这以后，父亲还到班房里去看过一次黄克功。黄克功自知难以活命，悔恨万分。父亲问他还有什么后事需要交代，并答应他将来如有可能将代他照顾家中亲人。行刑的那一天，黄克功不仅认罪服法，还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害死人命，给党和革命带来损失，要大家不要学他的样子。这件事后来有了很好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原来不同意枪毙黄克功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此反映尤其强烈。他们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诿罪、不枉法、公正无私、法纪严

明，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黄克功事件以后，毛泽东同志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题为“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

黄克功事件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在内心深处，父亲仍然是痛惜黄克功这个人才的。当我的哥哥姐姐们进入谈恋爱年龄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到父亲讲述黄克功事件，要他们认真严肃地对待恋爱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我们向父亲谈起有些单位对私生活糜烂、甚至触犯刑律的干部置若罔闻、姑息养奸的时候，父亲曾经愤怒的说：这样的干部当然应该严办，要不连黄克功的血也白流了。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多怪这么多年了，父亲始终忘不了这个人。

由于局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父亲在抗大时期还去参加过一次挺特别的会议。父亲曾在“自传”中对这段经历有过详细的描写。

1938年估计在2月经任弼时建议中央派谭政、欧阳毅还有我代表八路军去武汉参加国民党陈诚的政治部召集的政工会议。我们是坐国民党送王明回延安的飞机去的。到武汉后代表增加了一个张爱萍。先驻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四个人即去报名参加会，住入武昌某地开会人员的住地。国民党到会的所谓政工人员都是一些中下层分子按军事编组过军事生活每天起得很早整队到外面出操。集体住宿集体吃饭。我四个人分编在四个小组。会议期间除陈诚反复几次作些又长又无聊的报告外，何应钦去讲过话。我们总理也去讲过话。此外就是到会人每人要作五分钟讲

话。每讲到蒋介石，即所谓“蒋委员长”时，全场立即起立，再坐下，再讲到时，再起立，再坐下。有时，仅仅五分钟就要搞好几次这样无聊的动作。有些人的佩刀不断被坐椅挡掉落地，全场“砰啪”之声四起。由于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就连国民党那些政工老爷有时也忍不住，致使全场哄然大笑起来。为了这个笑，陈诚曾大训一通，说一个军人随便发笑，实在无聊，不配一个军人的样子，反复问：有什么好笑的？有什么好笑的？可是发笑仍未禁绝。有时“砰啪”之声起了，笑声仍随之而起，不过笑声有时大些，有时小些而已。

开这种会，实在无味，简直活受罪。因此，谭政和我借口有病，躲到医院里去住了几天。

读到父亲亲笔写的这些文字。我忽然想，如果父亲有机会写小说，一定会是个描写场景的好手。

在抗大，父亲还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本书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是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为公开出版，写给国民党一些抗日部队看的较通俗的读物，但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却需要提一提。这本书是毛主席亲自提议让父亲写的，而且要父亲搬到他的隔壁，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写。这对于当时的干部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父亲对于毛主席对他的爱护之意，栽培之心自然是很明白的。多少年后，父亲提起这段经历，仍然对毛主席铭感不已，对毛主席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衷心赞美。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书被造反派们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那时候，父

亲曾为这本书写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辩护辞。

在抗大，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那本书是主席决定叫我写的，是在主席住地隔壁一间房子内写出的。书名是主席定的，书名的字也是主席亲笔题写的。只是因主席太忙，书又比较长，内容未经主席审查。

那个书是在武汉失守以前写的，目的是写给国民党一些抗日部队看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我们军队的一些经验。由于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低，书中一些照顾统一战线的语言，可能有不少错误，但究竟是一些什么错误，因为内容我记不起来，因而作不出具体的检讨。我手头没有这本书，1962年，有人从政治学院拿了这本书给我，但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错误 因为忙 我就没有看 以为是过去的事情了。书中可能有错误，所有错误都应由我负责。在斗争我和审我的时候，念了几句无耻吹捧蒋介石的话，我听了也很吃惊。这个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有些混帐话是否别人加上去的？应该查明这些混帐话的版权，如果确是我的，责任当然由我负。

至于说这本书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本这样的书，在当时的历史的条件下公开出版，读者又是指向那样的对象，为了党在当时的统一战线政策，恐怕不好、也不能这样提出问题。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讲到了武装夺取政权。但就我所知，那篇光辉指示，当时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当时毛主席的著作 无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

政府》以及其他公开发表的著作，也没有公开直接地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 1949 年毛主席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为了策略起见，也还没有公开直接提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著作都只是提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不能对这本书要求过高。当然 这是我的理解 对否 要由组织作结论。

这本书，后来我也曾找来翻过。那实在是一些陈旧的，只能作为历史遗迹的内容。那书既无文采，也无个性，一点儿也不像父亲笔下写出的东西。在这本小书上做文章，实在只是那个病态的年代里特有的现象。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 不要说再远的将来 就是再过五年，甚至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他们去理解父亲在上述文字中提过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都会是不容易的。所以，尽管我不知道，今天我写下的这一些东西是不是有人看，或有人喜欢看，尽管我心里明白，现在从我笔下写出的文字，永远不会称得上优秀的作品，但是我知道，历史确实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趁我现在还能够理解它，趁我还没有迷失在岁月的丛林和偏见的大海里，我要尽量忠实地将它们摹写下来。也许，将来的某一时刻，一个漂亮的、文雅的、比我幸福一百倍的现代人 会指着 我写下的文字的某一段 说：“唔 是了 那时候发生了那一件事，所以……”我想 那时候 我会作为一个不高明、但诚实的历史记录者而长眠于地下了。

本来只是想写父亲和毛主席之间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也

许能够将他们关系中曾经存在过的亲密和信任，做一点有说服力的注脚，可是一下子就扯远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宝塔山下的那一排窑洞中来吧。

当时，父亲与主席挨门而居，另有一人与父亲挨门而居，此人姓魏名传统。当时他是抗大的教员。1980年我登门采访要他讲讲他对父亲的印象，他讲了这一段和父亲挨门而居的生活。

“那时候武汉还没失守，长江局还在。总理提议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写出来 这个书名叫《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总理说这本书写出来不仅对我们自己有益，而且要向国民党军队散发，会对他们发生影响。毛主席同意了周总理的建议，就把你爸爸‘抓’起来 关在那屋子里头 限期写成 否则不能出门。大家都知道你爸爸在写书，谁也不去打扰他。你爸爸这人也守纪律 天天钻在屋子里 不见他的面。我想 这不要把人憋坏呀。一天 吃过晚饭 我就走到他的窑洞里去。你爸爸见到我 果然很高兴。我说 喂 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呀。你爸爸说 弦绷得不紧就难以回家哟。说完我们两个就笑，因为我知道你爸爸那时候正在和一个女同志谈恋爱。原来他足不出户，急于求成是另有原因的啊。说到这里他就问起我的个人问题，他说他很关心我的重建家园的事情。问我找到对象没有。这里我又要倒叙回来才能讲清。我原来在家乡有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叫李国兰，她在我们县里是个有点名气的人物，我们都叫她‘勇敢分子’。我和‘勇敢分子’一起离开家乡 参加红军。红军到了川陕苏区后 她留在当地做妇女部长 我到了延安。后来听说她牺牲了 我当然很难过 大概有三天不想吃饭。那时候延安有些小知识分子是相当左的，他们在背后风言风语，甚至还有一位中央首长到我们学校来作报

告说：‘有的同志 爱人死了 几天都不想吃饭 这又何必呢？’你爸爸知道了这件事，就对我说，不要听那些鬼话，爱人死了当然是难过的 这是人之常情嘛。这样简单的几句话 我的印象很深，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感激。没想到你爸爸一直记得这件事，那次谈话他又问起这事，还对我说，你还可以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你是有条件的。我问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把书写完，他说还有两个星期 还说 常来摆龙门阵吧。”

魏老是四川人，乡音使我倍觉亲切。据我知道，他和父亲一直有着很好的关系 尤其是在 1974 年底到 1975 年之间 刚刚出狱的父亲在福州养病。那是父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诗兴大发，其中就有不少与魏老的唱和之作。此外，他们工作中也有过许多接触。这次我给魏老出的题目是对父亲的印象，他却只谈了上面那件事，但我相信这是魏老的肺腑之言，也确实是他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事情。也许两个人做了一辈子朋友，可是留在对方心目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就那么一两件。

1939 年中央决定，抗大和陕北公学移驻晋东南。这个决定是由于日军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 造成边区严重的财政困难。物资匮乏 粮食奇缺 此外 反动派的封锁也使广大沦陷区和蒋管区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难以投奔延安。

1939 年约在 7 月或 8 月 我奉主席和中央之命 率领抗大总校和陕公上前方。先到延水关，拟从那里渡黄河，经吕梁山过同蒲路直赴晋东南根据地。在延水关等了一段，走不通 乃折转绥德、米脂、葭县地区 渡过黄河先到晋西北根

据地，在那里停了一个短时间。部队分两个梯队，先后从太原以北通过同蒲路，到达了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晋西北党和军队的负责人是罗贵波和彭绍辉，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是他们派军队护送的。

这是一支五千多人的庞大队伍。要走过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五个县的广大地区。学员们虽然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但仍然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要带领这样一支队伍穿过敌后日伪军炮楼林立的地区，通过日伪武装严密封锁的铁路，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父亲那时是这支临时使用“八路军第五纵队”番号的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至今还有人记得起父亲如何站立在同蒲路上，在暗夜和寒风中轻轻嘱咐大家跟上队伍，不要跌交；记得起他如何一把又一把地搀扶那些脚步不稳的同志。他相信，他的轻声叮咛、他的搀扶和他出现在同蒲路上，能使他的年轻的部下更好地完成这个艰苦的行军，完成这历时两个半月、行程二千五百余里的小长征。

抗大在晋察冀停了一个短时期，驻在陈南庄。在那里见到了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认识了彭真、刘仁、吕正操、黄敬。还见到了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三、四分区的负责人杨成武、高鹏、郭天民、陈漫远、黄永胜、刘道生、王平、熊伯涛和抗大二分校陈伯钧等人。

1940年1月或2月，中央决定抗大开赴晋东南，因聂荣臻、吕正操两同志要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我们就同他们一起通过正太铁路敌人的封锁线。这样，抗大的总校就到了

太行山根据地，驻在武乡、蟠龙及其附近地区。中央决定学校归八路军总部领导。到太行山后，调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到总校担任教育长。

到太行山后 在总部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左权 还见到了黄克诚。

在我们兄妹很小的时候，小到还不能完全懂得那歌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都能够很清楚地唱那首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不用说，这自然是受了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反复诵唱的影响。他们两人特别偏爱这首歌，不仅仅因为太行山曾是八路军总部驻扎得最久的地方，太行山是朱老总、彭德怀、左权等著名抗日英雄浴血奋战的地方，不仅仅因为太行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伟大坚强的斗争精神 更因为 太行山是爸爸妈妈亲密结合的见证，他们在这里真正找到自己生命中纵情高唱的自由之神。

妈妈出生在漳河边上。她的父亲是中原大地上一个富裕的、信奉耶稣教的乡绅。妈妈是长女，也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受到教育的女性。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正在开封女子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正在建造着自己个性解放，将来做一名洁身自好的女教师的理想之塔。抗日的烽火惊醒了她的梦。这个常常考第一名的女学生，终于在一天晚上跟自己的家人和一直被她热爱的学校不告而别，和几个与她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还有一个也许是共产党员的‘老大哥’奔向延安。到了延安 这个声称自己别的都坚决

不干，只要求上前线打日本的女学生被心满意足地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那时候，父亲是抗大的副校长，但他们并不相识。在妈妈眼里，父亲是一位严肃、能干的校领导，是多少有点令人敬畏又有点神秘的“老革命”。在父亲的眼里呢，妈妈只不过是抗大众多的年轻又热情的女学员中的一个。

可是，太行山使他们再次相遇了。

父亲在延安经历了两次颇不愉快的感情生活。到太行山的那一年，1940年，他已经34岁了，妈妈那一年18岁。相遇——相识——相爱的过程很自然地，像太行山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地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经以心相许，便心心相印。正像父亲自己说的：“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四川俚语）水乳交融，牢不可破，此之谓也。”这是父亲在1975年4月与妈妈结婚34周年时写下的一段话。除了这段话，父亲还写了一首诗：

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
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

这首诗叫做《忆往事书赠治平》。在这诗的题记里，父亲这样回忆了他和妈妈的经历：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

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

妈妈回忆起当年的事，这样对我说：“我和你爸爸结婚是春天。4月份，已经开始春耕了。我们住在一幢二层的在当地算是比较好的房子里，结婚的那一天，我们俩站在那小楼上，太阳温和又明亮。刚刚下过雨，新翻的泥土经太阳一晒，发出一阵阵说不出的清香味。那天我才知道，泥土真的是香的，那感受深刻极了 到今天也忘不了。”

太行山的春天，一直是这么美好地保留在爸爸妈妈的记忆中。在此后的岁月里，妈妈不仅是爸爸亲爱的妻子，更是他始终如一的心灵的朋友。爱情和友谊各有它们的伟大之处，爱情如果加上友谊便几乎是尽善尽美了吧。起码在爸爸妈妈的心目里，他们的结合是美满无比的。

百团大战及其他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主要军事力量对付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时候，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与国家前途于不顾，反共活动逐步加紧，对抗战更加消极。从此，我们的党和军队既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又要担负起抗击日伪军主力的重担。我军抗击日军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二，抗击伪军达百分之百。这样，敌后战场就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我军实际上成为抗战的主力军。

1940年8月间，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因为参加作战的部队有一百零五个团，故被彭老总称为“百团大战”。其时朱德总司令正在延安。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实际上是在彭德怀同志的直接指挥之下。左权是参谋长，父亲正从抗大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不久。战前，左权同志曾打电话给父亲。在电话中左权参谋长非常兴奋，他对父亲讲，此次作战是华北地区的一次大破袭战，根据统计，作战的部队已经突破了一百个团。他要父亲积极配合布置好宣传政治

工作。父亲自然也很兴奋，因为从参加革命起，第一次听到自己的部队有一百个团在一起作战。父亲不仅十分热情而积极地布置了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在整个作战期间，在彭总的要求下，他四处联络督战。因为，依他的观点看来，这次百团大战不仅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甚至可以影响全国的战局。在敌人“扫荡”快要结束的时候还随彭总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关家垵战斗。

历时三个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毙伤日伪军两万余人，俘虏日军两百余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并破坏铁路 470 公里、公路 1500 公里，使正太路中断一月之久。这次作战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但是，这次作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敌人，使敌人决心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更加重要的是中央认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未经请示主席和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而这种举动也是我们党的纪律历来不能容许的。

不过，当时中央和主席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并未公开，父亲对这一切都是不知情的，他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地工作着。

1941 年 1 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来，全党全军悲愤万分。彭德怀同志认为又一个“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到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就会破裂，中国会再一次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他要父亲起草一个电报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他对时局的估计告诉部队，并要部队特别注意进行阶级教育。父亲自然就按着彭老总的意思起草了电文，并很快拍发给了部队。非常遗憾，这种看法和分析与中央、尤其主席的观点有出

入。毛泽东看到这个电报之后，马上拍了个电报给彭老总和父亲，批评他们未经请示就做出举动，也批评了他们在电报中所表达的观点的错误。父亲见到主席的来电之后感到很惭愧，也很紧张，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以野战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把给部队的电报收回并通知作废。同时他还给主席另发一电，除向主席作检讨外，并说明电报是他起草的，这部分责任应由他负。

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父亲并不十分放在心上。因为这本身也是工作中的正常现象，观点看法上有分歧，举动上自然有出入。发电报也好，百团大战也好，都是为了抗日斗争。何况百团大战从军事上说，毕竟是胜仗，它打击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党中央毛主席批评了 就检讨 该收回的收回 从个人感情上说也没有造成什么大的隔阂。父亲曾经说过，在和彭德怀同志共同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自己一直是很尊重他的，不仅因为他当时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负责人，更因为主席和中央是信任、重用彭德怀同志的。

但是 这一切在 1942 年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尤其是华北座谈会以后却发生了一点变化。

1943 年 6 月父亲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回延安参加整风，并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同时在前线的许多干部也陆续接到通知回延安参加整风。

从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算起，持续 3 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至今还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我们党史上是光荣的一笔。党的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同志成为我们党的领袖。他的主张是把党的路线纳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轨道上

来。在将近十年的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党内出现了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由于战争的紧张和环境的复杂，对于上述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一直来不及彻底的清算。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到我们党内来。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他们都还缺乏思想改造，缺乏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另外，党内也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为这次整风运动规定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

父亲回到延安后马上就参加了整风学习。

我们是1943年冬回到延安的。在延安，先住在杨家岭，参加了几次中央的小型批判会，在杨家岭礼堂、党校礼堂听了几次群众批判会和某些教条主义分子的坦白报告会，读了一些党内整风文件，知道了一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1944年春，我们进党校学习。我编在“三支”支书陈奇涵。在党校我们又学习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那两本书，学了一些文件，听了一些报告，参加了若干会议，对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和觉悟，又增多了一些。在党校也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主要是几本小册子如《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主席的一些著作，当时主要编印在上述的《两条路线》、《六大以来》那两本书里。

党校三支组织了几个小组，参加了学校审干甄别工作。

我们小组甄别了两个女同志，都是西安人，一个叫李冰，全国解放后改名为曹冠群，在全国妇联工作。另一个叫王惠民，全国解放后在西北，还是西安法院工作。经过当时的调查研究证明，由于她们不懂党的政策，承认自己是特务的一大堆口供或者笔供都是编造的。因此给她们平了反。

在党校听了主席的两次讲演，一次是关于整风审干的成绩和缺点应当如何看法的问题，主席总起来的说法是：党很好地洗了一个澡，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加强了马列主义的学习，增强了党的团结，清查了特务和坏人，发动了群众，训练了干部，提高了大家的斗争本领。审干时只出了一点偏差。等于洗澡，灰锰氧放多了一点，伤了一点皮肤。现在又经过甄别，如果真有弄错的，那末第一摘掉帽子；第二赔个不是。另一次是学习和时局，这就是已经发表的毛主席的同名著作。大家听了讲演都很兴奋。

当时的延安聚集了很多人。因为前线的许多同志都回来了，老同志、新朋友见了面，话就特别多。大家在开会、学习之余都积极地互相交换着看法和消息。这时候，父亲听到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消息。

上面提到过“皖南事变”之后，父亲曾在彭总的授意下给部队发过一个电报，后来中央和主席批评之后，父亲不仅收回了这个电报，还向毛主席做了检讨。现在，父亲却听说，在他向中央做了检讨之后，彭总曾直接电告毛主席，说他疏于检查，所以才会有拍发电报给部队的错误。这个消息在父亲的心中引起很大的波澜。一向耿直的父亲心里结了一个大疙瘩，觉得自己受到了很

不公正的待遇。另外，父亲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毛主席在场，父亲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他的本意是想通过毛主席的某种影响解开这个堵在心里的大疙瘩。

彭总说：我看你当时看到中央和主席的来电很紧张……彭总还未说完，毛主席插话说：犯了错误，受批评，应当紧张，难道还应当轻快？主席的话使父亲的情绪激动起来……

这样一来，场面僵住了。谈话显然是谈不下去了。疙瘩不仅没解开，反而越结越大了。

再后，就是华北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彭德怀同志受到了中央的批评。父亲再一次吃惊地得知“百团大战”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既未请示中央，也未请示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①。主席表示他本人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因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批评彭德怀同志说“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的。

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电报的事情，再加上原来父亲在反“扫荡”斗争中为一些具体战斗的军事指挥和彭总发生的正常的分歧，这些都使父亲一时对彭德怀同志很不理解，并在这次会议上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比如，他曾批评彭德怀同志：“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这样的话自然很伤感情。

^① 据《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百团大战条：……1940年7月20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签发关于交通破袭战的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下达有关部队。……”

彭总是个性很强的人，对于父亲的两次顶撞自然不满意。尤其是父亲当着主席的面和他的那场谈话，那种方式当然是他不能谅解和接受的。他曾经说过：“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信。”这话反映出来的成见已经很深了。

不过，好在无论如何，整风运动也罢，华北座谈会也罢，它们很快就结束了。就算彭德怀同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仍然是倚重的。彭总仍不愧是八路军的英雄指挥员。虽然彭德怀和罗瑞卿吵了架，闹了不小的意见，可两个人在革命战争中仍然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仍然同是人民和民族的尽职尽责的儿子。

这一切，只是当时间推移到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才再一次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变化。不过，这是后话了。

1945 年 4 月 23 日，父亲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个大会。刘少奇同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新的党章中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在党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次大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又出席了七届一中全会，父亲亲耳聆听了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对时局精辟的见解，对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分析，以及中国共产党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的决心。他亲身感受到全党同志对毛泽东主席的爱

戴。这一切都使父亲再一次想到：正是他和他周围的这些人将要决定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他正置身在一些巨人们中间。从此，自己对国家，对人民，也对这个党有了一份更加庄严的责任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又肩负着历史的委托，代表着人民的期望投入到解放战争中去。

在 华 北 前 线

1946年初，中央决定父亲去北平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委员的参谋长。我方委员是叶剑英同志，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副参谋长耿飏，顾问饶漱石及李克农、徐冰、陈士渠、宋时轮、黄一峰、荣高棠。当时黄华、董越千、康黛沙和王光美四名同志担任翻译工作。

父亲在执行部一共工作了五个月。有人向我提起过他在那里一些传奇性的故事，如怎样和国民党参谋长蔡文治唇枪舌剑，怎样用一点小小的文字游戏使美国方面参谋长海克斯难以下台，怎样利用合法身分营救被敌人逮捕的我方新闻记者，又怎样在古北口巧妙地拦截了国民党拉军火的汽车，揭露了敌人搞摩擦的丑恶嘴脸等等。不过父亲对那一段生活的看法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也许又是他的个性所决定的。

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我方及美、蒋两方，美国人是会议的当然主席）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无非是他们提出要恢复交通，我们说不行。他们反复说要恢复，我们反复回答不行。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

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 我一篇 美国人一篇 都是针锋相对 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 吵 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 如此翻来覆去 周而复始 没有终了。

另有一项工作就是在国统区和我解放区的某些地点分别派出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派出，因为大体上是双方对等的，所以一般地比较容易达成协议。这些执行小组少数是重庆三人小组定的，有些是三方委员定的，有些则是三方参谋长协定报三方委员批准的。但这些小组派出后，在我解放区的小组中的美蒋人员，大多数都想方设法收集我们的情报。而在国统区的小组中的我方人员，除了活动受国民党的多方限制外，很多地方他们还动员一些土豪劣绅、还乡团，向我方人员捣乱、取闹、以至扭打我方人员，有的打成重伤。这种情况发生，当然我们要据理向对方提出抗议，揭露敌人。而对方总又是狡赖辩解，因此又得大闹几场，不了了之。在北平就曾因敌人逮捕了我方新闻记者及其他工作人员，并把有些人打伤；或在汽车上撞伤，我们就曾利用当时的合法身分，大闹了国民党的北平公安局。最后那个国民党公安局长表示道歉，答应放人了事。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双方任何一方提出对方违反停战协定，大体都是组织由三方人员组成的所谓调查组，原地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三方参谋长总是要听取调查报告。因为对方总是不讲理的，不是诬赖我们，就是为自己的罪行狡

辩，因此双方（美蒋为一方）人员作报告时，总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又得大吵特吵。

总之，无穷的争吵，吵来吵去，半个问题也不得解决，就是这个会议生活的全部写照。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应酬，出席宴会、鸡尾酒会。这当然一般地不要吵架，但也属一项苦事。

这就是父亲自己给那五个月的生活定的调子。且不说父亲是否天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其实在许多人看来，父亲还是颇通晓一点纵横捭阖之术的），这种调子只是再一次地说明了，父亲是那种崇尚实际行动的人。他从内心深处更看重行动对事态的影响。他也许比别人更容易懂得谈判桌上的一切成果均来自我军战场上的胜利。作为一个将军，他更渴望战场上真正的戎马生活。所以，对于北平城中的锦衣美食，他便以乐为苦了。

1946年6月，中央决定父亲离开执行部。毛主席要父亲去延安接受晋察冀军区部队的行动任务。当时主席住在杨家岭，身体有点不适。主席同父亲谈话说：蒋介石发动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业已在各地大打起来。要晋察冀的部队出平汉线，先消灭一些弱的敌人，扫掉一些敌人的据点，同冀中联成一片。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还告诉父亲，中央准备派林彪到东北去接替彭真同志的工作，任东北局的书记，还说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和主席谈完话后，父亲星夜赶往前线。中央派了汽车送他经绥德等地过黄河，在晋西北他见到了贺龙同志。在这里他就听说，晋西北和晋察冀的领导同志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已向

主席、军委建议两区部队先配合打大同，打下大同后，晋察冀的部队再出平汉线。并得知，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信心很足，甚至打了包票。父亲心急如火，贺老总就又派汽车送父亲经丰镇回张家口。赶路的心太切，途中险些翻车。多少年以后，我多次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过这个他几乎摔死的故事。桥断了，当司机发现险情时已经来不及，司机只来得及“哦喝连天”地大叫了一声就连人带车跌到了桥下。幸好桥不高，河床是干涸的，所以全车人除了一位同车人的小孩碰破了嘴上的皮，出了很少的一点血之外，其余的人均安全无恙。

回到张家口，父亲把主席的指示向聂荣臻司令员做了汇报。就是前面说到过的，主席要晋察冀的部队先出平汉线，先打弱小之敌。但是父亲得到的消息却是主席和军委已经批准了两区部队先打大同之敌，后出平汉线的建议。这时，四周是一片打下大同的呼声。父亲马上受了感染。因为当时是两区部队合作，而且主要是晋察冀的部队担任攻城的任务，因此他主动请求去大同前线。当时的军区和军委批准了父亲的请求，父亲即去大同前线任大同前线政治委员，同张宗逊同志共同组织大同战役。

但是，大同战役却没有打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晋察冀有四个纵队，但却是分散的。杨苏纵队远在热河，郭天民纵队在张家口以东怀来、康庄地区看守北平的敌人。陈正湘纵队主力在打应县，一个旅协同晋绥的三五八旅由周士第指挥在同蒲线北段作战。晋绥的四旅在卓资山防备傅作义、姚 部队大约一个团，并守集宁。所以，实际上

打大同的兵力只杨成武一个纵队加晋绥王赤军军分区的若干地方部队。

大同敌人楚溪春兵力虽不大，不足一旅，但因他长期经营，有坚固设防，大同地势又比较利于防守；我军当时由分散状态刚刚集中起来，装备较差，炮兵很少，炸药也还不会使用，因此攻坚能力很低。所以战斗打响之后，打了很久，不仅城打不下来，连敌之防御外围也扫不动。我们一个旅想了不少办法，打了一整晚，有时完全无效，有时啃掉敌人几个外围据点，消灭敌人个把班、排。最多有一次消灭了敌人一个连，而自己却付出了相当不小的伤亡代价。

打了一段时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过去了。父亲开始感到不行。他一面和前线指挥员积极地交换意见，一面给军区军委发电报。电报中说现在的打法不行，我军屯兵于三个坚城之下（大同、定襄、应县）久攻不克，兵力分散，倘傅作义出援，不好对付。随后，我军亦开始发现傅作义有增援征候，傅本人亦坐飞机到了大同，很可能是视察和给守敌打气。

这时，我军对应县、定襄开始撤围，陈正湘纵队也开始集中，三五八旅到达，杨苏纵队向西线靠拢。可是时间却已经太晚，部队都没有得到休整。

更糟糕的是，这时傅作义的增援出来了，我军又慌忙改为打援。可是杨成武纵队抽不出来，杨苏纵队又没有赶到，还在行进途中。所以，我军只集中了陈正湘一个纵队和一个三五八旅于集宁附近。但两部又因有过伤亡而不充实，长期作战长途行军未及休整，而敌增援部队长期养精蓄锐，力量对比我并无什么优势。

敌人进攻卓资山，原估计可守三天，但是几个小时就丢了。估计集宁可以守一个星期，结果不到一天也丢了。我陈正湘纵队和三五八旅都投入了战斗，但却都未能歼敌。我杨苏纵队赶到集宁附近，该城已被敌占领。因此，无法再打，只好撤出战斗，随即也只好对大同之敌解围。

大同没有打下来，自然是一次败仗。我伤亡大，士气受到损伤。大同未打下，我又失去集宁，还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作为大同战役的前线指挥员之一，父亲从未推卸过自己应负的责任。痛定思痛，他又想起了毛主席对他的那一番谈话。他又一次惊诧毛主席那几乎未卜先知的洞察力，又一次被这个巨人深远的战略眼光所叹服。他写到：

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打城，还是打援，是完全没有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再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战例！

反之，如果执行主席原来的指示，把四个纵队集中起来，出平汉线，其结果将是另一样。不仅可先消灭一些弱敌，使部队在俘获中得到一些补充，部队士气亦必随之增多，而且搞得好的话，还可能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一部分主力部队的歼灭战，取得重大的胜利。还可设想，就是傅作义倾巢东犯，两区主力部队集中配合作战，在张家口以西那样广大的地区，乘敌在运动中歼敌一部，甚至打个大歼灭战也不是完全

没有可能的。即令张家口最后还会被敌人占去，但我对敌作战定会有了主动而不致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这番议论也许有点“马后炮”的味道，但这却是父亲严肃而又真诚的反思。我想，在父亲的革命战争的经历中，类似的反思，类似的战例一定很多。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信任，乃至崇拜，也许就是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前不久，我的几位友人相聚，大家围坐而谈到父亲。提到父亲始终如一的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忠诚、信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父亲本人受到那么巨大的心理上和肉体上的打击，而他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评价仍然那么高，对他的信任一如既往，友人们为此而大惑不解。他们都知道我在写一点关于父亲的往事，就一再探询父亲与毛泽东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使得父亲对于他的感情如此非同寻常呢？我一时语塞而沉默了。也许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说而一时难以说清，也许我也被这样一条思路困住而怀疑自己是否对于历史上真的发生过的“特殊事件”没能把握。但这时，我的一位亲爱者忽然激动地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呢？为什么一定要发生过什么“特殊事件”呢？这位老爷子对于毛主席的信任或忠诚，或者以现代流行的说法叫做崇拜，不就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本身的忠诚和崇拜吗？归根结底，他是把毛泽东做为革命的领袖人物来珍视、来保护的呀……

不管别的朋友对于这一番突如其来的议论怎么想，我是大有豁然开朗之感的。尽管我那位亲爱者并没有把这一观点完全说透，我却循着这个提示想到了许多。

首先我想到了爱因斯坦。这位自然科学的巨子曾说过：“我在大自然里所发现的只是一种宏伟壮观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现在人们的了解还很不完善，这种结构会使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感到‘谦卑’。这是一种地道的宗教情感而同神秘主义毫不相干。”爱因斯坦是这样一种自然科学家，他从幼年起就想摆脱人类出于最低本能所进行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他曾做过不少尝试，有一度甚至想在宗教中寻找出路。但后来，他终于选定了献身自然科学的道路。因为他在大自然面前真诚地感到了“谦卑”。而且他始终认为，在科学的殿堂上，从这种动机出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高于那种纯粹为个人功利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因为后一种人，他们之成为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而前一种人研究科学则纯粹出于内心的需要。从消极方面来说，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从积极方面来说，是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从而实现心灵的宁静和安定。

在阅读这些关于爱因斯坦的精彩文字时，我不止一次联想起父亲，想起他的执著追求、没有一刻安宁的一生。世界上除了有这样无私献身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思想家、宗教人士之外，更有着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在他们之中对于事业的献身出于内心的热爱和欢乐的力量比出于外在责任的力量更强烈、更持久。这种更高层次的需要，使他们超出了一般人对于人生价值的理解，视人生中最艰苦、最困难的向着理性的蛮荒的开拓为最高享乐。

再其次我想到了飞蛾。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飞蛾扑火自遭灾”。在人类看来，飞蛾的愚顽只能从贬意出发给不识时务者以

警戒。但在飞蛾，这才是命运真正的归宿，是它生命价值的最终实现。

我想，关于爱因斯坦，关于飞蛾，可以作为一个也许有点牵强的对于友人们的回答。但我又想到，父亲那一辈人的这种献身的方式，又远非尽善尽美。他们是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严肃而又深刻的沉思，把由于这种沉思而产生出来的具有审美意义和道德力量的情感，具体到对于一种神化的人格崇拜。这就是他们，共产党的将军，尤其是共产党的忠臣们的个人命运的悲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正文。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作为一名政治指挥员和军事指挥员一直活跃在华北的对敌作战的战场上。对于这一段的戎马生活，父亲在自传里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即使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写的自传，也显得文字流畅，情绪非常饱满。我想这是因为那一时期我们党和军队在迅速成长壮大，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所有战斗和活跃在这个集团中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预感到，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父亲正当壮年，历史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所以他写下的这些冷静而又自信的文字，作为解放战争发展史的史料也许是极其珍贵的。

大同撤围后 我回到了张家口。当时决定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及其司令部、政治部等。并决定萧克为司令员，我为政

治委员 耿飏为参谋长，潘自力为政治部主任。整个领导机关和直属队驻在怀来。

当时，一、二纵队在怀来地区，三、四纵队在张家口以西休整。随着东西两面敌人都向张家口前进，步步进逼，我既不好打西面敌，也不好打东面敌人。杨苏纵队组织过一两次对东面前进的敌人的夜袭，抓一把就走，但也只是取得歼敌一营、一团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有战术性的意义，对全局不起作用。因此，张家口失守已成定局。部队的零星行动只起争取时间，张家口从容撤退的掩护作用。

1946年10月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我军第一步撤到察南地区，随即转到易县、唐县地区。此时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区司令部又合在一起，也在此时，太行山晋冀鲁豫军区向军委请求将杨苏纵队归还他们建制。军委批准他们的请求，于是这个纵队奉命由苏振华率领回晋冀鲁豫，只杨得志个人留下，代替郭天民为二纵队司令员。这样晋察冀就剩下三个主力纵队。随后不久，另由一些地方部队组成了一个新的一纵队，唐延杰任司令员。

约在当年12月，东面敌人向易县地区进攻，我们集中兵力，组织了一次对这个进攻敌人的战斗。因敌人集团固守，我未能将敌分割开来，敌增援又迅速赶到，致战斗未能解决。

1947年1月底或2月初，就认识到要先打弱敌了，发起了对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一段平汉线上的敌人的进攻，占领了望都，打开了定县、新乐、正定诸城及其周围沿线各据点，并歼灭了这些县城、据点内的守敌，虽未歼敌主力，

也算一次不很小的胜利，使冀中、冀晋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随后部队进入冀中 想寻求战机作战 未果。就利用部队休整时间在安国召集了一次有各野战部队同志及各二级军区同志参加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强调的是：根据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尤其应该如此，并具体强调了古田会议和谭政的报告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会议并检查和解决了军队作战时期的政治工作，以及军队和地方、军队和人民建立正确关系的问题。

会议后我到各军区去传达会议的决定和精神。部队在冀中未寻得战机，乃发动了一次对正太线东段敌人的进攻作战，占领了井陘、阳泉、孟县、寿阳等城，歼灭守敌阎锡山匪军数千人。

随后部队回到灵寿、行唐地区休整。晋察冀军事领导机构实行改组，在军区领导之下重新成立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我为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为参谋长，潘自立作政治部主任。新的野战军机构成立后，随即转到津浦路以东的渤海地区，进行了青沧战役，打下沧州、青州等地，歼灭了敌交通警察等三五百人，但亦非敌主力。以后又转回平汉线，进行保北战役，打下徐水，歼灭敌主力部队一个团。以后在易县地区同进攻之敌三十五军先头一个师作战，打死敌师长李铭鼎，歼灭其一部，但未能全歼。敌三十五军军长鲁某，因认为此败仗是他那个三十五军从未有的，故在高碑店自杀身亡。

保北战役后，部队回到冀中晋县地区进行诉苦三查的

新式整军，时间约一个多月。此时全国到处打大歼灭战，歼灭大量敌人，惟独我们未能大量歼敌主力，感到压力很大。

新式整军后进行了一次大清河以北战役。因该地离敌平津太近 增援很快 战斗未奏效 部队又折回河南。

以后，部队总在保定以北地区寻求同敌主力部队作战。敌傅作义大概也想集中他的兵力对我，命令石家庄敌第三军军部率两个师北援保定，想配合北面之敌夹击我军于保定附近。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战机。当时我们以两个纵队在保定以北，坚决阻击北面之敌，以三个纵队（当时我们已新成立了一个六纵队）在敌第三军渡唐河以后，迅速将敌包围于保定西南的清风店地区，经一天一晚的激战，将敌两个师及其军部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敌军长罗历戎及一师长被俘，另一师长被击毙。时间约在 1947 年 10 月。

11 月，我军进攻石家庄，当时我军已经学会使用炸药，对战壕作业和连续爆破等攻坚技术、战术比较熟悉了。炮兵和炮弹也多了一点。特别是军队经过新式整军，加之清风店胜利的鼓舞，士气很高，战斗中的军事民主有所发扬，广大官兵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人民也大力支援等等。因此，石家庄敌虽有比较坚固的设防，我经过几个昼夜的激战，终于将其攻克，守敌一个师及其他杂七杂八的部队被全歼，石家庄外围的元氏、获鹿等县亦被解放。

这两个战役才算是晋察冀军民打了翻身仗。

石家庄战役后，部队在石家庄以东地区休整了一个时期。1948 年春 大约在 2 月间 军委要我们出察南。到时 因敌已主动逃跑，除收复蔚县等察南地区，没有能够歼灭敌

人，以后几次寻敌作战，都因敌事先逃跑未获结果。

随后，主席到了晋察冀军区驻地陈南庄，将我从察南叫回指示任务。我见到主席后，主席有如下指示：一、批评我们晋察冀中央局、军区、野战军对中央，军委的报告请示不够，批评得很尖锐。二、批评我们对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毒死自己的妻子未作严肃处理，是错误的，批评得也很尖锐。三、行动问题 要我们率领部队去冀东寻求作战 并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打锦州。四、主席并指示说：你们的任务应争取一年左右把华北敌人的主力消灭，并夺取平、津以外所有敌人现在占领的地方。五、其他任务。

我受领主席指示后，回到前方传达并执行。正当我们率队准备通过平绥路进入平北再转冀东时，军委来令要杨成武率二纵队留下，由一、二、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向绥远行动。要我们率三、四纵队仍照原计划行动 在平北、冀东抽调若干地方部队另组织一个纵队，与三、四纵队合组成另一个兵团。

我们率队过平绥路，经平北转到冀东，得知东北的锦州战役推迟，我们要三纵打平古线上的石匣、古北口，四纵打丰润及北宁线上的某县城，四纵打两城均下，三纵打下石匣，古北口未打下。歼敌守备部队及交通警察三五千人。

在冀东新成立了一个纵队，人数很少。随即在遵化地区会合了贺晋年、陈仁琪纵队 准备配合作战 但未得战机 他们很快亦被调走。以后傅作义集中三个军向我进攻。因无法作战，我又转回平北山区。

在平北驻了一段，发起了对平绥线上的康庄之敌的进

攻，因敌人从东西两面迅速来援，未解决战斗。我们退回平北。三纵队则被敌截断，留于平绥线南。我们在平北听到消息，山东我军攻克济南全歼守敌，并活捉了王耀武。

我们在平北又驻了不久，傅作义集中三个军进攻石家庄。前锋已过保定，到达唐河附近，傅作义并公开叫嚣要乘虚占领石家庄。当时杨成武兵团远在绥远，被敌截在平绥线南的我三纵，起到了一定的阻击敌人的作用，坏事变成了好事。当此情况，军委命令我们迅即南下，破坏敌人进攻石家庄的阴谋。

我们接令后 当天下午即出发 连夜通过平绥线 徒涉桑乾河南进。可我四纵十二旅又被敌截留在平北。我们到达桑乾河南，又接到了东北我军已打下锦州并围歼了援敌廖耀湘兵团的伟大胜利。我们回到平绥线南后，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阴谋即被破坏，其先头已过唐河的部队及其后续即迅速掉头逃回保定。

傅作义的阴谋被破坏后 我们奉命在行唐地区休整。当时主席、中央决定成立统一华北的党政军机关。当时见到总理时，总理要我仍兼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这个工作。但我始终未到职。

在此同时，就已知道了东北我军已经获得了解放全东北，并歼灭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全部军队的伟大胜利。

休整一段后 军委命令我们再出平绥线 配合东北我军进关 并组织了平绥前线党委 程子华为书记 我为副书记。以后因情况变化此机构未成立。我们进到灵邱、广灵地区后，发现敌西援绥远的三十五军回头东窜，企图逃回北平。

军委来电批评我们行动慢了，要我们一定要在平绥线上阻击敌三十五军 不让东逃 并责令说 敌三十五军如被突走，要我们负责。

我们接令后即兼程前进，并令我留平北之第十二旅迅即占领下花园以东任何一个要点，尽力阻留敌人，争取时间 等待主力到达。当我们赶到下花园时 敌三十五军后尾刚刚通过下花园 只后尾警戒部队与我稍稍接触 即乘汽车东逃。当时我们以为阻不住了，没有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情绪极为不安 但也只好如实报告军委 时已接近黄昏。但幸而我被敌阻留平北之第十二旅 已先敌占领新保安 将敌阻住（敌是傅作义建立的机械化部队 全部乘美式汽车 离开公路不能行动）再将坏事变成好事。于是 我主力三、四两纵队分多路连夜以最快速度从新保安南侧转入新保安以东 然后将新保安让给敌人 当敌人进入新保安后 我即将其围住。第二天一早敌三十五军拚命突围 怀来敌一〇四军亦拚命西进接应。我三、四两纵背靠背分别对东西两面敌人阻击。当时我们令两纵要不惜任何代价，鼓励部队阻住两敌 并传达军委命令 谁让敌三十五军突走谁要负责。我三、四两纵在部队相当疲劳 又无阵地的情况下 奋战一天 两敌均被击退。

第三天 我东北一个兵团已越过平古线 前锋进达平绥线上之康庄。敌一〇四军慌忙南逃，并被我东北部队歼灭一部。至此 敌三十五军已确实被我围于新保安 再无法逃走了。

在此同时，杨成武兵团已将张家口敌人东西道路截断，

将其包围。随后军委来电 通令嘉奖华北、东北有功各纵 并说：我军分别将华北敌军包围或者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各点 造成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我们曾建议迅速歼灭新保安之敌，军委要我们暂时围而不打。

1948年12月22日，我们奉命令歼了新保安敌三十五军的军部及其两个师。战斗结束当晚，军委命令我们西进大同，围歼大同之敌。我们于西进途中向军委建议：因大同敌人不多，我们去北平参加平津作战，不去大同。我们到达张家口前一天，张家口敌人因三十五军主力被歼，实行突围，被杨成武兵团及东北一个纵队全部歼灭，只敌孙兰峰少数骑兵突围逃走。

我们到张家口后，接军委电令，同意我们不去大同，并要我们两个兵团同东北的那个纵队一起开赴平郊，配合东北我军参加平津作战。直接受林彪指挥。

我们转到平郊后，奉命驻在颐和园附近，后去通县看了林彪和罗荣桓同志。以后北平敌军接受我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参加了北平入城式后，改编了敌人一个军还是两个军，补充了我们兵团。随后部队即开赴太原前线。

部队行动时，我接通知去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参加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在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就是主席著作中发表了的那两篇。当时我向林彪请求，要求随大军渡江南下。他同意并报告了主席。在一次会上，谈到一些高级干部工作的分配时，林彪说赞成我随军南下。主席说现在还要打太原，待太原打下后我的工作再定。当时彭德怀曾站起来说，为什么不让他去西北，是不是担心我同他的关系搞

不好。主席还是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会后，我即去太原前线。当时军委决定组织太原前线司令部和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前者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我为副政委。后者徐向前为主任，赖若愚和我为副主任。当时徐向前病了。军委决定由周士第和我暂代理徐指挥。

二中全会时军委已决定将全部野战部队分别称为一（西北）二（太行山）三（华东）四（东北）野战军，华北三个兵团，称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我们是十九兵团。

太原战斗发起之前，彭德怀来到前线。但他首先声明不干预我们的决心和具体事。战斗发起时，他一直在我们的指挥所里。因为战斗进展顺利，他表示很高兴。

当时形势很好。太原敌人处于绝对的孤立。我集中了华北三个兵团，四野又支援一个炮兵旅。我是绝对优势。至于敌我士气对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而虽然敌人长期经营，并有日本人的帮助，太原确有坚固的设防，当时城内也还有一部分日军留下的人员。但这些都是完全无用的。我军发起战斗后，仅一天一夜，就完全扫清了外围。略经准备，即发起攻城。随即我军各路都迅速突入城内。不到一天，战斗就完全解决。敌被全歼。一切敌之大小头目，孙楚、王靖国之流都俯首就擒。只有少数死心塌地的特务、汉奸、恶霸首要分子举火自焚或服毒自杀身亡。

太原打下后，召集了一次军队干部会议，参加了一段太原军管会的工作，回到十九兵团，作了一点交代。十九兵团当时驻平遥，正准备向西北进军，我住了几天就乘火车到了

北平。

到北平后，总理与我谈话，要我到公安部工作。我当时曾请求总理允许我随军南下。总理说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也需要人，劝我不要再提。当天晚上，主席在香山住地找我谈话，要我去公安部。我当然不能再提，只能服从决定。这样，我就正式地离开了军队的职务。时间约在 1949 年 6 月下旬。

以上是父亲自己对解放战争中在华北战场上的活动的记述，其中包括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和太原等著名战役的简要经过。为了更详细一点描绘父亲的整个风貌，我还要在下面引用一些当时和父亲在一起工作过的人们的话。这些话，除了朱老总的那一段之外，都是我在采访中随时记录下来的。被采访者大都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是一些即兴的谈话，所以这些话可能更生动，更传神一些。不过这当然仅仅是我的感觉。

1947 年 6 月，朱总司令向党中央、毛主席推荐父亲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时，说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愉快”。

以下这些即兴谈话，恕我不一一披露姓名了。

“他很爱学习，一向很爱学习，在抗大的时候就是这样。打太原后，他就住进太原城里。我有事去向他请示，到他住的地方去，看到他正在看书。我问他：你在看什么书啊？他说：我在看《政治经济学》。战争中军务很繁忙，看些报纸、战报，至多看一点军事书籍。可是他却在读《政治经济学》。那时我们都忙，谁也没啃大

部头的书。

“他还有一个特点，亲自动手。在我的印象中，他在会上讲话做报告没有什么人替他起草。会后我们的《子弟兵报》（晋察冀军区报，后为十九兵团报）把他的稿子要来，他的字很有特点，写得很清楚，把当时不能发表的军事机密删一删就可以排印。

“他喜欢看戏，张家口解放了，带我去看了一场京剧《凤还巢》……”

“罗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人。他对很熟悉的干部也不迁就，很喜欢的干部也不迁就。对我，他是很喜欢的，抗大起就很看重。还有一个叫××。但我们也不能出问题，否则也不放过。高级干部中像罗这样坚持原则，绝不迁就的人不多。在晋察冀，罗当副政委，我们都是在底下纵队工作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个纵队都有个‘小家底’，小家底儿有的真不小，还开了花纱布公司，开了馆子，那都是傅作义进攻张家口前后的事。因为部队有行动，东西搬不走，就抓夫，搞了好多毛驴、大车、民伕。主要是搬布匹，吃的东西，好东西，都搬进山，浩浩荡荡。那时三纵队三万多人，总抓了一万民伕搬东西。几百辆大车，一路上还有飞机炸。这个事让罗知道了，不得了，不饶我们。大骂我们是国民党军队，跟国民党学的会抓伕了，骂了还不够，开了个安国会议，整了我们二十多天。大家讨论他的报告，他的报告是整顿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大家都得表态，究竟是同意不同意，也可以反对，有理由的也可以说明。可是大家都没话说，他虽然骂得凶，批评得尖锐，可他是真的，我们错了，谁叫我们错了呢？可

说了半天，挨骂的这些人都是他喜欢的，也不留情面。

“他这个人 对别人相当严格 也是严于律己的。那时候 他坐一辆破吉普车，还没有我们阔气。有一次我对他说‘罗副政委，你那个车是不是换一下？我们缴了好多拉战防炮的。那些车都是好车，一级车 你换一下 把那个旧吉普给他们拉战防炮去。’我说完 他停了一会儿 说，‘算了吧 不要换了。你要晓得 他是打仗的。我这个车换给他，一旦打起仗来 坦克来了 他那个车拉不上炮 要死人的。我这个破车不要紧呢 实在破了 我还可以骑马呢。’这个话 不但我 在座的许多人都听到了。大家觉得罗副政委真是个好人。那时，这样的人真不多。要就要，你不送我还打电话。打完正太线 缴了那些新轿车 牛皮纸也没揭下来 他也不要。”

除了这些，父亲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在别人的语言描述里是很生动的。

“他对社论特别注意，对中央的指示特别注意。他看中央的电报，比谁都看得细，还经常在本子上记下来。要我们下面办什么事 他都要检查 办不到 也得说个像样的理由出来。所以他要办的事很少办不到。有能力，所以就有威信。对上面的指示和精神 尤其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 总是能说出很多道理来，一交锋 理总在他那里。也怪 别人说 不一定就有说服力 他一说就心服了，也许是真的口才好咧……”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加起来也还不等于父亲。

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写到这里，不知读者是否认为已露端倪。坦白地讲，我至今是心中无数的。

且不说评价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难度，更何况他是我的父亲！是一个手脚不停，在生活舞台上异常活跃的人物。他曾穿梭往来于一些伟人的宏大、玄妙的心灵之间，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他的经历都和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些非常复杂、非常特殊的现象纠缠到一起去了。

罗瑞卿——一个忠诚的战士，或者一个多少有点偏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永远对人民和领袖怀着负责心理的苦行僧，或者一个铁腕集团中的中坚分子，一个内心纯洁的英雄，一个狂热的功利主义者，一个幸运儿，或者一个注定的悲剧人物，一个出类拔萃的实践家，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愚忠之辈。或者一个徘徊于道德良心和理性良心之间而不自知也就无法自拔的受难者。这一切，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当我以后来者仅有的优势，尝试着和父亲及父亲拥有的那一段历史拉开应有的距离时，我真的突然失去了这些头衔之间原来应该存在的界限。它们在我的眼里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

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此刻已面临着一个关节点，跨过了这个关节点，中国共产党人变成了执政和掌权的人物。这个非同小可的变化，使得父亲随同历史进入的成熟期中有一些更加生动的行为。

于是，我在此结束本书的上篇。

下 篇

公安部长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缓缓升起，当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们群集在天安门城楼上，簇拥着巨人毛泽东，当全中国全世界倾听着他用高亢的、浓重的湖南乡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千千万万的人都清楚地想到了，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这个变化甚至对世界历史的进程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仍在惊诧、观望、甚至是咒骂，但事实雄辩地摆在那里。在一个从韶山冲里走来的，命运原先只承诺他成为一个“教书匠”的长发青年的带领下，一群满脚泥巴，满手老茧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们，带着和中国传统的上层文化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一举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而且是在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完整和统一的前提下。要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四万万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映映大国啊！

很多人都被这个奇迹激动了。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甚至一些原先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的眼里，国家和民族的前程和现状都是非常光辉灿烂了。在这种普遍的陶醉

情绪里，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是最清醒，最冷静的一个。早在 1949 年 3 月 5 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上，他又以同样的思想和同样的语气告诫更多的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他确实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雄鹰，昼夜不息地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着在他的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他呕心沥血地运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经验保卫着新生政权的安全。这无疑是正确的。既然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那末在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来自敌对分子和原统治阶级残余势力的反抗情绪必然存在，和他们之间的较量确实要在一个时期内激烈地存在。就在这种时候，父亲被毛主席选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

1949 年 6 月下旬，周总理从十九兵团的驻地山西平遥将父亲召回北京。他对父亲说，要父亲去公安部工作。父亲曾请求允许他随军南下。总理说，就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很需要干部，要父亲不要再提南下的事。当天晚上，驻在西山的毛主席又约父亲去谈，当面点将要父亲去公安部，父亲当然不能再提南

下。这样，父亲就正式地离开了军队的职务。

公安部在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原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杨奇清带领的一部分人员和干警为基础组建。先称中央军委公安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建国开始，公安机关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许多新解放区正在剿匪反恶霸，大城市中也不平静。在一些地区，旧社会留下来的渣滓、恶霸仍在欺压群众，一些对新生政权怀有仇恨的反革命分子活动频繁。杀人、放火、投毒的案件时有发生。这时候 人民普遍批评公安机关宽大无边，连某些民主人士都这样说。镇压反革命分子已经成了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主张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 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的镇压。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毛主席当即批准说：赞成你们的意见。但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1950年10月中央发布了镇压反革命的‘双十’指示。北京市人民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和殿前开了万人大会。在会上，父亲以他一向洪亮的声音做了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报告。这以后，父亲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十一个省、市开展镇反的情况，以第一手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

在‘镇反’运动中 中央和主席非常注意各种政策的制订。毛主席曾经亲手写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捕了就是犯错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 杀了就是犯错误。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强迫劳动 以观后效。在‘镇反’高潮中逮捕的反革命 要进行很好的

清理。不仅错捕而且凡属可捕可不捕的要一律释放。”主席把对待反革命的杀、关、管，发展为杀、关、管、放。对于杀人界限规定为：只杀少数罪恶、民愤极大，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在第一次大镇反运动之后，为了严加控制，毛主席规定县无捕人权，捕人须经地委批准。杀人权收归省委，以后又收归中央。1953年后就强调少捕、少杀、多管。

由于“镇反”运动是在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獗，敌我阵线分明，群众又有要求的成熟时机发动，在运动中又非常注意执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所以“镇反”运动的社会效果很好。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少数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使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并使新生政权的巩固有了保证，给全社会增强了安全感。尤其是在“镇反”运动中创造并开始实施的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新人的政策，更是深得人心。这个由我国公安部门创造的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改造的独特政策，确实使一大批原先的反动分子脱胎换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劳改制度至今在国际国内有着很好的影响。并在继续发挥作用，继续使犯罪分子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新人。并因此被国际友人盛赞为“实行人道主义的最高典范”。据说，至今北京市场上供应的塑料童鞋和尼龙袜，绝大部分仍是劳改工厂生产的。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党只习惯和善于使用军队来完成实质性的任务。但是现在，要想建立一个初步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不得不倚重于公安这个准军事的力量。公安变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队伍。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不得不对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队伍建设等等事必躬亲，而且用人处事极其小心。这些都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曾在自传中很详细地记录过以

下这些事件和场景。

1950年春北京一个警卫师改为公安师，是当时的总参机关批准的。毛主席看到了批准的文件就在这个文件上写道：什么人批准这个师改为公安部队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了这事，当时的总参负责人和父亲都作了检讨。

同年9月，李克农同志告诉父亲，他同主席谈话时主席对他讲了一些话，那意思是公安部不向主席写报告，主席很生气。父亲立即去见毛主席。主席先问父亲为什么不给他写报告。父亲说写了报告呀。主席说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看。还说你的党性比××差，比××委的人差。他们××部，××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主席这样一说，父亲就紧张了，赶快向主席说明，报告确实是写了的，只是没有直接送达毛主席。以后，总理知道了就向主席报告说，公安部的一些文件是在他那里压了，没能及时送达主席。这是总理替父亲分担责任。毛主席以后又在同一个场合里和父亲说，报告要直接送给我，不直接送我不行。要知道，我们这里是有仓库的。后来主席又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写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这种咄咄逼人、一追到底的坚定作风，确是主席领导方法的一个鲜明特点。

后来，由于公安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及公安部队的归属问题，父亲以及别的方面的同志和主席的想法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有些事情没能完全按照主席的原意去办。父亲颇有些诚惶诚恐，这一点细微的情绪变化也被主席觉察到了。

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父亲忽然受到了毛主席的召见。进门了，父亲发现主席已经靠在床上准备就寝了。主席见父亲走

进来，就对父亲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已经同你们闹翻了？是不是剥夺了你的兵权，不满意？当时父亲看到毛主席已很疲劳，并猜到主席是已经服过睡前的安眠药了，怕影响主席的休息，父亲除表示绝对没有不满意的想法，反复劝主席休息。回家后，父亲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除就具体问题向毛主席做了必要的说明外，再次向主席表示他本人绝无不满意的想法。父亲还在信中说昨夜因主席太疲劳所以他未把话说完，请求主席再找他谈一次。

第二天主席收到了信，立即要人打电话叫父亲去谈。谈话中父亲表示，由于没有很好体会和执行主席的指示，工作没有做好，有负主席的委托和希望，引起主席的不安和焦虑，自己很抱愧，心情也很不安。并再次说明自己对公安部队归属问题上的看法。毛主席对父亲说：有错误不要紧张，改了就行了，并要父亲好好工作。这次谈话时间较长，主席还留父亲吃了晚饭。

这些经历，对父亲这个一向重视主席评价和组织纪律、请示报告的人来说，无疑是印象十分深刻的。“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从此就成为公安工作的指导方针。公安部还很快完备了直接向中央，尤其直接向毛主席本人请示报告的制度。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父亲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工作报告就有280多件。周总理对于公安部的请示报告观点明确，材料充分而又简明扼要十分称赞。曾要求其他部门向公安部学习。

1953年春，党中央面对新形势，正酝酿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八大，考虑国家体制，中央及国家领导机构人选调整的问题。这时，中央和毛主席发现了高岗等人的不正常表现。6月份的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离开了会议的本来议题，散布了一

些流言蜚语。会后，他又以休假的名义到华东和中南地区对一些高级干部大谈什么“枪杆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说什么“毛泽东代表红区党，刘少奇代表白区党”、“党本来就是两个”，还散布了一些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言论。高岗的这些活动确实使一些同志，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思想上产生了某种混乱。

1954年，有一天，主席和父亲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谈话。毛主席问父亲：我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来主持？父亲说：主席退居二线，当然少奇同志来主持一线。不过……（意思是现在有些流言蜚语，使得少奇同志的威信受到影响。）毛主席没等父亲说完这话就马上批评父亲说：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又说：世界上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然后主席告诉父亲：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毛主席说：他仍指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父亲听了主席这些话，感到受了很大的震动。主席最后说：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这场谈话后不久，毛主席要去杭州，父亲随行。行前，毛主席开了一个会。父亲在座，高岗也在场。主席交代说他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毛主席当时点了点头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毛主席用手势向上向下比划说：中央的风这样吹（手势向上），他的风却这样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

接着主席问赞成不赞成。据父亲回忆，高岗的脸通红，他很不自然地地说赞成。晚上，高岗突然打电话给父亲，说要到家里来看父亲。父亲回话说请他不要来，有事父亲去他那里谈。他同意了，并说确实有事情要谈谈。放下电话，父亲马上到毛主席处报告了此事。主席说：快去，看他讲什么。父亲到了高岗家。高岗对父亲说，要很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反复说要注意，不要马虎。还说：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说这些话时高岗的态度很不自然，甚至有一点慌乱。父亲说：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检查身体时也不会马虎。并说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还对他说，林彪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谈完这些，再无话可谈。父亲就告辞出来。

毛主席到杭州后，周总理在北京主持会议同中央的其他同志研究了高岗的问题。父亲赶回北京参加了这个会。1954年2月6日到10日，中央根据主席的提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主席没有出席。刘少奇受主席委托主持会议。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余人发言批判了高岗等人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955年3月21日，党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致开幕词，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这时候高岗已经自杀了。

父亲对于高岗的反党阴谋，像对于一切党内的阴谋事件一样疾恶如仇。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心目中，在全党同志的心目中确实是一面伟大的旗帜。他们不能允许任何人在这面伟大旗帜面前玩弄阴谋。高岗事件的始末使父亲对毛主席的认识更加深刻。

他亲眼见到在和高岗的斗争中，毛主席运筹帷幄，料事如神，棉里藏针 出击必胜。在不动声色之间 就使对手处于明显的下风。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党内确实有敌对分子，党内斗争确实是十分复杂和严酷的。父亲曾经迫切地期望过自己在党内斗争这条战线上尽快地成熟起来。但实际上却一直未能如愿以偿。我想，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恐怕是最主要的。在这里，我将试着加以说明。

事实上，父亲是从当公安部长的时候起才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这种特殊的身分使他对主席的情绪、行止、言谈具有空前的近距离观察的可能。他在这位巨人面前感到了始终如一的惊诧。

1951 年 10 月，公安部得到情报：日本特务要炮打天安门，破坏我们的国庆游行活动。同时又有消息美国飞机可能要来轰炸（因当时正在抗美援朝）。父亲将这些情况都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轰炸也好 打手榴弹也好 打迫击炮也好 都不准动 照样阅兵和游行。”后来 我们照常进行了国庆庆祝活动 并未发生情况 毛主席高兴地对父亲说：“你看，飞机没有 手榴弹也没有……”

类似这样传奇般的事件，在父亲的经历中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他充分体验到毛泽东的性格中那些极富魅力的素质。更何况父亲长时期以来对毛主席鲜明的个性，超人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以及深邃的智者的风度敬慕不已。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地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

几乎在同时，中央又提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的问题。父亲出

于对隐蔽战线上秘密工作性质的了解，起先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微弱的不同看法。但当他明确地知道了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坚定态度时，他毫无保留地执行了中央对于潘汉年同志等人实行逮捕的错误决定。还有以后的对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对胡风同志本人的错误处理，父亲都是就自己的职责坚决执行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为这些遭受了多年不白之冤的好同志恢复了名誉。这些巨大的错误才得到了纠正。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我读到了许多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于潘汉年夫妇在劳改农场中最后的悲惨日子的描述，有对于潘汉年同志早期艰苦卓绝对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战斗生活的回忆。尤其是最近胡风同志的夫人梅志撰写的《胡风传》，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惨痛的经历使我感受到比一般读者深重得多的痛苦。我当然懂得，我的这种负罪感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甚至是可笑可厌的。但它却是真实的。尤其读到梅志同志描写的她在胡风出狱前那一次次痛苦不堪的寻找胡风的下落和探监，我想到，这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寻找父亲和母亲的下落和随后同样痛苦不堪的探监的经历多么相似啊！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的公安部长的女儿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当然，我并不是在把这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我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分量。这确实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的现象。它们因为产生于同一时代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难道

不是吗？它们同时的、必然的存在能提供给人们的思考，比它们单独、偶然的出现要有意义得多。

父亲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这十年间，公安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的显著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父亲从来是个力争创造第一流工作成绩的人，他不仅有愿望，有精力，而且还有能力。他总能够使自己分管的那一部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解放初期，他带领了大批公安干警积极参加镇反、清匪、反霸、禁毒等群众运动，打击惯盗惯窃、流氓头子、取缔妓院、赌场及其他下等娱乐场所，清除了旧社会的渣滓，很快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为我国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确定了我国治安行政工作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治安法规，在法制未能健全的情况下，有力地保障了安全生产和社会秩序。在他主持公安工作的十年间，由于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加强了同各种治安灾害事故的斗争，开展了安全运动，加上有力的治安管理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称赞和国际友人的热情赞扬。公安部还以它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效率，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表扬。“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广大公安干警一起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套公安业务被破坏了。周总理曾经十分痛心地说：“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在怀念当年良好的社会秩序，怀念公安工作的好作风，怀念当年的破案率。怀念那支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人民所喜爱，为敌人所惧怕的干警队伍。父亲始终认为这些成绩

要记在党的帐上，记在毛主席的帐上。1959年父亲在总结十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时，曾充满激情地写到：“在这样尖锐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和领导，始终像北极星一样明确，像狮子一样勇猛，像天平一样公正，像火焰一样热烈，像泰山一样镇静。”

在这里，还有一点是必须提到的。在父亲十年的公安工作生涯中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毛主席的安全。父亲把这当作他作为公安部长的天职和重要任务。在这项工作中，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由于他过分的周到和谨慎小心，曾经使一些被保卫的领导同志产生过误解。不过时间已经证明了，父亲的所有举动均出于工作职责和良好的动机。而且父亲也从未因任何埋怨和误解而丝毫松懈过自己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父亲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缜密无懈。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父亲都亲自部署安全警卫工作，亲临现场检查，做到了万无一失。许多人都说，那几年，父亲就像是主席的一个大警卫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纪录毛主席各种活动的新闻纪录片空前时兴。其时父亲已被打倒。虽经编辑人员精心剪裁，但也许父亲和主席的关系太密切，尤其是在建国以后十几年里，父亲亲随毛主席左右的时候太多，所以，我总能在那些纪录片的对毛主席的大特写镜头里发现父亲忙碌的，风尘仆仆的身影。

1958年6月，毛主席从外地打来电报给中央，说他要去长江三峡游泳。并说如中央同意，即要父亲去长江三峡侦察水情，看是否能游。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对主席冒险游三峡，并点

名要公安部长去试水情颇有些微辞，但父亲却认为这确是他责任所在。中央同意后，父亲当即出发，带了干部队和湖北省公安厅一些水性好的人去。从宜昌到重庆，再由重庆到宜昌，沿途反复侦察 反复试水。因为礁石太多 地势险要 引起水流湍急 并有很多又大又深的漩涡，干部队韩队长和几个水性最好的年轻人去试水，都多次陷进去，抛出系着绳子的游泳圈才把他们拉出来。为证明三峡确实不能游泳 父亲要人绘了图 注明水情 回来报告主席。主席表示满意 说既然真的不能游泳 那就不去了。父亲松了一口气。1959年6月 毛主席回长沙 游了湘江 随后由父亲陪同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家乡韶山。

在韶山，父亲随主席走遍了他家乡的山山水水。他亲眼看到主席作为一个归来的游子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多么眷恋，对邻里、乡亲 儿时的伙伴是多么亲近。一天清晨 有人来向父亲报告说毛主席不知到哪里去了。父亲说：“不要慌 让我来想一想。”父亲略一沉吟，就带着人们向主席故居旁边的一座小树林里走去。父亲知道，那里埋葬着主席的父亲和母亲。果然，毛主席正面容庄重地伫立在双亲的坟前。父亲示意大家不要打扰主席，并帮毛主席采摘了两条松枝放在二老的坟前。我猜，那一刻，毛主席心里一定很感谢父亲的，感谢父亲帮他寻找到了一种得体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而父亲也一定被伟大领袖心头萦绕着的浓厚的人情味儿所感动。毛主席在韶山还召开了老农民、老党员的座谈会。在会上乡亲们毫不客气地提到了“大跃进”大冒进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提到了吃大锅饭、吃食堂大家饿肚皮的事。毛主席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后来 毛主席一离开韶山 这里的食堂就散了伙。韶山大队是全国农村食堂散得最早的地方。

毛主席离开韶山就直接上了庐山。

1959 年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要对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过左倾向总结经验教训的。毛主席提出了读书、形势、任务等十九个问题要到会同志讨论研究，以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在分组会上，许多领导同志都就目前出现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刘少奇同志说：“1958 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1958 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朱德同志在中南组发言时说：“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这时候，虽然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左”的倾向是主要的，要反“左”纠“左”。另一种认为形势很好，不应反“左”纠“左”。但是会议的气氛还是正常的。7 月 14 日西北组的彭德怀同志在会上做了发言和多次插话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写给了毛泽东主席，请他参考。但彭德怀同志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却把这封写给他个人的信件亲笔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全体到会同志。7 月 23 日，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此时，是否反“左”纠“左”的争论已无必要存在，整个会议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批“左”向批右的逆转。

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在关键时刻敢于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勇士。庐山会议的错误不仅在于搞出了一个莫须有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更为可悲的是它还使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蒙上了阴影。我们党内一个人说了算的风气就是从庐山会议起愈演愈烈的。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以及“反右倾”的歪风很快刮遍了

全国，使国家的经济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父亲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前期会议。他奉主席之命去阳新考察救灾工作。等他上了庐山“反右倾”已成定局。加上他原来就对彭老总有些成见。更重要的是他对毛主席的无条件的信任，他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

1959年9月17日，当彭德怀同志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他的提议下，父亲又回到军队工作，任总参谋长。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这样，父亲便又回到了军队工作。

我的注视

1951年5月的某一天，这世界上有了我。从此我便以自己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也许当我失去父亲的时候才真正懂得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在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的言谈、思想、甚至他的容貌、他的声音，始终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着我心灵的目光。这种魅力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丝毫的减弱。每当我碰到一点特殊的事情，我就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会怎样说或怎样做。

按照预产期计算，我是应该生在八月份的。可是五月里的一天晚上，妈妈忽然感觉不好，请了医生来，一看就说：“快上医院，马上要生。”我生在清晨，生下来比一支筷子长不了多少，不会哭，也不会吃奶。医生们只好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暖箱里。父亲来看我，他走进我的房间，看到我，先是轻轻地，很吃惊地说：“哎呀，这么小。”随后，他伸出手来想抱抱我。可是他发现我睡在那样一个怪头怪脑的透明箱子里，就收回手慢慢走出去了。父亲和母亲开始为我担忧，他们怕我长不大，更怕我会是一个白痴。他们去向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请教。林大夫笑哈哈地说：“不必担心，完全不必，你们的孩子会好好长大的。”随后，她还举了许多例

子 哪国的总统、哪国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都是早产儿啦等等。非常遗憾，我这个早产儿并没有成为那样的伟大人物。但是我却在父亲母亲的温暖怀抱里长大起来了。

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第五个。母亲不知为什么，每怀一个孩子，妊娠反应总是特别强烈，加上母亲生性要强，总想多做一些工作。还有早几年打仗 环境艰苦 所以 母亲总不愿意生那么多孩子。可是父亲喜欢孩子，每当这种时候，他除了加倍体贴母亲之外，总是以这样的话来劝慰母亲：“你看 咱们的孩子多好，一个比一个漂亮 越生越好。你生吧 生下来 我来养。”所以 我就有了六个兄弟姐妹。有两个，父亲已经签了字准备不要了，可又由于别的原因，而主要可能还是因为他的爱子之心而生下来了。事后 父亲曾很得意地说：“看看 幸亏都生下来了 签了字的两个可都是男孩子呀。”不仅如此 我们家实际上有八个孩子。一个同父异母，但感情十分亲密的小青哥哥；一个不同父不同母，但感情也很好的金纳姐姐。父亲母亲高高兴兴地把我们八个人都养大了。

在这里，我抄录父亲给母亲的一封信。

治平：

遵照你的意见 将田儿、小青等先送回读书。内有金纳，乃邓发的孩子，其母托我们代管。请送她去学校，每礼拜六同我们孩子一块接回。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再添一个麻烦，没有办法，也应该照顾。盼你不要怪我好管闲事。

我出来一个多月 很想回去了。但是事情没有完又不好走 也不应走。我这个人作事 就是喜欢负责到底 你是知道

的。这次出来走一趟 对我的意义很大 工作收获亦不少 你应为我高兴。

你现在身体怎样？希望你好好注意，经常去检查，不要大意。朵朵是不能再生病的，望多加注意。书儿去学校了，猛儿怎样办？

我买了一点东西，主要是衣料及孩子们的玩具，请你照收。

我很想你，但大约还要十天才能与你见面。事情忙，不写了。吻你，再吻你！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惊讶在这信里何以没有提到我和弟弟。按照常理父亲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会忽略的。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此信写于 1950 年。我和弟弟还没有生下来呢。

我总想，我们的家庭和睦，兄弟姐妹之间亲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父亲母亲之间的和睦和亲爱。三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他们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度过了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光 下面 我还要抄录两则母亲的日记。

1956 年 5 月 25 日（农历四月十六）星期五

今天是我 34 周岁生日，一般说来还是应当庆祝的。因为从 17 岁起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工作，已经又 17 年了。

应当庆祝的第二点是了解了劳动的意义。

应当庆祝的第三点是，我有一个好的、愉快的大家庭。

青对我是好的，我们有不坏的感情。孩子们一般读书都努力。听父母的，小一点的孩子们都健康。

早晨不到 8 点钟，青来过长途电话。祝我长寿，永远年轻。下午 5 时半收到飞机带来的信和青带给我的礼物。最好的是一小瓶白玉兰，洁白的，朴素、美丽。信上说一朵花代表五岁，数了数，我可以活到两百岁。

1956 年 1 月 2 日 星期一晴

10 点钟从家里出发到沙河镇，在沙河边上停了车，我们下去沿河边的树林向前走，小青和猛猛走在最前面准备打鸟。我和青和小的女孩们一块走。天气晴朗，一点风也没有。小河的水在急急地奔流。有的树倒在水里，挡住了水，可以发现一群群的小鱼。小鱼昂头向上游奔走。青说：“一切生物都要经过斗争才能生存。”朵朵最高兴，一点不怕冷地拿着冰块玩。爸爸说都是妈妈的主意。孩子们乐得要命，要和爸爸赛跑，还在小块的水面上溜了冰。孩子们提议夏天来玩一定更有意思。过了小桥就到大路，孩子们都不愿回家，要求到十三陵去玩。1 点钟出发，15 分钟就到十三陵，先找了一个好地方把带的东西吃过后，经过明成祖的陵然后往回走。

今天爸爸妈妈和孩子们都显得很高兴。

不过实际上，父亲并没实践他对母亲的诺言。母亲是生了，生了我们六个，可我们却不能说是由父亲“养”大的。母亲日记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为父亲被太多的工作占据着，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当少。

当我在联缀童年记忆的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实际上是很不清晰的。虽然我们所有的人都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寸时光，但是我们对母亲，甚至对照管我们的阿姨、老师，也比对他熟悉得多。

他总是忙碌的，对我们有时有点心不在焉。我们呢，好像总是在等待，等待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待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的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实现那些他偶尔许诺给我们的“接见”。

不知道别的哥哥姐姐们怎样想。我觉得小时候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父亲亲密的。大约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吧，过新年，我和弟弟把我们的玩具洋娃娃、狗熊、汽车、不倒翁等等都摆在门厅里，这些玩具摆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阵，是我和弟弟想出来的，独出心裁的欢迎爸爸的方式。父亲那天回来很晚，我发现他实际上对我们的漂亮的方阵心不在焉。他甚至还不小心碰倒了我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把那鸽子的眼睛碰坏了。我好久都不能原谅他。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父亲的汽车开进大门，不知出于什么心情 怨恨、害怕还是陌生 我掉头就跑。我想父亲一定是看见我了，他一边走下汽车，一边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的心怦怦地跳，但是我却执意躲在我自己选中的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父亲叫不到我，就走进房里去了。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父亲失望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和父亲之间产生真正的隔阂。因为父亲毕竟是慈爱的。他再忙，再累，也会找到机会把他的爱送到我们的身边。仍然是儿时的事情。好几天都没见到父亲和母亲的面了。临睡前我忽然感到很孤寂。但是我终于想了一个办法，我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枕头胡乱地塞在自己的头底

下，摆了一个很难受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父亲母亲真的关心他们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纠正我的姿势。深夜，我在朦胧中感到有人把我的房间里的灯打开了。我听见父亲在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着了？”随后有人轻轻地把我头下的枕头拿开了，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双手。从此我就是好多天看不到父亲母亲的面，但我知道他们是关心我的，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进我的房间，会用他们的心和他们的手给我以巨大的温暖。还有一次，我正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看一本画报。忽然父亲拿着一个小小的剪纸兴冲冲地走进来。那是我的手工，我想我是不留意地随便将它放在什么地方的。父亲叫着名字说：“妈妈说这是你剪的，真的吗？真的是你剪的？”当他得到肯定的答复时，他把那张剪纸拿在手里看来看去，高兴得脸都红了。父亲是很爱看戏的，我生就一副大嗓门，当父亲兴致好的时候，我常大着嗓门给他唱一支歌，他也会很高兴地说：“我这女儿，将来也许能去唱黑头，当个女花脸。”

当我记述这些童年关于父亲的温馨的回忆时，我的心是多么感动啊。是的，父亲算不上一个很温柔很细腻的父亲，工作占去了他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但他却是一个真诚的、热情的父亲。正是父亲这种庄重的爱，使我学会了去爱别人，使我的心灵中始终能保持一些善良和纯净的力量，使我能在纷乱的生活里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人不可能永远不长大。父亲离我而去也已经整整九年了。但我仍然能够感到那些久远的，由父亲亲手播种在我心灵中的感情的力量。

父亲对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的教育是绝对革命化的。而且他有意无意地用他那种对党的绝对忠诚、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

热爱影响着我们。1962 年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遇到了巨大困难。这实际上是庐山会议以后‘高喊’反右倾’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那时候，我们虽然远远不至于挨饿，但我们家的饭桌上也是十分简单的。记得有一天，父亲从中南海回来，脸色不大好。吃晚饭的时候，他很郑重地对妈妈，也对我们讲：“毛主席已经不吃肉了，从今天起，我们家也不吃肉，人民和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和人民同甘苦。”这以后，部队组织了一部分力量到内蒙古的草原上去猎黄羊。这些猎物首先送给了中央，送进了中南海。那时候我在十一小学住校读书。有些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让我回家去和父亲说，也想要点黄羊来打打牙祭。我回去时和父亲说了，父亲很不高兴地批评了我。说我已经长大了，却不懂事，以后听到什么要分析分析，不要随便替人传话。并告诉我，猎到这些黄羊是很不容易的，要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吃。后来，十一小学的师生们也吃到了黄羊肉，不过这是否和父亲有关我就知道了。

世界上的人们对于工作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工作是为了谋生，那么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有时还会变成痛苦。有人工作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那么工作对他们也只是一种责任，只是和理想或信仰之间的某种契约。还有些人把工作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手段，作为体验自我存在的方式，于是，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是需要，甚至是愉快，是享受。据我的观察，父亲就属于第三种，否则便无法解释他在工作中的那种如痴如狂的境界。

很多人怕他，尤其是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怕他那种不知该用什么计算的工作量和怎么衡量的工作效率。反正他出差、开

会、调查情况，比他年轻十几岁的秘书、警卫员都会被他的快节奏拖垮。但是他却始终精神百倍。他的声音总是洪亮的，眼睛总是闪闪有光的，他的思维和判断也总是清晰和迅速的。父亲曾有一位姓郭的秘书，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我曾经不相信别人对他的夸奖而稚气地和他做过一个试验。我和他一起站在一个比例尺非常大的地球仪前。我随意用一个指头遮住一个很小的地区的地名，他却能毫不迟疑而且百分之百正确地报出那些古怪拗口的地名。我不仅心服口服，而且马上视他为奇才。就是他告诉我，他最怕去向父亲做文件摘要的报告。因为父亲的敏锐和极好的记忆力往往使他应付不及，以至于每次去向父亲报告他都要出一身大汗。

我喜爱在繁忙的工作中神采奕奕的父亲。在这种时候，他特别的高大、英俊。看一看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海蓝色大将礼服的照片吧，谁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精力和热情完全来自他整个身心对生活的信任和热爱。

记得 1962 年底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中，作为总参谋长的父亲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状态。他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我们家在那一段时间里也好像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参谋部，许多房子里都挂满了地图。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已经不合适再和弟弟住一间房。母亲本来要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情况，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参谋部使用。我还记得挂在我那间房子里的是一张比例尺非常大的占满整个墙壁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的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几天，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每晚，我

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的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脚步声，窗户里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壁上描画出许多奇妙的影子而安然入梦。这情景已经成了我关于父亲的回忆中非常独特和亲切的一幕。

最近，我也许有分到一套居室的可能，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房间里，我的床旁挂一张亚洲地图。能使我重新回到蔚蓝的波斯湾中重温童年的旧梦。只是不知道市场上是否能够买到那么大的，印刷那么精美的，有着那么碧蓝的波斯湾海水的地图。

长期以来，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穿着打扮并不特别关心或多加干涉。一个原因是工作繁忙，另外的原因就是我有八个兄弟姐妹。在我们成年之前，我们家的物质生活并不太富裕。父母亲要操心的事情，反而是尽可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穿戴得干净、整齐，都吃得好，都健康。在这样一个朴素的家庭环境里，父母亲更多地是教会我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富有进取心和责任感的人。我们的学习成绩必须是第一流的，我们的操行评语也必须是优良以上，他们非常明确地要我们关心集体，关心别人，要我们看重对别人许下的诺言，要忠实于友情。1964年的寒假，父亲答应我们把全家都带回四川老家去看一看，去看看堪称天下秀的峨眉，天下幽的青城。事到临头，因姐姐要参加团支部的活动，我要参加学校里排球队的寒假集训没有去成。父亲极其赞赏我们的举动，说年轻人就得有这么点精神。不过，直到现在，我对于没能和父亲一起回四川，只在父亲去世以后才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而十分后悔。

深得信任的总参谋长

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在以下章节中记述的故事，也许能给这句话做一点不算太错的注脚。

彭德怀同志被罢官之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父亲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林彪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氛，被当时的许多人认为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风。1959年9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以一种十分庄严的口吻提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力量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地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9月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 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这些句子的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论点也是极其鲜明的。看

来，当全党还面对庐山上的那场斗争默默沉思的时候，林彪第一个做出了敏捷的反应。虽然现在证实，庐山会议和林彪并无直接关系，但林彪却是从这场斗争中获了一个重要真谛的人。1960年1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发挥成‘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的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又嫌不够，加上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还指示，要在《解放军报》的报头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对于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带着浑身奕奕的光彩，以一种原来鲜为人知的语言，在当时全党沉浸于其中的灰暗环境中独树一帜，成功而迅速地塑造了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高大形象。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是在红军创建时期由毛主席召开的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是由毛主席起草的。而林彪的聪明也就在这里，他能够想象得到，他把毛主席这样一篇早期的著作挖掘出来赋予新的意义，主席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林彪还颇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举动称为“复古”。意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不幸的是，正是父亲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不无赞赏地告诉了毛主席。父亲写到：“我把此点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喜悦，多么悲哀的喜悦啊。对父亲，对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这都永远是一个悲哀的时刻。

实际上，就是没有父亲的报告，毛主席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的举动。要知道，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确实多多少少地感到过一点孤独。伟人的孤独哪怕是一点点，它对判断力的影响，也要比普通人来得强烈。事实上，透过厚重的寂寞的云雾，毛主席始终注视着他所选定的这位国防部长的一举一动。

不久，毛主席就发出指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他还在一封信里欣慰地写道：“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

翻一翻那些年的有关档案吧，毛主席曾对谁有过这么具体和肯定的赞扬呢？

不管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捧到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光辉顶峰，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我国的国民经济毕竟是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就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意见。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由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企业的负

责人也到会。到会的还有部队的负责同志。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并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领导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也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要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父亲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父亲，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父亲当然没有什么意见，那时候他是真正相信林彪当然比他高明的。

果然，林彪的讲话在大会上又是独树一帜的。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是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

这个历史。”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主席。毛主席就要父亲、田家英和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主席很快就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主席还批示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主席要父亲送给林彪看过。当时林彪在上海，父亲就将定稿和毛主席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主席那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名言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讲的。林彪这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对于毛主席找回那种惯常的幽默感无疑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以后，毛主席将父亲叫去，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父亲：“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父亲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主席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还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主席对父亲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并要父亲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由主席圈定后请父亲好好读一下。

父亲回到北京就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三十本，其中还有一本是普列汉诺夫的，是主席定的。三十本书的目录送交主席后，毛主席又做了指示说，军队中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以选读几本。还要父亲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后来在 1965 年底的上海会议上，林彪把这三十本书的事说成是父亲故意以学马列主义冲击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候，回击的只有父亲一人，而毛主席庄严地沉默着。

所以，历史本身能提供给我们的复杂性，往往使我们的想象力苍白失色。

幸好虽然自 1957 年以来，上述类似的思想上的、方向上的争论一直紧锣密鼓，但偌大一个国家，偌大一个军队，总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在进入“文化大革命”这场全面的内乱以前，至少还有一个重大的目标能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父亲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做政治工作出身，但他却素来以善于行动而著称。让我们先来清点一下他当时所担任的职务：1959 年，罗瑞卿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以后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① 这些职务给了他，没有一个是为了叫来好听，每一个都是要他花费全部心血，竭尽全力去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去增强军队的现代化，去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去为建设强大的陆军、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创造出色的工作成绩。党和毛主席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是看中了他的能干，看中了他完成任务不讲价钱，看中了他几乎有些狂热的工作精神。父亲的举动当然也证明了，他正是党和毛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人。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军队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成绩。在这期间，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军队妄图窜犯东南沿海的计划。空军部队先后击落四架美制蒋军 U-2 飞机。这期间我军共击落

摘自邓小平写的悼词。

美制蒋军 24 架 5 种型号的飞机，给蒋军的侦察活动以沉重打击。广东沿海军民歼灭了 9 股窜犯大陆的美蒋武装特务。我军还取得了中印反击战的伟大胜利，开展了群众性的比武活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海军先后击沉美制蒋军军舰剑门号、章江号和永昌号。这些成绩的取得自然首先是毛主席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功绩。但不能无视这一系列的举动，都带有父亲独特的、精心组织、力求完美、战则必胜和总是不安分的风格。都有着他们——作为三军总参谋长所应付出的巨大心血。还值得一提的是，从那时候起，林彪开始常常称病不出了。这里面的原因也许能在以后发生的事件里找到一些答案。但凭心而论，那个时候，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林彪对父亲都是信任而倚重的。我常想，这也许是父亲的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因为从天性上说，父亲是一个看重信任，并懂得什么叫忠诚的人。父亲性格上的这一特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秘密。

我不准备在此多费笔墨了。关于父亲任总长期间是否尽职尽责，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什么样评价，我想，在有关的档案里会有详尽的记载，也将会更有比我更耐心的作者去详细挖掘，绝不会因我这支笨拙而又有些焦躁的笔，未能一一详录而被历史泯灭。面对这些工作成绩和异乎寻常的努力，也用不着若有所思地去寻根问由。我已经在过去的许多章节里把他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惜任何代价地像许多自然科学家探寻世界的本质那样，狂热地寻找人类社会中的正义、公正和合理性。他把这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他曾是一个被旧家庭放逐的、孤独的逃亡者，我说他从小就读了太多的侠客书，看了太多的忠臣戏。我曾把他比做扑灯的飞蛾。我

说他是一个天性看重友情、信任的人。这些就够了，完全不需要再有新的解释。还是让我来描述那些多少有点特殊性的事件吧。

1962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将父亲和××叫去，问他们：“你们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 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父亲他们一时被问住了 就说：“我们一直在忙着搞东南沿海的备战 没有注意这个事。”主席说：“这样的事你们都不注意 回去看看 7、9、11 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主席还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也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呀，回去查查军队人们的意见怎样。”

父亲回家就找出那三天的报纸和《参考消息》。他当然懂得主席是在又一次向他吹风，他也马上意识到，党内又存在了严重的不同意见。

果然，8月6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了三个重大的问题：一、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存在阶级 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长期的 不是几十年 而是几百年。”

刘少奇同志在毛主席发言的时候曾有一段插话，那插话很长，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要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争论并没有结束，如果可以把这叫做争论的话。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更加完整和雄辩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 就会变质 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 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还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不管我们现在对这段话已经有了多么正确和精辟的批评，但在当时，它却以毛泽东主席特有的，总是高人一筹的和历史的亲近感，以完全属于个人气质的使命形象，以他斩钉截铁，不容怀疑的口吻，以他高屋建瓴、直迫人心的政治家的气魄征服了绝大多数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确实只听到毛泽东巨人一般的声音。今天，当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至少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条件下，确实很难产生足以和这位巨人抗衡的人物。当他的声音轰响在我们的头顶的时候，全党都在屏息静气地倾听。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的另外一个原因吗？

9月里的一天晚上，母亲和我们兄妹数人一起从收音机中收听到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我们听到父亲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虽然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父亲以后和我们共享的时光会更少了，但我们都为父亲高兴。一个人能够愉快地为自己所爱的一切去竭尽心力的工作，该是多么幸福啊！

这就是当时父亲的，也是我们的幸福观。

大比武

时光很快就流转到了 1964 年。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周围的许多事开始变得别扭起来。

那年 1 月里，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它在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上有一些创见，其中既有政治工作，也有群众路线，它提出要带着阶级仇恨练兵，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要练得思想红、作风硬，并且实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服从谁等等。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还在 1 月 3 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父亲请韩先楚同志将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拿来看了，也觉得不错。父亲向林彪报告后，于 1 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并通知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由于这种教学方法生动活泼，收效显著，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接受，全军的群

众性练兵活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父亲的本意是十分明显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自然是他这个总参谋长的主要任务。在我们的军事装备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改观的现实面前，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决定的作用。何况，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突出政治上已经做了不少文章。父亲总认为，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政治也从来不是空头的。党和毛主席当时对军队的期望很高，军队当然应该拿出点像样的训练成绩来向党汇报。这不仅是部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搞好了也是给突出政治从另一角度做个补充，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父亲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比武”。

从1月到10月，父亲不辞劳苦，不畏寒暑，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他嘱咐各地的同志，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某些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要爱护战士，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把大家搞得太疲劳。大比武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各地、各部队涌现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这些同志对军事技术和自己本专业的技术精益求精，在短时间内有了非常快的提高，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以成为本行业务技术水平尖子为荣的风气空前浓厚。

面对这些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以密切的关注。父亲多次陪同周总理、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这一年的6月15日、16日，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也都成了看军事表演的迷。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尤其是6月15日、16日，天气好极了，表演项目上下午都安排得满满的。可是毛主席毫无倦意。那么多的领导同志欢聚一堂，真像是过节一样。大家的兴致都非常高，表演项目的成绩又都非常好，掌声一阵又一阵，笑声也是一阵又一阵。那些白发苍苍的叔叔、伯伯，一个个都高兴得像孩子一样。父亲、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可以说是场上最活跃的三个人。父亲的情绪非常高，他回答着领导同志们的提问，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着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当一位神枪手射击完毕后，他还把那支步枪拿来给毛主席看。一位摄影师摄下了这珍贵的镜头，上面有四个人，毛主席、父亲和两位杨司令。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主席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16号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看完水面军事表演后，还兴致勃勃地在水库里游泳。6月中旬的水还有点凉。但主席都下去了，许多人也跟着下水。父亲、母亲双双随主席游到湖心的小岛上。毛主席笑哈哈地问：“你们两个谁游得好些？”父亲也笑答：

“她游得好 我比不上她。”毛主席也许并不知道 父亲从小不谙水性。只是在做了公安部长以后，知道毛主席酷爱游泳，为了方便保卫工作才半路出家学了游泳的。

在十三陵水库，毛主席还召开了会议，也是兴之所至，他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把手都要抓军事。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提出了著名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屡经劫难之后的 1975 年，父亲刚刚恢复自由不久，他带着满身心累累的伤疤，带着一条残腿，领着我们全家人又一次来到十三陵。一开始，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乘兴而来的郊游。但当我们遥望着水库辽阔的水面上美丽的落日的时候，父亲忽然指着大坝旁边一幢两层的小楼，自语一般地轻声说：“1964 年就是在那里 毛主席开了会 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着父亲凝重的面孔，体验着他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对故人故事怀恋着的情绪，我确实曾经感到过沉沉的迷惘。在那么多可怕的经历之后，父亲还能以如此恬静的心情回想起过去的一切。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非凡的力量，造就了像父亲这样的一代忠心耿耿的非凡的人呢。

一直到今天，十三陵水库仍然是母亲珍爱的散步场所，她曾比别人十倍百倍地痛惜这水库的干涸。因为，这里包容着她太多的回忆，尽管这些回忆在她心中引起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1964 年 1 月到 10 月 父亲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这一系列的、被很多人称为“我军的盛举，我军发展史上光辉篇章”的活动中 林彪却一直没有露面。

父亲原来是不应该忽略这件事的。但确实是有一些另外的

因素影响了他的判断。众所周知，林彪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病症。比如说 怕见风 爱出汗 只要一看见水就拉稀。就为这 他在北戴河的别墅盖了好几处，一定要在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海浪 但又有着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他经常在养病 在外地疗养，他总是以一个疲倦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大约在 1965 年带我去林彪家里时的情景。

我跟着母亲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了很久，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高大、空旷、无人的房间 这些房间里都铺着厚厚的地毯，房门上都钉着绿色的厚呢条儿，以便开关的时候没有声响。所有的窗帘都低垂着。这些幽暗的房间彼此都那么相像，寂静得仿佛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最后，在一间几乎完全黑暗的房子里，我猜这一定是这大院子里最深处的最后一间房子了。我和母亲看到了林彪。这间房子里除了一套长沙发，竟然再没有一件家具。那长沙发又大又软，林彪以一种非常虚弱和无力的姿势深陷在那里。我猜在我们进来之前，林彪一定是像尊泥胎木偶一般呆坐在那里，因为在他身边既无书报，也无收音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甚至在我们进来之前，这房间里大概是连光线也没有的。我们说了很少的几句话。林彪一点精神也没有。告别的时候，他缓缓地伸出了一只手。我心里有点害怕，当接触到这只手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更加害怕 因为这手又湿又冷 在我的记忆里 没有别的什么人手是这个样子的。

当我跟着母亲又穿过一间连一间的空旷的大屋子，沿着那条长长的走廊走回到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母亲告诉我说 豆豆和老虎的爸爸身体很不好。经常出汗、发低烧，

完全不能在户外活动。他还经常失眠，没办法，就只好坐在开动的汽车里睡觉，车子一停就会醒。这些话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会得这么怪的病。在院子里我看到了林彪的司机，那司机有一副很显老的面孔，他还有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记得我当时很可怜这个司机。我觉得每当夜深人静，人家都在睡觉，他却要开着汽车满城转，车子还要开得稳，根本不能停，简直是太难为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林彪的“转车”不一定是晚上。什么时候想，就什么时候去“转”。

所以，这样一个病人，没有参加类似参观军事表演这样剧烈的劳累的户外活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人，自然也没有引起父亲的注意。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彪开始对父亲不满意，这不满与日俱增。当初，确实是林彪提议父亲到军队里来的。他是看中了父亲的能干。有父亲在，在实际工作方面，他便基本上不用操心了。但是，事隔不久，他就发现一些他原来没有预想到的情况。

首先，他没有想到父亲和主席以及周总理的关系是那么密切。这种关系是许多微妙因素的总和，并且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这些东西并不神秘，本身也并非与众不同。尽管林彪已经为主席在关键时刻说了那么多的好话，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林彪对自己缺乏自信。另外，他长期称病不出，不管是真是假，也不管他原来的目的如何，但是现在，却搞成了这样一个现实。因为他病，毛主席告诉过父亲，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军队的事。因为他病，父亲有时只好直接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工作。只好多请示军委的其他首长。这一切，

恰恰都是他最不能够容忍的。

林彪曾经对父亲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父亲当时没有搭话。因为他知道林彪虽然用了“我们”这样一个代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和父亲本人毫无关系。它的针对性是太明确了。父亲不仅对林彪这种酸溜溜的想法没有同感，他的组织观念也告诉他，这绝不是他应该议论的问题。但这却使林彪大为不满。

还有一次，林彪休养，从外地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父亲去见他。父亲正在开会，还有其他军委首长在场。父亲在电话上说：“散了会马上去。”据说那一次林彪大发脾气，当时就摔了电话机的话筒。后来，他又在他那些当做备忘录的卡片上愤怒地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这是一些多么危险的信号啊。

林彪对父亲的不满还有一条，那就是父亲对工作极度的热心——他太能干，也太肯干了。搞了个大比武，惊动了毛主席，惊动了中央。观看军事表演，不仅毛主席去了，在京的中央首长去了，还带去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前呼后拥，万头攒动，何等的热闹，何等的风光哟，而这一切，竟然没有他林彪的份，林彪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呀！

1964年12月，林彪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做指示的时候，咄咄逼人地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一边暗示全军大比武冲击了政治，一边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

会吃大亏。”林彪还说：“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个所谓的突出政治的指示做完以后，特意叫父亲拿去修改。

这是一次明显的试探。试探父亲对他林彪到底“听话”到什么程度。

父亲对林彪这些话中的意见，也就是矛头所指不会不明白。他甚至也多少感到了林彪要他屈服的暗示。但是，他却实在不能同意林彪的意见。如果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对林彪的许多看法和提法是同意甚至是信服的，那首先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看法和提法都是对的，是对部队建设有益的，包括所谓的“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但是现在，林彪却把突出政治和抓军事、练技术对立起来，说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把抓军事训练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甚至还要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父亲认为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应该为整个军队的前途担忧。

关于父亲的这种个性，我还可以补充一个小小的插曲。早在延安，大约是在毛主席叫父亲在他隔壁的窑洞里撰写那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时候。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里，毛主席曾经非常善意地送给父亲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这个典型的东方哲理中，含着对父亲一种轻微的责备，也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引导。毛主席的观察力是非常厉害的，这真的是父亲非常突出的个性。尽管父亲对这两句话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但是他的“至清”“至察”特征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我猜想，父亲面对这个深奥的评语实际上一直是迷惘的，因为他根本不懂得怎样才能做到“不至清，不至察”。不清、不察和至清、至察的界

限在哪里。所以，父亲虽然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他确实很少做违心的事，很不懂得避开锋芒去选择一种既不是不对，也不是对的权宜之计。他认为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就竭尽全力地去做。当他认为不对头的时候，他就要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于是，在修改这份林彪的原稿时，父亲提出了一些增改意见。在 1965 年初军委办公会上讨论和传达林彪这个指示的时候，父亲又做了一个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发言。他不同意给群众性练兵运动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坚持认为 1964 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主要的，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气可鼓，不可泄。他还说，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

这些意见都是在会上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经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交林彪审查，林彪同意后，以军委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团以上干部的。

但是林彪却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罗瑞卿绝不是一个随声附和的人，他有一种非常讨厌和顽固的坚持原则的坏毛病。如果说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摔话筒啦，意味深长的试探啦，酸溜溜地认为父亲出风头啦，还多少有点闹脾气使性子的味道，那么从现在起，林彪不得不重新来估价罗瑞卿，重新严肃考虑他和自己的关系了。

无论在高层的领导干部们的会议上争论是怎样进行的。但是 1964 年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确实是急速降温了。大比武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毫无道理地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经历了极其残酷和悲惨的时刻。郭兴福同志

在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中完全绝望了，当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后来，他侥幸未死，却永远失去了儿子。“文化大革命”结束很久了，我又几次见到了他。我简直难以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会是当年那么生龙活虎、英气勃勃的人。他的动作是迟缓的，眼睛里没有光彩。他的思维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碎的人的冷漠和偏执。特别不幸的是他并没有丝毫地失去理智和记忆。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他甚至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去年，我听到了郭兴福同志在一次偶然的车祸里丧生的消息。悲痛之余，我又感到某种轻松，为他的终于彻底地解脱而安慰。因为人活在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受苦。

织 网

应该说，从那以后，林彪并没有放弃争取和试探父亲的工作。因为父亲对他说来毕竟是很重要的。父亲在军政两界担任的职务以及他和主席、周总理的亲密关系对于林彪来说也是举足轻重的。

在林彪这一系列颇有心计的活动中，还有一个人物需要提到。那就是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刘亚楼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曾经留过苏。在空军司令员的任期内有过非常出色的工作成绩。我曾经说过，父亲喜欢那些能干的善于创造出色成绩的干部。所以，刘亚楼曾经有和父亲很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

1965年，刘亚楼因患肝癌在上海住院治疗。2月份刘的病已经很沉重。医生们对此已经束手无策。当时林彪和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忽然非常频繁地出入于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对于这样一个负着巨大的病痛，正在艰难地走完生命最后路程的病人，叶群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陪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的大门，刘亚楼的妻子还未在病人身边坐定，叶群的汽车又调头回来，刘亚楼的妻子只好又再次离开病

房。在这些时间里，叶群到底和刘亚楼谈了些什么，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只知道那一段时间，刘亚楼非常烦躁，情绪很坏，病势也随之更加沉重。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例，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当然仍是十分秘密的。

在 1965 年 12 月份的上海会议上，叶群讲，刘亚楼在临死之前痛哭流涕地向她说，他对不起林总，上了罗瑞卿的当。还说父亲曾要他向叶群转告四点意见，逼林彪下台。这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

叶群讲，她当时就把刘亚楼顶了回去，没想到刘亚楼又亲自找林彪谈。不过，这些事让我留到后来再交代。

1965 年 2 月底，父亲专程到上海找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却说让父亲先去找刘亚楼谈。其时自然是叶群和林彪已经找过刘亚楼以后了。父亲虽然对林彪的安排感到很奇怪，但他还是先去看刘亚楼。父亲安慰刘亚楼要好好养病，要心胸开阔。刘亚楼对父亲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叫父亲不要误会。这些话对于父亲来说实在是如坠五里雾中，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林彪对他的又一次争取。后来，当他回想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当时只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最后，刘亚楼还对父亲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父亲对这话也并未在意，一个垂危的病人是常常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的。父亲仍然嘱咐他好好养病，不要

考虑太多的问题。

这场莫名其妙的谈话结束后，林彪才见了父亲。林彪问父亲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父亲只是照实地回答了一般性的话。这也许使林彪很失望。但是时机还未成熟，林彪总不能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他看父亲的情绪有点沉闷，就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去年（指 1964 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此结束。但是林彪的这些话，并未使父亲感到宽慰。他仍然感到心乱如麻。因为他无法估价他和林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后来曾经对我说过。1965 年那一年，他的心情很不好。林彪经常对他说一些莫名其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什么“你们都可以放心呀，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连累”等等。对于这些话，父亲在大多数的场合里，只要能够维持礼貌就保持沉默，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有一次，林彪说得太多了，终于使父亲感到林彪的探询的意味。他就对林彪说：“林总，我想，我们这些人跟主席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这句话在当时，实际上只有父亲一个人相信，一个人这样想。但就是这样的话也令林彪不能容忍。他要的是父亲对他个人的绝对服从，而绝不能掺杂另外任何别的因素。

每次进行完一场这样的谈话，父亲就觉得很忧郁，他不懂林彪为什么一下子会变得这么多疑。但是他又常常安慰自己，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林彪在长期养病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坏脾气。

1965 年 4 月上旬，父亲要回北京去参加作战会议。当时毛

主席在武昌。父亲从广州打电话给毛主席请示，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不久毛主席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到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父亲就回了北京。4月28日，父亲陪同贺龙同志一起去到武昌，向主席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以及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都批准了。

5月2号，父亲到上海去找林彪汇报。也许林彪已经对父亲和贺老总先去了武昌的举动不满。一见了面就没头没脑地对父亲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父亲和他之间的通气规定了五条。这五条的意思是：如林在北京要×日一次汇报工作，如在外地也要×月一次。父亲在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在向父亲说明通气的必要性时还拿出了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起来。这种情况当时也使父亲感到了问题的一定严重性。但他仍然不能懂得林彪的火气到底从何而来。父亲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说：“你能做到，就好。”

当时刘亚楼的病已经很重，父亲去看他，告诉他：“毛主席叫你好好休养。”他说：“我不要紧，毛主席的健康最重要。只要主席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就好。”当时母亲也在场，她听到刘亚楼的话曾经起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刘亚楼为什么没有提起林彪，这要照当时的常理来说，刘亚楼是不会疏忽的。但是因为她的心理当时很悲痛，就没有再想下去。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就去世了。对于他的死，父亲曾经很难过。因为刘确实曾是一个得力的干部，

是父亲的一个朋友。

5月25日，父亲深夜才回到家。连续的会议使他已经很疲倦。一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这是林彪口授的一个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三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原来当作战会议结束的时候，父亲做了一个总结。本来，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会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本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要父亲做总结发言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报告了林彪，他并未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当六十三期会议简报送到林彪手里的时候，他却突然发难，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还没等父亲把自己的思绪理清。电话机又响起来，这回是叶群打来的。她在电话上说：“今天我只离开了一小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101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父亲到后，叶群把父亲引进一个卫生间。使父亲更为吃惊的是，他看见叶群的女儿，林豆豆竟然也在场。叶群令人作呕地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也叫来。”随后她又说：“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101憋了一肚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作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父亲始终一言不发 回到家里 他气愤地对母亲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 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现在看起来，关于作战会议这一期简报的事情，是林彪本来想突然发难 大闹一场 先给父亲点厉害尝尝。但是刚刚开了头，他们就发现就这一件小事闹起有点太不成样子。理由不充分，站不住脚。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他们不得不想一个收场的办法。

第二天，林彪亲自约父亲去谈，叶群也给母亲打了电话来，请她同去。叶群说：“他们两个男的干巴巴地 谈不好又谈崩了。你来 你来 你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呀。”

关于那一天的情况，母亲至今记忆犹新。叶群把母亲让到一间屋子里 对她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只是不在了一小会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话记录已经收回，我还交代了她们要消毒。”她和母亲坐得很近，口气也十分急切和诚恳。她说：“希望你和总长忘掉昨天的事情，永远忘掉，就像它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她还说：“101 的脾气坏得很，他只同自己最亲密的人发脾气。总长就是他最亲密的人。”叶群还找出《红楼梦》中的两句话，说林彪和父亲的关系就像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一样，“因为太好了 所以就常常发生‘不预之隙’。所以就是又要吵 又要好。”

母亲觉得叶群的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就尽量想转换话题。不想叶群的兴致更加高涨起来。她说：“101 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重友情的。你知道罗荣桓当年的政治局委员是怎么当上的吗？罗在东北干了些什么？天天担架上抬着。可 101 还把功劳分给他一半，开大会的时候，101 从台前跑到台后，满头大汗，就是去

说服一些人，要不然，罗荣桓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当不上。”

父亲和母亲一向尊重罗荣桓同志，认为他实在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忠厚长者。母亲更觉得不应该这样议论一位已经过世的同志。叶群见母亲不喜欢这个话题就说：“你们为什么不送点东西给我们呢？”母亲很吃惊地说：“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东西呀……”叶群说：“就是送张照片也好嘛，你们的那些孩子多好，活泼，不像我们的豆豆和老虎不开展，不活泼。”母亲答：“好吧，我回去检几张合适的照片送来。”

谈话总是不太融洽和热烈。叶群提议到院子里去走走。刚走到院子里，叶群就大叫：“秘书，拿剪刀来。”

5月份是春天，院子里的牡丹和芍药都开得正好。叶群手持剪刀，把那些花一朵朵剪下来。母亲是个很爱花的人，不知叶群为什么要把这些花剪下来。只是很为这些花儿惋惜。幸好这时父亲和林彪谈完正在告辞出来。母亲也赶紧告辞和父亲一起登上汽车。两人都已在车上坐定，叶群追出来把那一抱花从车门里递过来。母亲说：“这么好的花，你们留着看吧……”叶群说：“大家看，大家看。”母亲无可奈何地把花接在手里。

在车上，母亲问父亲：“今天谈了些什么？”父亲说：“和昨晚的意思差不多。让我永远忘掉这件事。”话虽这么说，可母亲仍然感觉到父亲很忧郁，也很沉重。她把刚才叶群的谈话告诉给父亲：尤其是关于罗荣桓同志的那一段话。母亲说，叶群这样子实在太不对，太庸俗了。父亲沉吟了一会，对母亲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说，千万不要出去说。这个话是会影响团结的。”

那天回到家里，我们看母亲拿回来那样一束大得不寻常的花朵，都高兴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母亲是爱花的。但是母亲后

来告诉我，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头一次，美丽的鲜花在她的眼睛里失去了色彩。

后来，母亲还是找了几张弟弟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101 喜欢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到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

是事先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林彪这种种的恶劣作法，父亲为什么能够忍耐。而且就当时父亲与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系而论，为什么不能告他一状。这也许是我很难向读者讲清楚的一个问题。不过，父亲自己却有一句话，也许能启发我们的思考。父亲曾经说过：“一直到我坐到林彪的班房里，我还在想，这是林彪对我的误会。”

这种超出常规的思维方法和非常奇怪的现象，也许是我们党内特有的现象，是生活在那些非凡的年代里老一辈共产党员们才可能具有的素质。如果在前几年，我也许会把这一系列举动解释为某种对党的忠贞 对事业的坚定。但是现在 当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十年的今天，当我们对这个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的成因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之后，我却宁肯从另一方面去解释这一现象。尽管这对我本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是的，正是因为父亲亲身感到毛主席是信任林彪的。所以无论林彪做了什么，他只是在真诚地思考，自己是否仍有不妥之处。很多人都提起过父亲当年是为人们熟知的和林彪斗争的战士。但实际上，这种斗争一直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而且也从来不是针对林彪的人格。父亲只是出于一种起码的辩证法的常识，对林彪提出的过于荒谬的理论做一种认真的修正。只是出于禀性和直觉不肯在林彪的淫威下屈服。

所以 当林彪大吹大擂所谓“最高最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

主义顶峰’的时候 父亲就说‘什么‘最高最活’ 难道还有次高次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难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父亲就说，我同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突出政治就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大庆不出油，大寨不出粮食，叫什么突出政治？这样的突出政治就没有说服力。等等。

1965 年 11 月 天空已布满阴云“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10 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25 日 父亲到了上海。当时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上海市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父亲：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 看他转载不转载。毛主席还交待了 什么人都不讲。那位同志对父亲说，他什么人没有告诉，但他考虑父亲可以例外。父亲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 日下午 父亲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在外宾未到时 父亲向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 我要了一本 还未看。”毛主席只笑了一笑，未说什么。

晚上父亲看到江青，江青也对父亲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不知为什么。”并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 父亲即给彭真同志打电话 他在电话上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 请你也考虑 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

载。”这时周总理也给彭真同志打了招呼，所以，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说明父亲对于即将来到的“文化大革命”和他本人面临的可怕灾难完全没有预感。他只是以他习用的方式，一心一意维护着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维护着他一向珍视的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团结。

尽管很多人把‘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做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但实际上姚文元的文章的发表才是这场灾难真正的开端。无论后人将怎样评价父亲当年的这种举动，但我决心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代表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包括高级领导人的真实心态。否则“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愈演愈烈，而终于成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历史的真实便无法解释了。

父亲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对毛主席说，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主席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的召开仅仅十天。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爱戴和追随了一辈子的伟人毛泽东。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么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

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 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

收 网

用阴谋织成的大网张开了。织网的人知道毫无准备的鱼儿一定会游入网中。他要按照一种邪恶的意愿收紧这张网。

上海会议于 1965 年的 12 月 8 日至 15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开始的时候父亲还在昆明。关于当时的情况，让我来引用母亲的一段回忆。

1965 年 12 月 9 日 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 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 日 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 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 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 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 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

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还有一种更为奇特的说法。1979年11月17日上午，我们去访问谭震林同志，问到上海会议的情况时，谭震林同志这样对我们说：“上海会议期间把罗瑞卿同志整下去，大家都莫名其妙。林彪派叶群到杭州去，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究竟告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当天晚上，毛主席就叫汪东兴派一个专车送叶群到上海，因为林彪在上海，然后就在上海开会。那个会我参加了。可会上没有讲罗瑞卿的事情啊。我们是莫名其妙啊。关于罗的问

题一直没有讨论，但是常委讨论了没有就不清楚了……”

从这些回忆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林彪三人之外，知道真正内容的人很少。二、上海会议关于父亲的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是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的，就是当时被召到上海开会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情。甚至也许还有第一会场、第二会场……在这些会场上讨论的问题也许完全不一样。三、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范围也很怪。既不是政治局的会，也不是书记处的会，更不是军委的会。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不知道底细。一些特殊人物，如无任何职务的叶群和原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却异常活跃。

我和瑞卿是 12 月 11 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订在 10 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 10 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 点钟飞就 10 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 11 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

坐车子进城的时候 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 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 他都要亲自去做 而且次次如此 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至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林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 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 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多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在，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 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 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 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 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

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要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 等啊。天黑了 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

讲 听他们的指示 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 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 不让见 别的还见什么人呢 所以 哪儿也没去 就在那个院子里。从 11 号到上海，一直到 17 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 听瑞卿讲一讲 他说多少 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 受着天大的委屈 无法辩白 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 20 米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的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

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的“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师。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上海会议上,别的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薛明同志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我对她说我想不通，怎样也想不通。那时我带着大本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段关于要做老实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我把这一段翻给卓琳看，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1965年的冬天，干燥、寒冷。西伯利亚的寒流长时间地盘踞在北京的上空。每天，我都要骑着自行车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

个城市去上学。北海大桥上的西北风天天在那里等着我。它拥着我的双肩，推着我的前胸，刺痛我的额头和双颊。它在中南海和北海灰濛濛的冰面上卷起一阵又一阵的尘土和碎纸屑，把它们轻易地旋转着带上天空。对这些，我只觉得新鲜、有趣。我那时实在是一个很勇武的，不知天下有忧愁二字的女孩子。我喜欢和寒冷搏斗了一番之后，浑身热呼呼地走进校园、走进教室。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让一身热气逼得周围的寒冷都守在三步之外的奇妙感觉。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室，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爸和妈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刀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爸妈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脸上十分焦急的样子。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一回北京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我们，对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显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新六所是一个沉闷的地方，高大又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

叶子，仍然密密匝匝地填满了天空，让人喘气都觉得不痛快。天气虽然寒冷，但是二楼的暖气却烧得令人吃惊的热。在房子里只能穿一件衬衣，到院子里散步却要加上毛衣、棉衣，还要穿上大衣。回到房间里又要依次脱掉，实在令人心烦。

使我最奇怪的是父亲不出门了。这是我的经验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长时间地呆在房间里，关着门。或者一个人长时间地在院子里散步。妈妈看我们疑疑惑惑的样子就跟我们说：“爸爸身体不好，你们多陪陪他。”真的，爸爸是显得没精神，好像老是很疲倦。不过，他的这变化，在我的眼里是亲切的。他变得比较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变得比以前宽和和细致。我们玩、闹，我们做功课，或者聚在一起大声地、自以为是地争论什么，总能感觉到他在一旁默默注视我们的目光。

我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父亲并不特别宠爱我。大约是 14 岁的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我开始接近他，原来那种隔着一层轻纱的感觉消失了。虽然这种接近不是我早已向往的那么轻松和愉快，但我还是感到欢喜。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到父亲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带些探询的神气，注意到父亲说话时那些灵活、恰到好处的手势。注意到他高大的身材、好听的声音，注意到他眉宇之间那些深奥的思考。

我听从妈妈的吩咐尽量多地去陪父亲散步。我自己也那么喜欢挽着他的手臂，走过院子里坚硬的水泥地。我老是兴致盎然地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父亲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脚步声，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甚至可以因为这简单的把戏乐得出了声。

也许是感觉到父亲有些忧郁吧，我就絮絮叨叨地讲一些学校里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给爸爸听。父亲如果回答我一两句，我就更加情绪高涨。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忽然感觉到谈话并不那么热烈。我就会感到茫然。就会注意到二楼楼前面的两棵大树。是松树还是柏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它们在北京浓密的工业灰尘里保存着的那一点灰绿色，在清白的月光下，总在我心里引起那么一点忧伤和那么一点神秘。

有一次散步归来，父亲在脱大衣的时候对妈妈说：“你说这孩子不爱讲话，点点今天和我讲了不少话呢。”

我多少感觉到了，这里面不是赞扬，而是悲悯。不知从何而来的悲悯。

父亲曾这样描述他上海会议以后的痛苦心情。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

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待说，不要去，以免碰到熟人。以后，我除了到 301 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我不知道父亲是带着这么沉重的痛苦。否则，我也许就不会用那些愚蠢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就不会用那些饶舌来烦扰他。我会……噢过去的事情了，再提也无益。人生中的遗憾，绝大多数是无法补救的。何况，以后，我还想了做了比这更愚蠢的事。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好像是漫不经心地给我讲了一些他的身世。讲他在找到党之前的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带有一种遥远的、传奇一般的色彩。我把它和我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革命者不平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我甚至觉得这些我并未听到过的事情是熟悉的。它们像一阵风，似曾相识，轻轻地掠过我的脑海，却并没有在其中掀起真正的波浪。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在回忆中严肃地检查着自己。虽然上海会议给父亲制造的罪名无理到荒诞的地步。不过，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了，他和党一同走过的道路实在是太长了。党和中央的会议在他眼里自然是神圣无比的。毛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啊！而且，他怎么能够对总理和小平同志亲口告诉他的事情有丝毫的怀疑呢？尽管满心里都是抵抗，满心里都是想不通，但是他的理智，他的世界观却强迫他做出另外一种结论。

在这些沉重的自省过程中，有时候，阳光也会透射出乌云。因为自省的结果，往往使父亲增加的是自信而不是自责。

有一天，吃中午饭。临近尾声。父亲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

那声音是轻松的，里面还带着笑。这句话也引起了我们一阵小小的欢乐。

他不能不觉得，上海会议是主席和林彪对他的误会。也许有一天，他能够解释清楚。实在不行，退休，带着我们回四川老家，就是他所估计到的最严重的后果了。

除了父亲 妈妈最苦。她是母亲 又是妻子 处境和心情都可想而知。事情已经过去快 20 年，但她回忆往事的口吻却总是无法平静的。

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 1 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和老师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送上去 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了，他也想安

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

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的会议突然来了。3月3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月4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大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觉得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

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情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三十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多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事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 这种搞法 造谣 诬蔑 人身攻击。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可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着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 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 他也不说 就是走不了路 不吃饭 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 他就在那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父亲的痛苦实在是太深重了。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给他罗织的种种罪名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并且是他本人平生最深恶痛绝的。他如果不是对党，对毛泽东本人爱得那么深、那么切的话，他就不会那么痛苦。如果他不是一个“至清、至察”的人 他就应该从某些蛛丝马迹中窥到在那些冠冕堂皇的罪名之后隐藏着的见不得人的内容。在上海会议期间“背靠背”的那些日子里，曾有一位原很相熟的同志去住地和父亲“谈”。父亲非常急切地询问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那位同志也是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 你太突出了呀！”如果父亲那时能够联想起“木秀于林 风必

悲剧的开端

有一种传闻，说当年是一群红卫兵把父亲从楼顶上推下去。最近出版的由方矩成、姜桂依夫妇合写的英文版《周恩来传略》对这种传闻也有记载。但实际上，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父亲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和许多读者一起读到了苏叔阳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而写的剧本《太平湖》。当我试着以同样的方法去设想当年父亲在做出同样的举动的心情时，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不知道这是父亲和老舍先生之间的区别，还是事实和作者想象（也可以叫作创作意图吧）之间的区别。

过去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现在，我们当然不再使用这种概念了。但是，它是不是就是“以死抗争”、“以死来唤醒”是不是让“人们看见我的尸首 必会仔细地想想……这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闷在人们的肚里，总有一天会吐出来 会响起一个闷雷 那时候 就会要你的好看”。还有：“像我这么个人 不能白死。我得死个轰轰烈烈 得死出个响动来。”（《太平湖》中的老舍先生语 做为后来者 当然不妨这样去看待

老舍先生和其他在那个黑暗年代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社会精英的死。但是假老舍先生之口说出这些话来，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妥。甚至还会从意想不到的角度上去冲淡这种死亡的真正残酷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比苏叔阳有更多的发言权，所以我还是来谈父亲 我只能说 在我的心目中 父亲不是这样的。

3月18日，对我和所有的家人来说永远是鲜血淋漓、残酷恐怖的一天。

那一天，不知底细的我们一早都去学校了，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吃过早饭，突然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父亲，会不开了。对于这个蛮不讲理 仅仅旨在折磨人的会 父亲怕开 可又更怕不开。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父亲的诬蔑又要升级。

父亲自戮的决心绝不是早已下定，而只是在这一时刻突然产生的。如果说父亲一直期望着向党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事实真相无法替他辩清，而是因为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更为主要的是，这些严酷的现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们能够导致的结论对父亲来说实在是可怕到无法接受。

这真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虽然父亲的感情仍然眷恋着那些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智却指着活生生的现状告诉他 那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灵魂的支柱 他的精神的殿堂 他赖以立脚的基础突然之间都哗啦啦地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他一生中最珍爱的一

切忽然变得面目狰狞。生命就是这样在一霎间失去了意义。决心就在这一刻下定。一幕沉重的悲剧就在这一刻启幕。

父亲说：“我感到眼前一片黑暗 毫无希望 已陷进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之中。觉得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母亲说：“平时我们一起吃早饭 吃过饭他就去开会。这天忽然通知说不能开会了，他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我走进去跟他说 怎么搞的 看东西也看不下去 睡也睡不着 坐也坐不住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他说，他也是那个样子。我想让他松一松心 就对他说 现在有一本小说 我看还不错……。其实 我反而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瑞卿就对我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我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母亲走后，父亲就伏在桌子写下了他的绝命书。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

父亲写好这个字条，就把它放在抽屉里。他踏着经常那样的步子来到隔壁的房间。他推开门，看到母亲仍然拿着那本小说。此时父亲该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母亲说吧，但是他却只说了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可怜的，毫不知情的母亲甚至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也没想到

多看他一眼。

整幢房子静悄悄的。父亲走向自己的卧室，轻轻地掩上门，他脱下日常穿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洁净的睡衣。（我曾思想了很久，而无法猜度父亲这个举动的含意）随后发生的一切就更是悄无声息的了。父亲轻手轻脚地踏上了通往顶楼的楼梯。

顶楼是没有人居住的。解放初期，这幢房子是一个逃往海外的官僚资本家留下的。三楼是一个储藏室。那里放着这幢房子里最古老的一些东西。几个阴沉沉的大到不可思议的木箱，还有一些不知能够派什么用场的木架子包着铜皮的乌黑的柜子。这些东西一律又大又沉。这间顶楼长年不见阳光，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个神秘的、阴沉沉的地方。

只有一扇窗子通往楼顶的平台。我猜父亲一定是很费力地跨过了这扇狭小的窗户。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这样一幅情景。父亲高大的身躯正艰难而又固执地通过这扇小窗。噢，父亲，你的决心一旦下定何以竟这样顽强？！难道人世间就再没有你可留恋的事情？！多少人在天伦之乐中颐养天年，多少人在浑浑噩噩中尽尝自然硕果，疲倦的政治家还可闲云野鹤，东篱种菊，被放逐的将军也还可挂甲拴马，终老田园，而你竟这般毅然绝然！是什么样的绝望吞没了你的理智，是多么狂暴的风雨熄灭了你的生命之火。是什么样无法克服的矛盾使你给妻子儿女留下了那么专一而又那么凄然的企望，而你本人却不肯在这世上再多活一分钟。噢，父亲！二十一年前的这一幕，至今使我想起来就热泪盈盈。二十一年前重压在你心头的惨烈的痛苦，至今使我不堪回顾。这是我心灵中一个永远不堪触抚的伤痛。死亡本身就是阴冷的。这种追求死亡的特殊方式更是阴冷可怕和不自然的。自

戮，就是骨肉迸裂，就是心灵破碎，就是生命毁灭，就是万念俱灰！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自欺，更不能欺人。在短短的几年里，有那么多中国人民中的杰出人物都先后走上了这条可悲的道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忘记那个毛骨悚然的时代。可悲之处恰恰在于，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民族都缺乏准备。如果他们（父亲和老舍先生）当年果真有那么冷静的分析的话，他们就绝不会去死。以他们对生的热爱来说，死亡，尤其是自戮，是最残酷的苦刑。

那一天天气很不好。当父亲推开那扇小窗的时候，我猜，他看到的一定是一片灰色的天空。

听到有人喊，母亲才知道大事不好。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在车上，父亲一直昏迷不醒。到了北京医院，人们把父亲抬上三楼。五内俱焚、孤立无援的母亲跟着往上走，迎面碰上了汪东兴。他叫住母亲，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还说这几条对父亲也适用，要母亲转告。他并要母亲早点回家，说他有事要找母亲谈。母亲当时心里乱得很，答应了一声就赶紧往上走。

等到父亲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母亲把刚才汪东兴说的那套话告诉了父亲，但父亲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只是对母亲说，他的抽屉里放着他给母亲的东西。当时，旁边还有别人，听到这个话就赶快先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母亲看到父亲的情况平稳一些了，又记挂着抽屉里的东西，就回家了。

回到家里，汪东兴已经在等候。看到母亲，他又把那三句话

说了一遍，然后就叫母亲去吃饭。母亲哪里吃得下呢。汪东兴说要上楼去看，母亲记起父亲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去看。汪东兴起先不让，可母亲一再坚持，母亲说我就是上去看看，这有什么关系。一边说一边就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就硬拉着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上，母亲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就坐上汽车走了。

这些人一走，母亲就急着找父亲说的东西。可是翻了几个遍，却怎样也找不到。母亲就去问秘书，秘书支支吾吾地说已经上交了。母亲这才想起来，父亲和她说那东西的时候确实有秘书在场。母亲一听就很急，说，那是给我的东西呀，为什么要交上去，并且一定坚持要看一看。那些人没有办法，商量来，商量去，还是把父亲写的东西拿来了。不过，他们不让母亲碰。由他们拿着，只准母亲看。这就是父亲写的那封绝命书。可怜的母亲啊，她的心一定是碎了。

母亲是太不幸了，因为她要独自承担一切。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踏进我们这个温暖而又美丽的大院子的时候，我们并未觉出有什么异样。甚至连父亲的血迹也还是第二天才派人揩去的。我们只是被告知，父亲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了。简直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度过这孤寂而又悲痛的一夜的。

三月会议停开了，不得不停开了。但是父亲这种激烈的举动并未能减轻他的罪名，反而，按照那种疯狂的逻辑，他的问题又升级了，更加严重了，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变成了叛党。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各地兴起。毛主席曾含意深刻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此时，林彪已经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毛主席还在和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他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毛主席说，去年9月他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还说，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1966年的4月至5月，在一般的群众中，再平庸的人也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倒是我们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这些人后来都被“文化大革命”这根大棒子打得头破血流，却一直对这场动乱估计和认识不足。一直到“五·一六”通知的发表。

我们所在的学校里气氛也空前活跃起来了。年轻学生们都在跃跃试试，包括我自己在内。各种消息，各种观点都在流传，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我还是感到了一些事情不对头。先是我知道了大哥去执行一次保密任务被取消。后来得知发展我入团的工作暂停。再后来，一些平时十分要好的同学忽然极富挑战性地来问我：“你说，突出政治是不是要落实到业务上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林彪一伙正在批判的父亲的观点。总之，老是瞒着我们是不行了。

怎样和孩子们说呢？母亲去问领导。领导说，去问罗。母亲去问父亲，两人只有痛苦万分地相对沉默。

我还记得那是一天下午，母亲推开了我的房门。她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点儿 你和我说过 发展你入团的事忽然停止了，我想 这个原因你应该知道了……。”天啊 母亲是花费了多少精力，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为我们，她的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个尽可能平静的开头的话啊。

以后的话我记不清楚了。我只是意识到整个事情很严重，有许多许多的问题，现在要完全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考虑了。整个下午我躺在床上，心里只是感到非常的孤独。记得那时房子里刚刚停了暖气，我裹着一条厚厚的棉被，可是仍然觉得冷极了，寒彻骨髓。那感觉深刻极了。一直到今天，我最害怕的还是这两件事，春天的寒冷和落日前的孤独。

不过，我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就选定了我自己的态度。当第二天早晨起来我面对着阳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又坚强起来了 因为我决定和父亲划清界限（尽管我后来明白了 我既不具备划清界限的能力 人们也不给我划清界限的机会。我想 老子犯了错误，儿子照样可以革命，只不过这条革命的路比别人艰难些罢了。不管在今天看来这些决心是多么荒唐可笑，但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是像我这样一个一直受着循规蹈矩的正统教育，一直被父母、师长教训着革命重于生命的 15 岁的女孩子所能做出的唯一决定。

炼 狱

父亲在医院里住了九个多月。

这九个月中能够使父亲稍稍得到安慰的事就是母亲还能去看他。

从感情上讲，我真愿意就留在医院里，天天守着瑞卿。但那时还要注意影响。因为人家正在要我划清界限。我只好隔一天去一次医院。多次去，病房外头都坐着一个人，病房里还有一个护士，回回如此。我开始还有些奇怪，回家就去对秘书说 我多次去 都有个护士在那里 我已经去了 瑞卿又没有什么事，护士总呆在那里干什么呀？我讲了以后，再去，护士就不在了，但门口还是总有个人坐着，正对着门口。这样我就不敢对瑞卿说什么，其实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有时还是悄悄告诉他一些外面的消息。主要的话题就是说些孩子们的情况。

当时 是彭真同志在处理瑞卿的问题。我就去找他。我对他说：“瑞卿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他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彭真同志当时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了 但我还不知道 他

无法正面回答我，只是安慰我几句，让我不要着急。还对下面的人说：“你们收东西，把孩子们的东西收起来干什么，还给他们。”

4月里，我还是隔一天去看瑞卿一次。4月3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我没有按照隔一天去一次的习惯。4月2号我去了，4月3号我又去了。这一天临走时，我从院子里采了两枝丁香花，还摘了两朵海棠花，悄悄装在口袋里，进了病房，我就把花给瑞卿。他很激动地对我说：“你还记得啊

5月里，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

6月里，情况就更严重了。中直机关在中南海开了声讨“彭、罗、陆、杨”四大家族的会。他们把母亲叫去，让她站在台上。后来又逼她写检讨，让她揭发父亲的问题，还要限期交卷。如果不交卷，就不准到医院里去看父亲。在这种压力下，母亲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那大概是在6月底，声讨四大家族的会开完之后，就要我揭发瑞卿的问题。要我交待瑞卿是怎么反对毛主席和林彪的。期限定在7月3号。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想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让我觉得瑞卿是那么真心真意地追随毛主席，那么真心真意的爱戴他，那么对眼前的事情就更想不通，更觉得冤枉、委屈和痛苦。可是怎么办呢？正好到了“七一”。晚上，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那时大孩子都住校

了，只有了了回家。他住在楼下。我一个人在楼上，我就想着这些事情，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冤屈。我是 1938 年入党的，跟着党二十多年，吃了多少苦。瑞卿那个人更是这样 受过多重的伤 棺材都打好了 死了几次的人。可那是国民党，是敌人呀。现在为什么自己人也这样对待我们，把人逼得那么厉害。那几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已经不让我去医院了，简直是当敌人来对待。连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受欺负，我这个当妈妈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又不让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瑞卿出事后，秘书们把家里的药就都收走了，但我那时多了个心眼，把剩下的安眠药装在一个瓶子里，放在厨房的冰箱里头。吃药的念头有过好几次了。这天晚上我又想起这个事 但是又舍不得孩子。特别是了了 那时才 12 岁。我想去看看他。我走到二楼楼梯转弯的地方就再没有勇气走了。最后，我到底没有去看孩子，就回到屋里，把门锁上了。

到医院的第三天夜里我醒来，还不很清醒的时候秘书又来了，和我谈，还是让我交待瑞卿的问题，让我划清界限。但是当时他们到底都说了什么，我是怎么回答的，现在都说不清楚了。

到了 6 月 18 号，治平该来的日子却突然不来了。我要护士打电话，说是出去开会了，不能来。19 号 猛猛来了 说妈妈今天不能来，要他来看看，因天快下雨，我就催他回去了。

再过几天就看到报纸，暗示我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当

然又是晴天霹雳。我对那些来批判我的秘书们说，我革命三十几年，现在给我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的。

再后，秘书们又带来了治平服药自杀的消息。我问我是否可以写信给她吗，他们同意了。

我很长时间没去医院，瑞卿心里又急又疑，后来秘书们把事情告诉了他，他就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我的事他听秘书们说了，听了以后很难过。说我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是他不好，连累了我。但是只要毛主席在，这些问题总会弄清楚的。现在让我们都好好地活着吧。秘书们把这封信交给我时对我说，可以给瑞卿写信，也可以去看他。我听了就想，过去跟我说我可以去医院看瑞卿，然后又因为我去看他批我划不清界限。现在又让我写信，还要经过他们的检查，我想了想，实在没有什么好写，但我后来还是写了。我说，我并不怨你，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也是内因论者。这事情由我自己负责。这是我的内因决定的。他们说让我给你写信，还可以去看你。但我现在不去了。等我们两个人的问题都弄清楚了，我再去看你。写好了，装在信封里，口也没有封。我还找了一个毛主席的托盘漆像，是我们去福建时福建的同志送的。用一条手绢包起来，然后又用大红纸一层一层地包起来，外面又用红缎子结了一朵大红花，很漂亮。瑞卿收到了，一看包得那么严实，不知是什么。打开一层又一层，一看是毛主席像，他就明白了。这个像一直放在他的床头桌上，那条手绢一直放在他的身上，装在他的口袋里。挨斗争，坐班房，这条手绢一直没有离开

过他。一直装到解除监护。后来出国治病，他把手绢放在贴身的口袋里，逝世时还在身上装着。

我的倔强的、痴情的父亲母亲啊 对信仰、对生命、对爱情都是一样的倔强又痴情。所以你们的路才这样艰难啊！

炼狱的火焰却不为此动情。当它们熊熊燃烧的时候，它总能使大多数人相信：这无情的火焰中一定会产生出人类希望的新曙光。

“文化大革命”走出了政治家们纷乱的思绪，走进了中国大地上的千家万户，变成了千千万万人需要思考和需要选择自己具体行动的问题。现今回想起千万人在那个年代里的疯狂举动，令人不能不产生一种宿命的观点。一个古老的民族真好像是在自己的劫数上受难。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制订了十六条。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0日，毛主席亲自对前来中共中央接待站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至12月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九次接见了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

12月20日，父亲结束了他将近九个月的医院生活。

一群疯狂的红卫兵突然把他从医院抢走，准备参加斗争会。

12月20日晚上，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我的病房，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高声叫喊：“穿好衣服，走、走。”我

问什么事，他们还是这两句话。我仍然坚持问：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但是他们不由分说，将我塞上一辆汽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把我从汽车上拖出来，放在一个地下室里。

我仍然问他们，到底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但是他们不准我讲话。后来他们又让我坐上汽车到了城外一个部队的驻地。一间小房里有一张床。门口放了卫兵。这样我才明白大概我是被捉了，此时天还未亮。

我刚睡下，三个穿军衣的红卫兵走来了，他们大声地叫我起来，要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他们说：哼，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一个说他妈的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彪。我说，我没有。他们就破口大骂。我问：你们为什么老骂人呀？他们还是骂。我说：毛主席要你们骂人？毛主席给了你们骂人的权利？这样才算封住了他们的口。随即也就走了。又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走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样反毛主席的。他走后，我问卫兵：他是什么人。卫兵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大约三天后。一天早晨通知我：今天要开会，要我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厚厚的两卷绷带，把我带着伤口的那只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坐车到了体育馆……。

母亲的经历和父亲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十二月十七八号，瑞卿提出要回家，周总理也同意了，因为在医院里实际上也没什么治疗。该试的都试过了，也都失败了。瑞卿跌伤的左脚一直不能封口。但我们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感到一点安慰，因为再困难，一家人能在一起也要好得多。可是，月 日深夜突然冲来一伙红卫兵到医院里就把瑞卿抢走了。连衣服都没有穿，还是一身病号服，用病床上的床单一包，就把人连拖带拉弄走了。这一天夜里一两点钟有一伙红卫兵冲到家里，把我也抓走了。同一辆车还抓了肖向荣、梁必业。把我们拉到总后大院的一个楼上，让我们面对墙坐着。我记得墙上还贴着丑化彭、罗、陆、杨的漫画。天亮时又把我们拉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出来后曾到处找他，可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好人了，保卫部没有，警卫处也没有。说完这些话，他又大吵大嚷地走了。这些棉衣棉裤送得太及时了。24号开我们的批斗会，一直叫我们跪着，如果没有这条棉裤，我想我是很难得回来的。我什么时候想到这位小李同志，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24日一早就把我们拉出来，街上路灯还亮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就把我们关在一个小屋里，眼睛都用黑布蒙着，勒得很紧，和头发结在一起，想松松也不可能。进屋后让我们对着墙坐着。我听声音，还有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

12月24号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大会是批判所谓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的大会。那时候，虽然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社会上批斗成风，但是举行如此大的集会却是此为伊始。林彪在除掉父亲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中早有“靠红卫兵而诛之”的打算。当他们杀人的时候，还不想染红自己的手。听说，周恩来估计到这种情况，曾指示对父亲“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可当时的党内还有什么秘密可保，唯恐天下不乱的大有人在。红卫兵们那么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没有人指使和帮助，没有内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组织揪斗会的人很多原来都穿着军装，只要一到台前，一到公开场合就变成了清一色的红卫兵。开会那天，连叶群都是一身红卫兵的打扮，绿军装，红袖章，只是为了掩盖面目和年纪，比别人多戴了一个大口罩。林彪也对大会提了要求：“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叶群挤在19号看台上，林彪没有到会。

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手段也越来越残酷。1967年3月4日、5日，三万六千余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除了彭真、罗瑞卿和陆定一、杨尚昆两同志之外，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董大林、安子文、曾山、肖向荣、梁必业、还有我的母亲和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等数十人。

那是一些极其残酷血腥的场面。每一个被斗争的人，脖子上均被挂上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还被打划上了“×”。每一个人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他们的臂膀被这两个人扭曲着，头部便不自主地向前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普遍的一种折磨人的“喷气式”。整个会场上响彻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语录歌。成千上万的不明真相的人，个个面红耳赤，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精神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毛泽东和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嘈杂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根本听不清台上一个又一个声嘶力竭的发言者究竟说了些什么。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过去了。被斗争的人受到长时间的折磨，个个脸色惨白、冷汗滴滴。母亲回忆道：

开会时，我们都在台上站成一排，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会场上又喊，又骂，又拳打，又脚踢。还有人上去打瑞卿的耳光，瑞卿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就打得越凶。让我们低着头，弯着腰，还揪着后脖领子。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再一揪，简直喘不上气。看我要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红卫兵们穿着大皮鞋，尽管我穿着棉裤，腿上还是踢了好多青紫块。一些人跑上来照像、照电影时，我低着头，就是

不让照。我真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让我钻进去。他们就拚命扯我的头发。这时候，我忽然听到瑞卿在我的身边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受鼓舞，心想，我也没有罪，怕什么，我就抬起头来了。这时候，又听到一个红卫兵对瑞卿说：“你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我抬起头来看他。他被用一个大筐抬着，旁边是一片片血迹。这是从左脚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天啊！这是什么世道！我心里充满了愤怒。

纪录这些血腥的斗争会的电影，据说现在还保存在有关的档案中。令所有见到它的人仍然毛骨悚然。许多人都建议毁掉这些可怕的纪录。我倒是认为，应该保留它们。就像保留当年纳粹分子的暴行纪录一样保留下来。让我们永远记住，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黑暗的野蛮的时刻。让我们永远为此感到羞耻。永远对一切恐怖的暴力行动保持警惕。

1966年的冬天是多么寒冷啊！此时，我的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决心已经十分黯淡了。我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在我们那个已经断了煤气和暖气的大房子里蜷缩着。我们的家已经不再温暖，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可爱，“革命”虽然仍旧震撼人心，但它却散发出刺鼻的阴谋气味和血腥。在父亲住院的九个月里，我曾经努力使自己相信，我是不想念他的，是不应该想念他的。我甚至确信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当这些斗争会一开，当我听到和想到父亲受了那么可怕的折磨时，我忽然感到，原来我是那么想念他。那些大得吓人的罪名让我第一次想到了它们的虚伪。但是已经太晚了。这时再想见到父亲，已经比登天还难了。

父亲回忆说：

以后 即是对我的不断的斗争。主要是军队系统。有时是三天两天一斗，有时四天五天一斗，也有一连斗几天的，一直到 1967 年的 3 月底。

此时我脚上的伤口不仅原有的未好，在它的附近又长了几个脓包，很快又成为新的伤口。原来已经封闭的老伤口又重新穿破流脓了。4 月初的一天晚上，通知我去住医院，说组织上要治好我的脚。

第二天 医生在病房内为我做了一次手术 说是先肃清外围，然后治疗主要伤口。手术后医生说：我的脚跟骨里头是通的，好像一条小隧道。纱布可以从这一边通到另一边。说要用药使里面长好充实起来，也许伤口可以愈合。以后，外围确实好了，但主要伤口仍不愈合。再后又到手术室动了一次手术，把剩下的跟骨全拿掉，经过一段上药治疗，伤口仍不见好。医生说截肢倒很简单，可现在不考虑此点。

约在 4 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 就不断将我从医院拿出去斗 也不断有审讯。直到 9 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腿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

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将我脚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刚治好，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侧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上医生要我自买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六十粒，吃了十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 X 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 月中或下旬，又送我上 301 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脚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

不住打一针止痛药。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一个星期再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是：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要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并请求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脚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

1968年7月一个下午审问完我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

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承受着这么大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力，他一直在要求‘组织上’给他治腿。但是那些人不仅不给他治，反而利用他的伤腿大做文章，做为逼供信的手段。

7月25日，301医院的有关人员作出了手术方案并写了报告。专案组将报告在8月初呈递给林彪、江青、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等人。8月4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搞到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你立即告专案组，动手术的问题推迟到秋凉以后。”吴法宪说：“可是罗瑞卿的手术问题，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已经同意了啊。”叶群又说：“我负责把林彪的意见告诉江青、陈伯达和黄永胜，你负责告诉专案组。手术推迟至秋凉以后。”

就这样，在林彪的明确指示下，医疗问题开始完全为政治斗争服务。父亲从来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要面对一群茹毛饮血的动物而为真理斗争。

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手术在秋凉并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1月25号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父亲左腿小腿的下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父亲跌断的股骨头毫无道理的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使父亲以后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被摘掉的股骨头也没有按照常规送去做病理检查，而是被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扔在焚化炉里烧掉了。

这段经历同样是不堪回首的。父亲的鲜血一次又一次染红了刽子手们双手。以前我在电影和小说里都很少见到这种血腥的故事。但这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就施加在我父亲的身上。

1970年8月25日父亲在狱中完成了他的自传。他在这自传的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从1966年12月20日深夜到现在，这三年多来我的经历就是挨斗、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一切人世间的侮辱我都受过了，足够了！当然在我的事情未了解前，或者在我的生命未结束之前我还要准备受，我也还正受着。这一切我过去已说过一些，我不再说了。因为我认为没有再说的必要，而且也说不胜说。

但是，有一些事我还要说说。

我被捉起来已经三年多，加上被捉前的半年，一共四年多。我反复地 不断地苦思苦想 想了这么久 我此生当然是有污点的，主要在我的入党问题和我的自杀。但是我怎样也想不出一条理由我应算个反革命分子。连我的老婆孩子的情况，他们的生死存亡，我已三年多不知消息。但不问情况怎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作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作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

若问：你为什么只作思想上的拥护者，而不行动呢？回答：因为我现在不能行动无法行动。

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回答：因为我坚信这些一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一定会实现。时间也不要很久。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等等吃人的魔王，害人的鬼怪，一定会通通被消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以至这个地球上的全人类一定要解放！一定会解放！

若说：你这些话对于你这个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回答 是的 也许看来是不合逻辑的 但历史将证明它是真话，而不是假话。

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情况。

这就是我的自传。

血写的历史啊，你不要沉默。即使在深重的黑夜里也要发出幽幽的光亮。为了人类的尊严，你要不停地诉说，像骚动不安的潮汐一样不知疲倦吧。

我们要记住伏契克的名言：

“人们啊 我爱你们 但你们要警惕啊！”

在 人 间

从这以后，对于这些可怕的经历，这些屈辱痛苦的生活，父亲真的沉默了。一直到他去世，他未再向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内）提起。我也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凭着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很难到手的资料，凭着父亲的自传把这些东西联缀起来的。因为实际上从这时候，也就是父亲完成自传的 1970 年夏季的前后，他确实在心理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从 301 医院出来后，父亲被送到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军队的驻地秘密监禁。那里曾经关押了許多人；当年在那里当看守的一个战士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登在《鸭绿江》杂志上，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和父亲一起长期受到监禁的包括那个年代里受到批判和斗争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当然是不可能互相看到的。但是凭着直觉，凭着囚徒们特有的敏锐观察力，他们却可以互相感知别人的存在。这支庞大的囚徒队伍和它越来越庞大的趋势使父亲暗暗吃惊。从一次又一次审讯中，审讯者们对于问题提法的快速转变，对某些人所谓的微妙变化意味着被称作“敌人”的队伍越来越大。父亲不得不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最初的狂风暴雨式的迫害已经过去。面对这种突然的变故和法西斯式的残害人的手段，父亲曾经痛不欲生，也曾经肢折骨裂。他暴怒地用全身心来反抗这一切。由于对父亲的迫害来得特别早、特别突然也特别强烈，而且这一切一开始是采取了一种半封闭的党内斗争的形式，也由于父亲从1966年3月份起就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忽然与世隔绝，这些因素都使父亲不能不比较孤立地看待自己遭遇的一切。当他第一次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多多少少听到‘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他那时曾对还能去探望的母亲说过：“我的问题恐怕不能和文化革命中的问题联在一起。”但是现在，父亲却从他的亲身经历中领悟出他的问题是和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结论在父亲的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力量。当他把自己的命运又一次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变得坚强和聪颖了。他在内心深处找到了某种依托，敏锐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

父亲出狱后的一天，我们为了送弟弟去当兵而围坐在一起。弟弟讲起自己在东北农村插队时曾注意过只有在乡村里才可能看到的博大辽远的天空。他说当他看着这种天空的时候，一切烦闷都可排遣。这时候，父亲也动情地讲起了自己的一段心曲。那是父亲被监禁在军博附近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非常思念母亲，也非常思念我们。在夜深人静之际，他透过铁窗注视着繁星满天的夜空。忽然他也感受到某种彻悟：对人间的一切烦恼，对个人命运的哀叹，对妻子儿女的挂牵，一下子都变得很遥远；而博大的宇宙却在一瞬间显得亲近了，主宰物质世界的真理也一下子变得清晰了。父亲说，我一下子就很相信，真和假，是和

非，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宇宙那么的大，那里面不知有多少个太阳，不等它们的光线传到人类的眼睛里，人类就要灭亡。地球和太阳都是要毁灭的，这是铁的定律。但是以后还会不会有新的太阳、地球和人类呢？还会有的，而且还要比现在的更美好……我们被父亲的诉说大大地感动了。父亲在送子参军的诗里曾有这样的句子：“儿曾观天驱孤愤。”实际上这是父亲在艰苦的囚禁生活中真切的自我写照。

这是父亲唯一的一次向我们讲述他狱中的生活，这里面没有委屈 没有不平 只有一种恬淡的、娓娓道来的沉思。

当然，迫害并没有停止。那些愚蠢的专案组，幼稚的看守们毫不怠慢地继续折磨着这些手无寸铁，而大多数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囚徒。从《鸭绿江》上的那篇回忆文章中看出 轮番审讯、大声呵斥、侮辱人格、吃冷饭馊饭、不给洗澡、不给看病的事是家常便饭。对于父亲，他们还有一种特殊的方法。父亲本来因腿伤就行动不易，他们还以限制上厕所来整人，上厕所要报告，要经允许才能去。往往父亲说了要上厕所以后，他们故意拖延。还有好几次，他们将院子里的杂草树叶扫成一堆，点起火后，几个人故意抡着扫帚将浓烟往父亲住的房子里煽，欺负父亲行动不便，以此来取乐。不过，此时的父亲已经学会比较平静地忍受这一切，他甚至对这些毫无头脑的举动表示怜悯。他对专案组耸人听闻的种种提问也学会了坦然处之。他学会了在侮辱面前抑制住内心的痛楚，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做一次巧妙的反击，甚至学会了在对方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时，如入无人之境地深深地沉入冥想，或者干脆让疲倦的大脑完全休息。

父亲开始读书了。从专案组的有关记录和父亲零星的一点

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在狱中读了不少书。首先还是毛主席圈定的那三十本书。为了这三十本书做了那么多的文章，实际上，父亲也只是在监狱里才差不多将它们读完。这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正像父亲在日记里写的“革命四十几年，读书未有如今日之好读。”

父亲是他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一个需要行动超过需要思考的非凡的年代。革命或者更直观地说“摧枯拉朽”是那个充满腐败政治的社会里唯一的真理。也正是革命的浪潮，把他这个出生在地主家庭中的旧势力的叛逆者捧成了天之骄子。他惊喜地看到，这架巨大的革命机器，不可抗拒地粉碎了一个又一个黑暗营垒，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世界和人的面貌。他狂热地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添加进去。炙手可热，如火如荼啊！每一步都是奇迹，每一步都是惊喜！对敌人，他是一柄出鞘的剑，对党和人民他是一个柔顺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怀疑也没有想到过要怀疑他从事的事业。无论是他做的，还是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在他想来只不过都在印证他的理想和信仰的崇高性、正确性。可是突然，在他毫无准备，甚至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一切都颠倒了。他被戴上了“敌人”的帽子，被迫忍受骇人听闻的迫害和折磨，被投入了自己人的监狱。在最初的暴怒和激愤中，他差一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当他意识到整个民族都在受难的时候，他就像安泰回到大地母亲怀抱中一样重新生长了力量和勇气。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风暴再也不能熄灭他胸中的希望之火了。

父亲说，那时除了读书，就是最想念我们。他一个一个地想，从母亲到孩子，逐个猜想我们的命运和遭遇。他想对母亲总会给工作，对我们总会给书念。

实际的情况却和父亲的估计大不一样。

1967 年的岁末，我们和母亲在家里等待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二哥回来过新年。31 号不见他的影子，元月 1 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母亲实在不放心，就让我们在家的几个孩子一起去找。我们在清华大学二哥的宿舍里看到是一张空床。二哥已经在几天前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抓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专案组的人，刚满 23 岁的哥哥竟然和父亲列为同案。哥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了五年。五年里他一直穿着从学校里被抓走时穿的棉衣，春夏秋冬都是如此。他们还故意不给哥哥吃饱饭，饿急了哥哥把囚室里的木桌子都啃烂了。1968 年的 2 月 29 日距哥哥被捕的时间不到三个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专案组又闯进我们家把母亲抓走了。母亲自从哥哥被抓后就做好了被捕的准备。她把日常用的东西都早捡在一个小箱子里。专案组们闯进来的时候，母亲非常镇静地提起小箱子跟他们走了。再后来，原在国防科委工作的大哥被开除军籍，强迫回原籍四川老家去做工。我和姐姐到陕北农村去插队。最后，我们最小的弟弟也去东北农村。至此，我们家 10 个人。除了坐牢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外全都被赶出了北京城。不过，我们的日子毕竟比父亲好过得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少数既得利益者之外，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我们都还记得北京站内，当装满北京知识青年的火车从站台离开时，那震耳欲聋的哭叫声。一个受难者当他感受到置身于一群受难者、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受难者之中时，他的心就比较容易得到慰藉。尤其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广阔天地，看到中国的农民几十年、几百年以来持续的，日出而作，日人为息的呆板生活方式，感受到古老的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传统思想的熏陶，我

们真的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溶进这些黄土和大山，也会加入这无终无止的生存行列。

还是父亲比我们清醒，比我们阅历丰富。

父亲说：“当我看到报纸上九大的消息，看到林彪那一伙人都进了中央，林彪当上了接班人，甚至连叶群也进了政治局的时候，我就想，这伙人的气数该尽了。”

是啊，曾几何时，1971年的9月13日到来了。不知什么鬼使神差，我们兄妹几人差不多全在北京。当我们睁大了眼睛再三再四地相互传递着那个惊人的消息时，我们头一个想到的问题是：我们和父亲见面的日子不会远了。但随后我们又全体陷入了巨大的担忧。这么多年没有父亲的音讯，父亲是否还在人间？还有母亲，还有亲爱的哥哥。

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夜晚。很多北京市民还不知道林彪一伙人驾机出逃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只是为建国22年以来第一次取消国庆节的庆祝活动而惴惴不安。入夜，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放，但行人却寥寥无几。我们几个人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一齐来到广场上，我们又说又笑，多少年没有这样大声地说笑了。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面。沉寂空旷但十分明亮的天安门广场上响彻着我们的声音。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有孙中山，都从那些巨大的相框里含笑注视着我们。我们从广场的西侧跑到东侧，又从天安门跑到前门。我们甚至还燃放了一支爆竹，当它轰然一响腾上夜空的时候，我们欢乐痛快的心情是无法言喻的。

啊！我们的心，在人间！

艰难的苏醒

从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们的名字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父亲明显地感到，监狱里的一切条件都开始有所改善。饭菜里可以经常见到一点肉了，看守们不再那样穷凶极恶，专案组的威势也收敛得多了。父亲马上就明白：林彪完蛋了。他高兴得几晚都没有睡着觉。

林彪死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能再等待了，也忽然地不愿再回到那些黄土大山中去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一切想得起来的，说话还管用的人写信。我们要见父亲 要见母亲 要见哥哥 我们多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但是，一切仍然很艰难。我们先和在延庆一个劳改农场里的哥哥接上了关系。1972年5月16日林彪摔死已经整整八个月了，我们才在秦城看到了母亲，可还规定我们不许谈林彪的事。随后我们又接到可以探望父亲的消息，但是探望的时间却一推再推。我们都开始着急起来，真是忧心如焚。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8月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吃过早饭，我们被一辆汽车拉到了北京医院。在车上，在楼梯上 在走廊里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都在内心猜测 在猜

想父亲现在的情况和容貌。我们已经听到了太多的传闻，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去询问专案组。多年来我们好像已经习惯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

父亲坐在迎门的一张沙发上。当我们走进门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急切的、苍老的多少有点呆滞的脸。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父亲老了，老得那么明显，那么使人心碎。父亲向我们伸出双手。他上身那种不自然的姿势使我猛然注意到他左腿那半截空晃晃的裤管。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父亲真的失去了左脚。一直到父亲装上了假肢，那里始终是不敢第二次注视的地方。

我们一个一个走到父亲的面前，父亲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们，仿佛生怕遗漏了什么。轮到最小的弟弟时，父亲迟疑了。“爸爸，我是了了……”弟弟轻轻地柔声对父亲说。我看到父亲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这也使我想起，我们已经整整6年没见父亲的面了。离开父亲的时候了，了了只有12岁。现在，他已经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难怪父亲会迟疑，会认不出了啊。

当我们坐定下来的时候，父亲对我们说：“今天是高兴的日子，见到你们应该高兴。你们不要看爸爸流了泪，爸爸的心里是高兴的。可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甚至已经不会笑了。”

我们说，早通知我们可以来看。可又一次一次的推迟，我们都急死了，急死了！生怕专案组又变卦。

父亲说，这恐怕得怪我了。他们也早通知我可以见你们。可

是我当时正在写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我要快点把它们完成，所以我叫他们把探望的时间往后推，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告诉了你们。

我们说：爸爸，你怎么还这样？为什么还要这样？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怎么还这样？还这样？

父亲说：我怎么能够不这样呢？党内出了林彪，这对党来说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啊！我不把我掌握的情况全都写出来，怎么会安心呢？我再也没想到我会活着见到林彪的自我爆炸。我也没指望会活着见到你们。可是这些现在都实现了，我还指望什么呢！我今年已经 66 岁了，身体搞成了这个样子，今天见了你们，不知何时能再见，更不知能不能见到你们的母亲，趁我的脑子还清醒，我要给你们留下几句话，算做我的遗言吧，你们要转告组织，要转告你们的妈妈。我对组织上再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能在我的生前搞清楚我的问题那当然更好。中央现在一定很忙，林彪等一伙给党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在一天两天中恢复过来的。但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如果等不到那一天，我死后，你们不要惊动任何人。摇一条小船，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面去，恩格斯当年就是这样做的，这是我最后的要求……

父亲的面色如此悲凄，语气是如此凝重。我忽然非常真切地懂得了，父亲这几年的生活是多么阴森可怕。要从这样一个阴森可怕的恶梦中苏醒是多么的艰难。其实，父亲的心情如此沉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虽然林彪死了，但党内的邪恶势力并没有垮台。

规定的探望时间很快就到了。我们仍然不停地写信，仍然要去看父亲，很快我们就争取到一个月去探望一次的权利了。父亲

从北京医院出来后，探望的地点就改在八里庄的一个摩托化营的驻地。在这几次探望中，父亲的心情有时好一些，有时坏一些。对我们对他所有生活细节的询问一概回避，只是不停地要我们把探望母亲的情况详详细细地描述给他。父亲总是说：妈妈那么小就参加了革命，她有什么问题呢？把妈妈抓起来坐监狱简直太不公平了。还反复说，在对待林彪和叶群的问题上，母亲的感觉比他清醒，母亲的骨头比他还硬。或者就静静地听我们把外面的消息带给他。这种时候他很少发问和插话，只是很认真地听，有时摇摇头，有时又点点头。这些会见，一开始都有专案组的人在场，先是在屋内，后来在门口，后来到屋外，再后来就不见踪影了。不过我们还是很小心，生怕惹出些麻烦来，又丧失了和父亲会见的机会。

每次会见完毕，专案组人员都坚持要父亲先走，一直要等到载着父亲的汽车离开很远之后才准许我们离开。每次当我们把架着双拐的父亲扶上汽车，又目送汽车出了大门，转了弯，看不见了，我们的心里就涌起一次生离死别的痛苦。

那间会见的屋子里，玻璃窗上都糊满了报纸，一点阳光都射不进来，墙上有一大块一大块雨水浸湿的痕迹，还有几张又破又旧的木桌和木椅。我记得墙上仿佛还挂了几张领袖像。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对于父亲的特别残酷的几次审讯都是在这间屋里进行的，这间屋里曾经从天花板到墙壁都糊满了“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还在墙与墙之间拉了好几道铁丝来增加标语的数量。这是专案组设计的精神战。这里曾经连续几天几夜灯光如昼，彻夜回响着专案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叫。父亲曾在这里心力交瘁但仍然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曾和母亲又一次来到这里，指点着当年父亲和我们会见的地方。这里已经改建成一座漂亮的幼儿园。只有整幢建筑物的外形依稀可辨。房间里摆着一些淡绿色的小桌椅，墙上挂满了出自孩子们小手的图画，舒适的小床上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可爱的小被盖。那是一个星期天，孩子们都回家去了。整个院子安静又美丽，挂着花窗帘的洁净的玻璃窗上树影婆娑。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和平的、花木扶疏的院落里曾发生过那些不幸的故事呢。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使得对于父亲的监禁再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对于父亲的监禁却一直到了 1973 年的 11 月才解除。

那时候父亲因为出现了一些心脏病的症状，又一次住进了 301 医院。他的病房门口放着一架屏风，屏风的后面坐着一个卫兵日夜看守。那一天我们去看父亲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当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那个坐在屏风后面的战士给了我们一个很美好的笑容。不久，那个屏风和战士一起无影无踪了。

父亲解除监禁的第一个夜晚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我还记得 301 医院 14 病室的护士长给我搬来一张行军床，并且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了当时一句很流行的话：“今后我们就在一起战斗了。”这话现在看来显然有点不伦不类，但当时却使我感到温暖。

护士长走了以后，我和父亲急不可待地关上了门。多少年了，父亲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只有我和父亲，小屋子里显得又暖又恬静。我和父亲说啊说啊，恨不得把这六年来的话都说完。好几次，我们都说，不说了，夜深了，该睡了。可就是停不住，想到一个话题，又要激动一

番。终于，我强迫自己安静下来，父亲还是个病人啊！我在行军床上如躺针毡，但又不肯翻身，我知道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不敢发出任何声音来打扰他。我静听着父亲的动静。奇怪，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该不是父亲忽然发病……，就这样七想八想，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我忽然听见父亲在轻声地呼唤：“点儿 点儿 你睡着了没有？”我赶紧答应。父亲又说：“我也没睡着，一点儿也没有睡意。啊 这下我要翻个身，半边身子都麻了……”这时我才明白，原来父亲也睡不着觉，而且也为了不打扰我，一直连个身也没敢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变了个样子，六年来第一次这么轻松。我懒懒地躺在床上享受着这轻松。第一次想到，六年的政治迫害使我的心理上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何况最直接的受害者并不是我，而是父亲！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全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母亲的归来。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因为父亲的问题把母亲抓起来，现在父亲没事了，可还把母亲关着不放。父亲的心情又一次变得很坏。一提到母亲，他就要说很多很伤心，甚至很悲观的话。我们只能尽量安慰他。

有一天，父亲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父亲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我指着彭德怀的病室对父亲说：“为什么要在门上、窗子上从头到脚都糊上报纸呢？”父亲说：“专案组都是这么干的，原来我的房子也这样糊的，一直到放我的那一天才撕下来。”父亲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不应该把我和他关在一起啊，彭德怀还是做了几件反对毛主席

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后来，我发现父亲对彭总的那间病房很注意，有时在走廊里走走，会看到守卫端饭进去又出来。我们能看见彭总吃得很少，有时还会从那间病房里传来吵闹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父亲读报纸。父亲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总病房的那个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父亲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父亲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我忽然想：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互相理解的倔强的人，此时此刻，他们的心倒相通了。

在焦急的等待中，1974年到来了。1月5日，在事先未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专案组忽然把母亲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我们当然大喜过望。母亲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父亲在哪里？”

三天以后，父亲和母亲终于相见了。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会见中，母亲表现得出奇的镇静。她轻抚着父亲伤残的左腿说：“没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那一天，我也非常兴奋：我们一家人经过那么多的磨难，现在终于团聚了。今后，不管还要掀起什么可怕的政治风浪，我们永远不再分开。而且，从今天起，我们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这以后，我们就把父亲接回家里住了，家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出院的那天，父亲忽然建议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一下。司机按着父亲的要求做了。到了长安街上，父亲又要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汽车路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看到父亲艰难地从座位上欠

起身，朝着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这回我没有说：爸爸，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怎么还这样，还这样。因为我感受到这是一种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这不仅是政治伙伴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无法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来衡量的啊！

何况，一个人要从漫长恶梦中苏醒过来是很艰难的。

木棉花开

那是一段十分美好、永世难忘的温暖时光。

1974年，经一位老同志介绍，父亲决定到福州去治腿。福州有一位姓林的祖传中医骨科大夫，对于骨科的各种疾病颇有一些绝招。父亲一下就动了心，因为父亲一直相信，他一定能够再次站起来。

那时候，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已属很不容易。上面反复交待对父亲不许称首长，不许公开身分，不许随便会客和见人。但是当时在福建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福州军区的司令员皮定均同志、政委李志民同志，以及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却非常热情地欢迎父亲到福州去。在他们的安排下，父亲得到了一个很愉快和比较舒适的休养条件。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确实在这里得到了一次身心上的较彻底的休憩。

在这样一个比较安定和轻松的环境里，使有可能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观察父亲。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很少有的。现在的父亲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又那么陌生。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炼狱中的特殊经历甚至给父亲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

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的伤痛。

但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在那个静谧的、被高大的玉兰树和木棉树遮掩的汤井巷 1 号的院子里，在它那清香、润湿的空气里，在那些被翠绿的竹林环抱的池塘边，在那些青苔和落叶盖满的石子小道上，我们的心很快都舒展开来了。与以前比较，父亲显得更加仁慈和宽和，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他的言谈举止中带有许多清新飘逸的东西，带有更多的明智和豁达。我特别喜爱父亲在黄昏时分沉思的侧影。如果我是一个画家的话，我也许会利用这个素材创作出一幅世界名画来。

我们 3 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多柔美的含意，那么深长的关心和那么周到的体贴。我想，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有这样的举动。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那时候我带了一把吉他。一天下午，我在父亲的窗下不远处弹琴唱歌。透过一扇开着的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父亲正在房中读报。我弹着、唱着，偶然抬头，发现父亲已把报纸放在一边，显然是在专心一意地听我唱歌。他的眼睛望着假想的我存在的地方（因为父亲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那么感动，那么专一的神色。我弹了很久，唱了很久。父亲也就那样子坐了很久，听了很久。一直到夕阳西下。噢，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我多么愿意时间就此停止，就让我们永远停留在这美好的一刻吧。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我忽然懂得：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或者是很多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的很好的生活方式。它崇尚恬淡、亲情，崇尚内心的空灵，崇尚与世无

争。但就是在我陶醉于其中的那一刻我也知道，这种生活方式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永远达不到那种境界。

父亲治腿是一件很艰苦的事。一开始，医生也没有什么信心。但父亲却满怀希望，并且非常认真。按时治疗，按时服药，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父亲是个不惯早起的人。但那时候他总是我们 3 个人中最早起床的人。每天在父亲练走的声音中醒来，已成了我的习惯。那是父亲的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笃、笃”的响声。因为那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是父亲练走的那条路上却寸草不生。看到父亲这么固执，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他该受到多么大的打击啊。

不过后来我就放心了，因为虽然进步缓慢，但父亲确实越走越好。先是母亲看出来，然后我也看出来。医生们当然也不迟钝，看到父亲一天天坚实起来的步态。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了，对于这种药物的疗效，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很充分了。

一天清晨，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母亲一左一右陪着父亲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父亲停下脚步，对我和母亲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一下子并没有明白父亲的意思。只见他直直地立在那里，先是把腋下的一支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支递给母亲。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们大惊失色。母亲赶快想抢上去扶他，而我赶快要把手中的拐杖递还给他。但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父亲满脸都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我站起来了。”我和母亲目瞪口呆。一忽儿，我才明白过来。赶紧飞身上楼，把母亲那架老牌的联邦德国 120 相机取来，

抢下了这珍贵的镜头。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满盛着父亲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还在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除了在青年时代父亲做过一些诙谐的打油诗外，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还有别的诗作。但在福建治腿的这一段日子里，父亲却很认真地写了一些诗。多是和一些老同志的唱和之作。这些诗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作为艺术品，这些诗恐无太大的价值。父亲并不是一个善写诗的人。但这些文字却是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心态的真实记录而成为我们珍贵的纪念。

父亲写诗像他做所有的事情一样认真，先打草稿，然后翻字典，使每一个字或辞的用法都尽可能准确。为了字典，父亲先让我去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图书馆去借。也怪，那么大的图书馆，竟找不到一本像样的字典。跑到福州大街上的新华书店去买，竟也空手而归。后来，还是警卫员小孙把他们连队发的一本学文化用的《新华字典》拿来。虽然太小，但也只好凑和着用。父亲写好还要誊写清楚，然后封好寄出。这些信都是寄给李文一和魏传统两同志的。信寄出后，父亲就等回信，有时等得心急，一天几次催我到传达室看回信来了没有。这些来往信件和唱和之作给父亲稍嫌寂寞的休养生活带来过不少安慰。

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父亲 1975 年夏写的《叙怀》一首：

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
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
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
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

尤其是“磨难虽多心无瑕”一句非常贴切非常朴实。确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这几年里，我还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母亲的深深的依恋。

母亲在秦城监狱里因患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面对病残交加的父亲，母亲曾想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了，母亲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能够瞒得了呢。母亲终于向父亲说出了真情。那一次，把母亲吓坏了。因为她从未看见父亲那么伤心过。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被人戴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热泪满面。这一次，父亲却几乎是嚎啕痛哭了一场。因为他太知道，在那种受迫害的情况下，母亲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父亲总在内心深处觉得，母亲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母亲吃了这样的苦头，也多少有他的过失。我总想，被父亲爱是太幸福的人。因为父亲的爱是那么专注、强烈，那么一丝不苟。他的感情是那么深挚，又那么委婉。

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倚相伴，充分享受着劫后重逢的愉快。

那时候父亲身边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姓孙的警卫员同志，但因他左腿的伤残，生活上仍然有许多不便之处。母亲总想为父亲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但父亲总不肯让母亲动手。他甚至觉得母亲是一个比他更需要关心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什么这餐吃得这样少。母亲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父亲会心惊胆颤地叮嘱到：“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母亲出去回来稍晚，父亲就会坐立不安。

1975年4月，母亲因事暂回北京。汤井巷里只留下了我们父女二人。父亲在此时写下了《忆往事书赠治平》。

去年十月来闽治病 时近半年 初见成效。近日治平因事回京 这里只留我与点儿两人 颇感大有所失。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1 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打倒蒋介石，全国胜利后，我们先后同在公安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达十七年之久。

1965年12月，林贼因我们坚守主席和党的阵地，拒绝上他们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卑劣而又奸险的手段对我们横加诬陷 百般折磨 对待我们甚于对敌 致我腿残身病。某些方面，治平所吃的苦头比我还多还大。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重见光明，家人团聚，喜出望外。林彪自我爆炸，我们能见这群逆贼的可耻下场，实为平生最大快事。

本年4月3日为我们结婚34周年 时光易逝 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 相知愈深 感情愈厚 公不离婆 秤不离砣 水乳交融 牢不可破 此之谓也。

题记之后的三首诗是这样写的。

其 一

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
 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

其 二

革命意志正高昂，主席指示执行忙。
 古谚明枪容易躲，又云暗箭最难防。
 林贼谋我真狠毒，叶妖害君胜虎狼。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逆恰落此下场。

其 三

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练更同心。
 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在其三第一句的注释中说：“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 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 故有此句。”

噢，我的双鬓斑白的双亲，你们的女儿为你们在八载磨难之后仍有如此缠绵的情意，如此炽热的爱恋而怦然心动。

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我和父母还有一项共同感兴趣的活动，那就是在早晚两次散步时举行的关于很多问题的“学术讨论”。我们什么都谈。“文化大革命”，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

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要记住，那是 1974 年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四年）？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父亲？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那时候“四人帮”还没垮台，说到江青的时候也只能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这些讨论虽然往往并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却始终是很有吸引力的。每天，当我们推着父亲的轮椅一踏上那条散步的小道时，我们三人便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类似的话题。

有一次我问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是个坏人的。父亲说：“一直到我坐到林彪的班房里，我还在想，上海会议是毛主席和林彪对我的误会。林彪许多做法我是觉得有些不对头，可是我确实看到毛主席是信任他的……。”我冲口而出：“爸爸，你不认为在林彪这个问题上，你也是负有责任的吗？”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万分。我知道这个问题对于受了林彪那么多迫害的父亲来说，也许是太残酷了。父亲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并在余下的时间里默默无言。但就在这一天晚上，一位老同志来访，和父亲谈到福建有些县份走私猖獗，旧势力抬头，买办婚姻严重。有些村子的年轻妇女十个八个的相约一起去投河自尽。我听到父亲很激动地说：“包括我们这些受过迫害的人都应该好好想想。国家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要不然我们的孩子都不答应了。”

遗憾的是，从这以后，我竟再没有勇气正面和父亲交谈过这个问题。不过那些日子里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切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本来就有很好的读报习惯。这些日子里，他更认真地

读认真地想。“四人帮”御用文人写的又臭又长的文章，父亲总有耐心把它们读完。凭着他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当然很敏锐地感觉到，“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矛头是指向谁的。当“四人帮”开始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的时候，父亲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着周总理和老同志的。除了看报纸，一些老同志的来访使父亲觉得特别宝贵。尤其是皮定均、李志民和廖志高等同志，他们总是有很多话谈。当我看到父亲一次又一次在手掌心里划着三点水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又在对江青那伙的倒行逆施表示憎恨了。有一次，我还听到皮定均同志对父亲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不幸的是，皮定均司令员，我们敬爱的皮叔叔，在1976年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这时候，离“四人帮”的彻底覆灭只有几个月了。父亲对皮定均同志的突然离去感到万分痛惜。我忘不了父亲在皮司令员的灵堂里悲凄的面色，他曾长久地抚摸着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不肯离去。现在皮司令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当我们走进庄严肃穆的骨灰堂一室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皮司令员和父亲一起在向我们微笑。我们要将两只同样的花圈献给这两位我们敬爱的长辈。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两只同样的花圈放在那里的话，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皮司令员的夫人和小女来过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了。父亲不顾“四人帮”的爪牙们设置的种种障碍，急如星火地赶回了北京。在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哥哥搀扶着，用他那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主席的身边。他久久端详着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父

亲的悲痛是沉重的。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追悼大会。父亲竟然和所有的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在这一个多小时里父亲不停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痛哭失声。父亲甚至在担任了军委秘书长之后，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兼任了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风风雨雨，父亲对主席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发生过动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的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

仅仅一年

1976年10月，距毛主席逝世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党和人民一起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乱，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但是在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一条又粗又大的极左思想的根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洗。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据说，在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前后，华国锋曾要求他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因为这曾是“毛主席的意思”。邓小平同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中国人民通过艰苦的寻找，花费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又一次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同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8月里的一天，母亲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是父亲却一直没有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

京西宾馆开会的父亲。父亲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治平 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許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要办的事却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拚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 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与十年前相比，父亲甚至显得更加急切。一种内在的焦虑和担忧迫使他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几乎完全忘我的境地。1977年，像全国各方面的情况一样，军队的工作受到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亟待整顿。他接触到的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使他感到自己肩上拨乱反正的责任十分重大。此外，父亲对自己七十有一的年龄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总期望趁着自己的头脑还清楚，精力还旺盛，多争取一点时间工作。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

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内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早已唇干舌燥。未曾吃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就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是什么，他想想，十回中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白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水浒》里有个石秀，又叫拚命三郎，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就是这个拚命主义。”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询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天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

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的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也离开了孩子们，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着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了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起茫然的孩子们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 第一是工作 第二是孙子 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父亲非常明确党为什么要把他放在军委秘书长的位子上。作为邓小平同志的助手，他也很明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1977年8月和12月，军委先后召开军委座谈会和军委全体会议 针对“四人帮”对军队训练工作的破坏 讨论了军队的教育训练 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翌年6月召开全军政工会议，清算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和军队政治工作的破坏，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父亲还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军队内部，尤其是总部机关中和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总部机关进行认真的整顿。并且非常注意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安定团结的局面打下较坚实的基础。父亲在这一系列非常困难的工作中既注意讲究政策和策略 表现了极大的耐心 又坚决果断、明辨是非 作风顽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磨难并未丝毫磨去他身上的锐气，

而是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和坚强，使他的观察和思考能力更加锐敏和深刻。

直至今今天，当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时，我常会不由自主地猜想，如果父亲还在，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会有什么样的思考。但这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实际上，父亲并没有能够在这些短暂的日子里发掘他在十年磨难中积累起来的全部精神财富。没能来得及运用他在那些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自然而然获得的思想成果。因为这段时间仅仅一年。我想，这也许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遗憾。

与十年前比较，面对越发复杂的政治局面，父亲更加具有了一个战士的素质。这是一个坚决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的勇敢无畏而又聪慧清醒的战士。

1978年的春天，一场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发表后却遭到“凡是派”们的非难。包括当时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但是父亲对这个问题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6月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由父亲主持起草和修改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党重

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准备。9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沈阳、长春等地视察时，为这场大讨论做过一段总结式的发言。他说：“如果说只有毛主席讲过的才能做，毛主席没有说过的就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本身要发展，否则也会僵化……。”

不过，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场讨论的真正结局。

现在，我要涉及父亲一生中最后一个重大问题了。

几天前，我见到了一个15年没见面的插队时候的老同学。说了没有几句话，她就很急切地问我：“可以告诉我吗？你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去联邦德国治腿？要是不去，他现在可能还活着。”

父亲去世已经将近九年了，在这九年当中，有多少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啊。这里面有成熟的长辈，也有初谙世事的年轻人，有相交极深的朋友，也有从不相识但满怀善意的陌生人。现在，我也许有能力，也应该面对这么多关心我们的，并对父亲的过早去世痛惜万分的人做出一个回答。我也真的早就想鼓起勇气试一试，因为它也是一个日夜缠绕着我的问题。

从1966年3月18日起，父亲就丧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条腿，父亲比别人多受了不知多少屈辱和痛苦。这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痛，更是父亲心灵上的巨大伤痛。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个伤痛多少与他自己在那一瞬间的软弱和轻率有关。

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之后，他更加感到这条伤腿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拖累。父亲是一个善于创造第一流成绩的人，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一

有可能 他就要去基层 去连队 国防工程、战略工事他都要亲眼看一看才觉得心里有底。尤其是军委座谈会以后，他抓住一个机会就跑出去了。他跑了很多地方，像十几年前一样出现在普通战士之中。他去看地形，看国防工事。有的坑道太窄，他坐的轮椅难以通过，大家劝他不要下去，但他硬是扶着一根手杖，一步一步往坑道深处走去。一些领导同志看他这样艰难，就告诉了有关部队：以后罗秘书长要到哪里去，汽车、轮椅不能走，就组织人抬。同志们的关心和体贴反倒使父亲于心不安。他觉得他不该给这么多人带来麻烦。而且，父亲一向注意自己的仪表。加上他生来身材魁梧，从来是一个十足的威风凛凛的军人形象。现在，却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这是一种多么说不出的难受味道啊。父亲内心的伤痛并没有弥合，反而在悄悄地扩大。所以，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弥合内心的伤痛，更为了恢复做为一个人，一个军人的尊严，父亲的全身心都在期望有一天，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以接近正常人的姿态站立、行走！父亲啊，我的 72 岁的父亲，竟还有这样一颗充满生机的，争强好胜的心！

早在父亲重新工作之初，他就听医生讲过，如果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的左腿的功能可以有很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手术对一个七十多岁的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是很危险的。而且，目前国内施行这种手术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技术还不够成熟。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父亲也就没有再提。我们以为，父亲真的已经死了心。不久，组织上请了两位联邦德国的专家来给父亲安装一个更好、更轻一点的假肢。想不到，父亲又旧话重提，向两位专家详细询问了国外进行这种手术的情况。两位专家的意见使父亲又得到了新的希望。

不过，这一切都还不是父亲最后下定决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1978 年的春天，母亲在健康体查中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的结果，那个阴影生长得很快。结合母亲原来患有乳腺癌的病史，医生们的估计是很不乐观的。怎么办呢？

母亲先知道了这个消息，她的心里是很清楚的。她知道凶多吉少。一开始，她对于医生动手术的建议并无多大信心。她想到的只是怎样让父亲晚一点知道这个消息，怎样让这个消息给父亲带来的打击小一点。其实父亲是差不多同时和母亲知道这个坏消息的。那时候他也因感冒住在 301 医院。母亲住在 5 层，父亲住在 6 层。那几天，父亲从外面开会回医院来就先上母亲的病房。母亲说：那几天父亲天天来，开会开得多晚都要来，他自己也还是个病人。来了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温存。母亲忽然就明白父亲是知道一切了。有一天，天很晚了，父亲从京西宾馆回来，又到母亲的房子里，把一切都谈开了。父亲还对她说：“动手术，开刀！一点也不要犹豫。医生说了动手术就听医生的。你别担心，医生已经跟我说了，良性的可能性很大，动了手术就没事了。”可是父亲的内心却很痛苦，他对我们说：“妈妈长了个东西要做手术，如果是恶性的，医生说最多还能活五年，这样的话，就是老天太不公啊……”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泪纵横。

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也鼓起了勇气，决心听医生的话动手术！争取最好的结果。3月8日这一天，母亲精神很好地去妇联参加三八妇女节的招待会。那天，母亲甚至还着意地打扮梳洗了一番。参加完招待会，母亲带上两个孙孙，坚坚和毅毅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玩了一个下午。母亲说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她的心里也

觉得那么平静。然后回到家里把我们所有人住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就坐上汽车回医院。走进病房的时候，母亲对迎候在那里的医生和护士说：“好了 就准备开刀吧 我已经没有别的事情了。”

母亲是 3 月 13 日动的手术。那一天，父亲一直守护在手术室外面。手术的当时就经冰冻切片证实，病变是恶性的，而且是乳腺癌转移到肺。所以医生们切除了母亲的那一叶肺。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精神已处在极度紧张中的父亲，我们不能熄灭他心中认为那病变是良性的最后的希望。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固执的医生们和忧心忡忡的父亲。我们鬓发斑白的双亲已经受过了太多的磨难。

但是父亲并没有相信我们的话。几天以后，在父亲的再三盘问下，一位前去看望他的老同志说走了嘴，这个不幸的消息最终还是被父亲知道了。

那位同志离去之后，父亲和衣倒在床上，看得出来，他的情绪烦躁极了。他闭着眼睛，不说也不动，头上全是汗。当时在场的只有哥哥猛猛和嫂子燕燕。猛猛想分散一下父亲的注意力，就对父亲说：“爸爸 我给你读一段报纸吧。”父亲还是不说话。这时候护士同志把饭送进来，燕燕给父亲盛好饭送到他身边。父亲坐起来把碗送到嘴边，急促的呼吸却使他难以下咽，看到父亲痛苦不能自制的样子 燕燕不忍再劝 赶紧夺下父亲手中的碗说：“爸爸 现在不想吃 就一会儿再……”这时候 父亲轻轻地 但很坚决地对他们两个人说：“你们先回家去吃饭，我要一个人在这里呆一会儿。”

猛猛和燕燕刚刚回到城里的家，电话铃就响了。原来是警卫员小王发现父亲在哥哥嫂子离去之后一直坐在床边垂泪。小王

不敢询问，又怕出事，所以让猛猛燕燕赶快再去。两个人扔下碗又往医院跑。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 6 楼 推开父亲的房门时 他们却看到了一幅他们怎也想不到的情景。

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洗好脸，从床上走下来，正坐在桌子边吃饭。他的神态非常镇定 与刚才判若两人。父亲对他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出国去治腿。今后 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 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

猛猛和燕燕都说，父亲出国治腿的决心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下定的。

手术以后，母亲慢慢地好起来了。我们的心里也高兴起来。我们也对母亲说，她肺上的那块东西是良性的，根本没问题，手术拿掉了就没事了。母亲并不相信我们的话，但是她懂得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觉得母亲在那一阶段非常痛苦的治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和有耐心。医生和护士们都说，母亲实在是一个很能配合治疗的病人。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就在积极地做着出国治腿的准备，他要尽快实现在以后的时间里照顾母亲，让母亲尽可能的愉快的诺言。他请有关的同志帮他调查情况，搜集资料，他还向中央写了报告。组织上也很重视父亲的要求，派了专门的技术小组研究和考察有关的问题。在父亲的积极努力下，事情很快就落实下来了。

母亲回忆说：“6 月里的一天，我刚刚出院不久，瑞卿就告诉我，出国治腿的事已经定下来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而且心里很不高兴，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好好跟我商量？前几天提到还是说没

定，再拖一拖。记得为了这个我还和瑞卿争吵了几句，可是吵有什么用呢？我知道他定下来的事情是无法更改的，再说，我也习惯了在关键时刻听他的。”

就这样，1978年7月15日，大病初愈的母亲跟随着急切的、对自己未来充满美好信心的父亲离开了北京，飞往那个遥远又陌生的国度。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这个巨大的决心里饱含着她多么深长的情意。

7月18日19点40分，飞机降落在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关于父母亲最初几天在联邦德国的情况，我将抄录他们给我们写的一封信来说明。

儿女们 媳婿们 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确实有科学，有文化，可惜的是这些主要的部分还掌握在资本垄断集团或大的财团手里。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所有制的改变，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应本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原则 利用矛盾 使一些东西怎样为我所用 为我服务。这看来是一门很大的专门学问，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探讨的。妈妈爸爸对此只有肤浅的感觉 而林彪“四人帮”这些蛀虫们，

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一代及子孙后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使人感到：不知应如何处置他们才能解恨！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的两个小孙孙。（以上为父亲亲笔。）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 汽车走 2 点 30 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二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的、更愉快的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毅贝儿想奶奶爷爷。奶奶爷爷也想毅贝儿、坚贝儿。希望回去后你们两个小孙子长得更健康、更懂事了。亲所有的孩子们。亲我们的小孙子。祝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7.31

8月1日，母亲和张彤大使到医院去看父亲。母亲带了一把鲜花。她和父亲在病房里照了一张像。父亲的情绪很好。母亲一直呆到很晚，父亲催了几次，母亲仍然舍不得离开。最后父亲说：“走吧、走吧 我已经服了睡前药 明天还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母亲说 她永远忘不了 父亲那样笑咪咪地跟她摆了摆手，她觉得父亲心里平静极了，有信心极了。她就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这一去，竟成了永诀！

本来说好了 8月2日7点钟父亲进手术室。第二天母亲赶到的时候，父亲却提前被送进去做准备了。母亲只好等在病房里。不时有消息从手术室里传递过来。中午12点左右 手术室里传来消息。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去见父亲，但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被医务人员拦住了。母亲只好再等。一切消息都是好的。傍晚，父亲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以后，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用英语说了：“晚上好 谢谢你。”那医生替父亲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多了，父亲的情况仍然平稳。在人们的劝说下 母亲才肯回到旅馆里去。刚刚洗漱完毕 熄灯睡下 电话铃就响起来，接着就有人敲门。母亲知道大事不好。赶到医院的时

候，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波恩时间 8 月 3 日凌晨 2 时 40 分 父亲被心肌梗死突然地夺去了生命。

波恩和北京的时差是七个小时。

8 月 10 日，中央派专机将父亲的灵柩送回祖国的首都北京。

8 月 12 日，父亲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追悼会上，邓小平同志致了悼词。

这就是父亲的一生。这就是从 1906 年 5 月 31 日到 1978 年 8 月 3 日父亲所走过的路。

请允许我就在这里结束我的文字。我已经尽我的可能把父亲的一生忠实地记录下来。我终于可以对我自己说，你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

1987.2.15 凌晨

附 录

罗瑞卿将军年表

- 1906 年 5 月 31 日 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父亲罗春庭 母亲鲜氏 兄妹共七人。罗瑞卿为长子。
- 1912 年 入私塾读书。
- 1919 年 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
- 1921 年 入南充县立中学，该校为张澜先生创办。
- 1924 年 参加反军阀、反“佃当捐”的斗争。
- 1925 年秋 首次拜访著名共产党人吴玉章，并当面聆听教诲。
- 1926 年夏 离开家乡，瞒着家人去成都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其时母亲鲜氏已去世。
- 1926 年 10 月 离开成都到重庆，并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编入该校第五期步科总队一大队二队。
- 1927 年春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 武汉分校被编入由叶挺指挥的中央警卫师。参加了

- 8—9 月 伏击夏斗寅的贺胜桥战斗，西征杨森的仙桃镇战斗。后改编为教导团。
- 1928 年 秋 教导团在九江被军阀张发奎遣散。返回武汉找党，不幸身染重病。
- 1929 年 1 月 大病初愈。经湖南辗转到上海 终于找到党组织，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3 月 受中央军委派遣赴湘鄂苏区，途中因交通中断 又返回上海。
- 5 月 受军委派遣赴闽西根据地，在上杭蛟洋游击队担任教官。
- 6 月 红四军二次入闽，蛟洋游击队改编为红军五十九团 任参谋长。
- 8 月 以五十九团为主组建红四军第四纵队，任参谋主任、支队党代表、代参谋长。
- 9 月 参加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
- 12 月 任二纵队五支队党代表，并参加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
- 1930 年 2 月 参加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
- 6 月 任红四军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 10 月 任二纵队政治委员。
- 1931 年 11 月 任第四军红十一师政委，并参加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战斗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头部负重伤。
- 在瑞金参加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第一次

- 全苏大会。
- 1932 年春 伤好归队后不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并参加了漳州水口圩等战役。
- 1933 年初 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 1934 年 10 月 随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
- 1935 年 5 月 为突过大渡河，组织先遣支队。任参谋长。
- 9 月 任陕甘支队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 11 月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到一方面军任保卫局局长。
- 1936 年 6 月 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一面学习，一面工作。
- 12 月 “西安事变”发生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
- 1937 年 1 月 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育长。
- 1938 年 1 月 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写《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
- 1939 年 7 月 率抗大总校开赴华北敌后。
- 1940 年 6 月 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 1941 年 4 月 与郝治平结婚。
- 1944 年初 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 1945 年 4 月 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 1945 年 10 月 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 1946 年 1 月 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

- 长。
- 1946 年初夏 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
- 1947 年 6 月 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
- 1948 年 5 月 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后兼十九兵团政委。
- 1949 年 10 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
- 1954 年 9 月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1955 年 9 月 被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1956 年 9 月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 1959 年 4 月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 9 月 兼任国防部副部长 中央军委秘书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1961 年 11 月 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 1962 年 9 月 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 1965 年 1 月 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1965 年 12 月 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受到林彪一伙人的诬陷，被撤销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

- 1966 年 5 月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同志一起受到错误的批判 被停止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此后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迫害，竟被长期关押有意致残。
- 1973 年 11 月 解除监禁。
- 1974 年底 赴福州治腿疾。
- 1975 年 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 1977 年 8 月 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 1978 年 7 月 到联邦德国治疗腿疾。
- 1978 年 8 月 3 日 因突发心肌梗死不幸逝世。

后 记

那是一个要下雪没下雪的夜晚。

在一种说不出的寂寞中，我又回到了我们那个已经在“文化大革命”和地震中坍塌了的老屋。北京的冬季很少有这样无风的、潮湿的夜。朦胧的星光下，所有的景物都静悄悄的。

建筑部门在那些院墙已经倒掉的地方都钉上了栅栏。使我无法接近那幢已经成为废墟的大房子。透过栅栏，我看到面目全非的院落里只有那几棵老槐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忽然非常真切而固执地相信，我从童年起就熟悉的一切，我的家庭和我的父亲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都一样样完好无损地挂在那些密密匝匝的老树杈上。我分明听见它们在那里诉说，在那里喘息，像我一样费力地分辨着淹没在时光中的它们当年的主人。也正是这种如闻其声 如见其面 见神见鬼 刻骨铭心的怀旧感受，使我猛然意识到：我和那一段往事之间已经有了那么巨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那一段往事已经作为一个时代结束了。尽管它曾是一个非凡的年代。

自然界是那么伟大，人类社会自存在以来纷呈在一代又一代人面前的问题是那么庞杂。一个时代无论怎样不寻常，一个人

无论怎样出类拔萃，都只能涉及这些问题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出于这种估价，我才有勇气记录下这个我爱之甚深，思之甚切的人物的一生。并且能在一种平和的气氛中和他保持一点距离，不至于失去对他有限的一点评价。

当然我引用的材料还是可以使读者放心的。因为大部分出自父亲的亲笔。其余部分的提供人和见证人也大都健在。另外我也注意了 in 写作时将真正客观的东西和我本人的感受从字面上分开。给读者留下一个空间。

但父亲毕竟是父亲。他不仅给了我血肉之躯，从幼年起他就以他高大的形象不知不觉地成为我生活中的楷模。加上他在人生道路上不寻常的遭遇——在我看来，他付出的太多。所以，当我今天向世人讲述他的命运的故事时，我无法不带有我也许太多的感受。

在我辍笔的时候，我似乎又一次感受到和父亲的别离。因为在这几年当中，我始终和父亲在一起。我们随时交谈，互相叩问心灵，甚至在长久的、默默无言的注视中体会着对方的存在。好在我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我现在要对父亲说的是：

父亲 安息！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点点

1987.3.20

于北京